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雪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民主

第三版

[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 著
孙荣飞 段保良 文雅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Democra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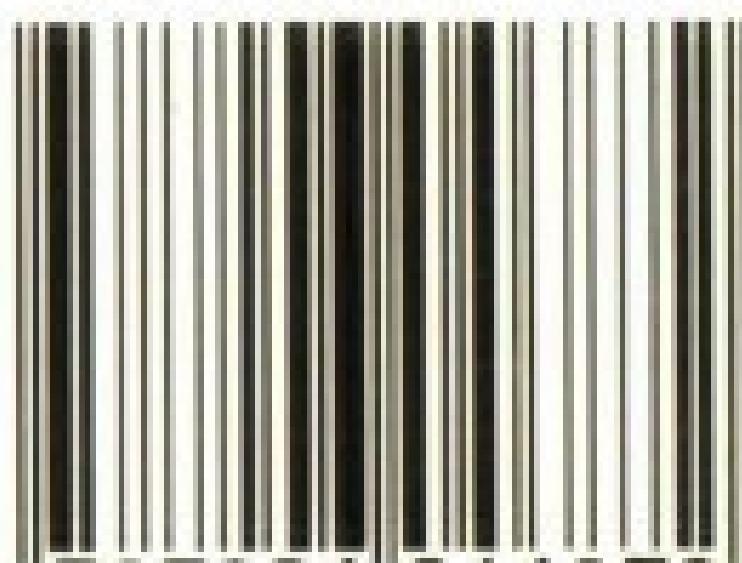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教材之一
中国10余所最高学府知名学者联合推荐

策划编辑：崔文辉
责任编辑：贺萍
装帧设计：陈东

Democracy Come to Us!

作者简介：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近来以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的身份退休了。自从1970年以来他一直在这所学校教学。他曾是一名记者，在Tribune传媒公司工作过。他是《西方自由主义兴衰》和《自由万岁！》的作者，后者是一份歌颂体裁的政治学研究作品。

ISBN 7-206-04687-8



9 787206 046872 >

ISBN 7-206-04687-8

定价：14.00元

民 主

第三版

[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 著
孙荣飞 段保良 文雅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英)阿伯拉斯特著;孙荣飞等译.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Democracy

ISBN 7-206-04687-8

I. 民… II. ①阿… ②孙… III. 民主—研究

IV.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357 号

Anthony Arblaster

Democracy

(Original ISBN:0-335-20970-X)

Copyright © Anthony Arblaster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5-1367

民主

著 者:阿伯拉斯特 译 者:孙荣飞等

责任编辑:贺 萍 封面设计:陈 东 责任校对: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6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75 字 数:1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687-8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编委会名单

主 编：周殿富 韩冬雪

学术咨议(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马德普 马敬仁 丛日云 孙晓春

李 强 任剑涛 应 奇 何怀宏 林尚立

姚大志 胡维革 施雪华 贺照田 高 建

袁柏顺 徐湘林 夏可君 顾 肃 梁治平

曹德本 葛 荃 谭君久 薄贵利

编 委：孙荣飞 朱海英 刘训练 彭 斌 叶兴艺

赵多方 陆 彬 王 冰 王 新

第一期执行编委：孙荣飞 朱海英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对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诩，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出版导言

“民主”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在西方往往把它追溯到古希腊。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倾向于认为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并不适合于现代民族国家，理想的民主模式应是自由主义民主，典型代表是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和罗伯特·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这种自由主义民主在苏东剧变后达到了自信的顶点。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已没有替代性意识形态可以挑战资本主义民主的扩张。

然而，相比之下，阿伯拉斯特显得比一些主流的自由主义者清醒许多。他看到了西方政治和社会价值正面临其它文明的挑战。同时，全球化和跨国巨头的财富与权力的持续增长对选举政府产生了另一个威胁。在阿伯拉斯特看来，民主的实践已落在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现实的后面。而民主实践之所以滞后，阿伯拉斯

特认为原因是在于西方对民主的核心——“人民权力”的忽视。权力的不平等在悄然加剧的情形下，阿伯拉斯特呼吁西方需要进一步实践民主。但毕竟，阿伯拉斯特是在资本主义民主范畴内批评西方现行民主和声张民主理念，仍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性。

马克思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民主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代替了封建专制，这是民主发展史上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这种民主建立在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基础之上，民主仅仅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专利，广大劳动人民并不能真正享有民主。与以往任何一种类型的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使广大劳动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享有着国家制度所保障的充分的民主权利，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因而，本书所讨论的民主概念是资产阶级语境下的产物，它只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绝非是普遍价值和终极目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要丰富公平得多。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本书中部分文字中，

阿伯拉斯特以一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家的立场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民主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将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的挫折看做是历史必然，对于东欧事件的评价也极为片面，这些内容虽然在本书中所占的分量非常小，但是，也充分反映了作者观点的局限性和阶级性。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编 者
2005年4月20日

序言和感谢

在各种社会研究或“科学”的名目下，四处隐藏着一批目前仍在的老式实证主义者，他们相信你能够“在政治学之外保持政治学”；换句话说，他们猜想，你能够或者应该试图尽可能“客观”地写一本关于民主的书，如同人们可以客观地论述金鱼的交配习惯和月球的地形学一样。甚至，这比实证主义者所想像的可以客观描述金鱼或地形学还要困难。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以冷静客观的方式去写作像民主一样跟我们关系重大的事物是可能的吗？即便这是可能的，那它事实上是可欲的吗？在这些事物上持不偏不倚态度太极易造成迟钝。

看来更好的方式，与其使读者厌烦，不如冒着风险去激怒他们。因此我并不试图回避出现在本书的现有争论，这最好被视为是对过去争论的更大贡献而不是对更边缘事物的一种尝试。尽管如此，我希望本书将被证明对有着政治理念和观念体系的研究人员（在这个词的最宽泛意义上）有所帮助。如果它在他们中间引发了一点小争论，我想它就已经实现了它的目

民主

的。

在准备和写作此书过程中，我广泛利用了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的资料，对此，我极为感激。我的朋友和同事哥伦特·威廉亲切地阅读了希腊民主的章节并提出了几个好的建议和必要的纠正。我感谢弗兰克·帕金，是他给予我鼓励和支持，他是这套书的主编。但首先，我必须感谢我的妻子琳达在为出版而准备原稿以及在本书两次修订中所提供的帮助。

安冬尼·阿伯拉斯特

谢菲尔德，2002年1月

第三版前言

本书第一次出版于 1987 年，这是苏联和西方世界进行冷战的最后几个年头。从那时起，全球政治环境，包括理念和实践层面的民主，开始发生迅猛变化。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在菲律宾、智利、南非和其他地方独裁体制和威权制度的分崩离析，在西方制造了一种胜利的氛围。在西方，普遍宣称已没有替代性意识形态可以挑战资本主义民主的扩张，这种扩张似乎无法阻挡。

然而，这种相当自负的情绪并没有持续长久。一方面，西方政治和社会价值面临一种新兴的强硬伊斯兰主义的挑战。另一方面，全球化和跨国巨头的财富与权力的持续增长对选举和责任政府原则产生了另一个威胁，这些跨国巨头当中有的甚至比最穷的民族国家还富裕。如果民主政府的权力被这些非选举性和极大不负责任的公司所压榨，这不就将毁坏民主价值自身？并且如果我们也看到了政府的形式正往跨国层面上发展，比如在欧盟，那么难道也不需要在这种层面上发展民主程序

民主

吗？看起来似乎，民主的实践已落在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现实的后面。

是这些发展——而不是在对民主进行理论化当中所获得任何显著进步——使我对本书的更早版本内容作出某些非常实质性的修改。书的基本结构仍保持原样，但重点已转到论述新近的变化，特别最后一章已作了扩展。现今，民主的未来似乎可能比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变得更复杂和不确定。

安冬尼·阿伯拉斯特

谢菲尔德，2002 年 1 月

目 录

序言和感谢 1

第三版前言 1

第一章 导言：界定民主 1

第一部分：历史

第二章 民主的发明 19

第三章 民主的复兴 36

第四章 平民政治 54

第二部分：理念

第五章 民治政府 87

第六章 多数人的统治及其问题 97

第七章 平等和公共利益 105

第八章 代议制和“直接”民主 115

第九章 同意，自由和争论 125

第十章 结论：创造民主 137

参考书目 156

译者后记 163

第一章 导言：界定民主

初一看，自从欧洲共产主义和它的全球性超级强权——苏联，在 1989 年到 1991 年期间发生突然而又普遍性地猝然崩溃以来，在 21 世纪初写一本关于民主的书好像只不过是向自我满足式的庆祝往前进了一步，而这种此起彼伏的庆祝至少在西方已使那些不那么确定或怀疑的看法湮没殆尽。西方优势明显。民主击败了极权主义。资本主义最终并鲜亮地证明了自身相比与共产主义在经济体制方面的优越性。哪还有什么余地可以怀疑或争论的？

对这些近来事件作必胜信念地解释被弗朗西斯·福山以一种更具哲学性风格的历史主义的辩论所支持。福山曾经是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他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于 1989 年早期异常合时地出版。然后他以一本书的厚度详细阐发了他的见解，并且，在 2001 年对纽约和华盛顿作一系列抨击后，他紧接着重申他的信念，即他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历史演进的解释仍然

民 主

是有效的。^① 福山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民主代表了人类政治和经济制度发展的最终和最高阶段。资本主义民主仍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可能将永远不会；但无论如何，那是一个所有发展中的和现代化中的社会所希望达致的目标，但是，这个强有力的优势可能一方面被反动分子和原教旨主义者所抵制，另一方面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反对。

这样一种历史视景的清晰设计，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前景描绘的一种替代。马克思主义式前景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看做是过渡性发展，其最终将被社会主义所超越，并且政府和国家将消亡，这正如我们所周知：“对人们的统治将被对事物的管理所替代。”只要事实没有突然提供有关体制性共产主义的不稳定和真正短暂的明显证据，福山的文章就是大胆的，不妨视为是一种建设性的打赌式智言（*jeu d'esprit*），不过同时这也似乎展示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联合体制的持久力和吸引力。

西方世界一直习于以民主为傲。长期认为民主已存在于世界的西方。（福山在他书中的一章里把大不列颠、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看做是早在 1848 年就已是“自由国家”，即便那时大不列颠和美国有一半多的人口处于无投票权状况，而且在美国奴隶制依然没有取消。^②）过去的世纪中，在 1945 年以前民主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2, and see his article reprinted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The Independent, 11 October 2001.

^② Ibid., p. 1.

第一章 导言：界定民主

必须抵抗法西斯，在冷战期间必须抵制共产主义。但这两个威胁现在已消除得或削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现在摆在民主国家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在从来不知道民主的社会里或在民主已被独裁统治所占领的地方帮助建立民主体制和机构。至于西方已实际采取多大措施来促进民主的发展，我们将后面再探讨。

上述的民主观念源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民主是一种“我们”（西方）已拥有的东西，但我们慷慨而理想地渴望把民主输出到地球上较不幸的地方。因而从很大意义上，给予民主一种解释将是一种对当前西方现实以及有关西方现实的美好局面是如何产生的描述。这种解释尽管在仍没有实现民主的社会里可能令人不满或富有挑战性，但并不一定在其他社会是如此。共产主义世界的“人民民主”的消失可能只不过加强了自满的情绪；但不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对民主理念予以嘲讽是如何古怪，可在他们理论中，甚至可能在他们的某些实践里存在那么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发展出关于何谓民主的一种替代性概念，这种概念将对西方的自负提出某种挑战。C. B. 麦克弗森在《民主的真实世界》^① 这本书里对这些替代性民主视景给出了一种同情性解释。

然而，只要我们一开始严肃思考民主是什么，这术语的一般性意思是什么以及已经意味着什么时，某些正当的怀疑将开始笼罩自我庆贺的情绪。因为民主在成为事实之前是一种观

^① C. B. 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民主的真实世界》)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第二章和第三章。

民主

念，并且正因为它是一种观念，故它就没有单一准确和一致认同的涵义。实际上在民主的漫长历史中它有着非常不同的意思和内涵，即使今天在不同社会和经济体制下对它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些，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有着不同民主理念的人当中有部分人是无法对现今西方所谓的民主观感到满意。

日常上的感觉可能会认为上述情况是在以一种不必要的复杂手段搞混了问题。往往可能出现轻快地宣称：“我们都知道哪个民族国家或城邦是民主的，哪个不是。”但我们的的确如此吗？比如说：对民主的检验就是“一个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政府”这样一个事实吗？当希特勒于 1933 年成为德国政府总理时，他就是作为获得多数票党的党魁在德意志国会大选中通过正常的宪法程序当选的。纳粹党赢得了 43.9% 的选票——和不列颠的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于 1983 年和 1987 年赢得的选票数几乎一致，也和不列颠的工党在 1997 年和 2001 年获得选票数几乎一致。在不列颠，几乎没人置疑只得到低于半数总选票的政府合法性。因此希特勒有民主权利在 1933 年 3 月之后统治德国。然而没有人愿意把德意志第三帝国描述为民主国家。那么是在哪一点上它失败了呢？

低劣的选举存在于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还包括许多其他正式和非正式的一党制国家。许多人也并不想把它们宣称为民主国家。他们将声称苏联的选举或者说今天的埃及、或者说马科斯总统统治下的菲律宾是不自由的：人们并不拥有对他们开放的真实选举权。但，是什么构成了一个自由的选举？1984 年尼加拉瓜的选举存在多党竞争的局面，其中几个

第一章 导言：界定民主

党是反对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的。尼加拉瓜宣称他们的选举是自由的，并且他们证实桑地诺政府有着真正的普遍性支持。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却尽力把这些选举斥责为非自由的、欺骗性的。那么尼加拉瓜是一个民主国家吗，或者如某些人所声称的，只有当桑地诺丢失 1990 年大选时，尼加拉瓜才算成为民主国家吗？

或者拿目前的不列颠来说。关于民主的一个共同观念是，它意味着“政府为民所有”，或者至少是由民选代表所有——因为不管对还是错，普遍持有的观念是，在现代的大型国家，人民不可能亲自统治。不过，因为“人民”中往往存在派别，故政府可能代表的不是全体人民而最多是人民的大多数。鉴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民主。实践中民主意味着政府为大多数选民的代表所有。但是，通常被（特别是被英国人）视为民主国家的不列颠连这样一个标准都不符合。自从成人选举权普及以来，除了联合政府时期，没有一个英国政府以纯粹多数票当选过。在像不列颠这样的选举体制下，或者在两个以上的党派分享选票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往往是由最大少数派选上台的，政府也只是代表了最大少数派。政府支持率可能不会超过 40%，这使得参与选举的剩余 60% 的投票者和那些并没有投票的人受到了非他们所选择的政府的统治。这样看来，我们已远离了民治政府的原初简单观念。

当然，还存在其他值得质疑的理由。被选举出来的民众的代表，也就是下议院（the House of Commons），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统治支配作用呢？（我们暂时不考虑英国议会的上议院，

民主

因为它的构成者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选举。) 正如通常所认为的，如果议会不是自己来进行统治支配的话，那么政府自身——部长们，公务员们，以及整个国家机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下议院真正负责呢？以及原则上，下议院对其有多大的控制力度呢？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很多的议会议员对于议会控制行政部门的能力，甚或是掌握行政部门的动态的能力，都有着很深的不满意。在一个民主政治当中，下议院的某个委员会希望安排会见行政人员，结果却发现其受到阻挠，又或者向当事人提出问题却遭到拒绝回答，这些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国会下院国防专门委员会（the Commons Select Committee on Defense）试图调查 1986 年的韦斯特兰（Westland）事件时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为什么需要皇家法官斯科特主持的司法调查，才能够揭开 1991 年海湾战争前英国向伊拉克提供武器攻击的真相？才能发现当时政府部长们误导议会或不真实地回答议会质疑的严重程度？

我们并不需要对这些问题得到确实的回答从而来发现英国政治的现实——包括议会选举的程序，以及被选者与那些真正组成和控制国家机器的人们是怎样的关系——的确没有完全与民治政府或人民代表治理政府的原初观念相一致，或完全体现它。这，是否是我们可以取得的最好的情形，即一个与民主原则最接近的实际的近似？或许只是没有足够的时机对其加以改进呢？如果后者成立的话，怎么能过于简单化地把英国说成是一个民主政治呢？仿佛，英国的现实与基本的民主原则或最终理想之间所存在的疑问关系能够被简单地忽视掉了或者是被撇

到了一边。

或许我们可以看看大不列颠的一个行政区：北爱尔兰。1922年到1972年的50年中，统一党（the Unionist Party）通过选票的绝对多数赢得了北爱尔兰区域的每一次选举。肆无忌惮地操纵选民区使他们在北爱尔兰议会中获得了超出正常的席位，但这种欺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即使不用这种手段，统一党也拥有被大众接受的委任统治权，没有哪一个威斯特敏斯特政府享有这一地位。统一党利用这一强有力的形式削减天主教和一般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少数派的人数，使他们沦为二等市民的地位，在公共住房和就业方面对他们区别对待，并且将他们排除在权力和权威的位置之外。在实施这些措施的时候，统一党无疑得到了他们绝大多数的新教支持者的热情赞许。那么，在北爱尔兰，这难道就是民主政治的作为吗？事实上，当统一党领导者们为“民主的回归”而欢呼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目中则是简单多数规则的重建，即是新教统治的有效重建。很容易说，统一党的多年统治其实是对民主政治是什么或者民主政治应该如何的滑稽模仿。但是准确地说，要否认它是值得尊敬的“民主”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如果民主并不意味着是多数规则，那么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里肯定可以举出充分的例子来，无论我们给出的民主定义是多么的老套或简单，不久就会证实它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明了而简单化的描述性术语。当我们一旦开始严肃思考民主意味着什么时，就会发现，常识是一个相当不充分的向导。

观念和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只是难题之一。正因为当代的

民 主

现实和民主古典概念在某些方面不容易一致，所以一些 20 世纪的作家们提出，需要修改我们对民主本身的定义，从而使其与现代社会中的现实可能性相匹配。我们并不需要跟着他们沿这一特殊的路径去考察，民主定义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所简单应用过的例子来提出。不愿意称统一党控制的北爱尔兰为民主的人，或者同样不愿意称大不列颠为完全民主的人，都被迫回到民主的意义和定义这一问题上来。对民主理论的关注的确是无法避免的。对于我们所指的“民主”，我们需要比通常所了解得更加清晰才行。而且一旦我们开始考察这个术语的意义，我们就会发现，它已经被而且仍然被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理解着。这些方式可能有共同的核心或本源，但并不完全相同。

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或简单混淆的问题，甚至也并不是刻意尝试使用或误用这个词来用于特殊的政治目的的问题——尽管所有这些因素可能（而且事实的确是）导致了这一问题。W. B. 加利曾经把民主命名为，“实质上富有争议的概念”。它是一个内在的富有争议的、可改变的概念。像“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等等，“民主”也是这样一个词语，无论它的准确意义是什么，对很多可贵的政治原则和理想来说，它总是显得很重要，而且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它也绝不可能获得惟一一致的意义。这对那些有条不紊的思考者会有所不便，但即便如此也无需遗憾。在政治上民主是最为持久的理念之一，而且在 20 世纪，它成为了最核心的一个。失去这种核心位置是不可能的，但这也不太可能会使民主的涵义成为静止的和固定不变的。词典编撰者和政治理论家们都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希望去

停止这一不断修正的过程，尽管他们会合理地追求去引导或使其不断接近在一个方向上而不是另外一个方向。因此有很好的理由去设想，那些试图以目前的现实为依据来对民主下定义的人——把民主定义为一些社会所拥有而其他社会没有的一种政治体系或者政治文明——会发现他们自己落后于历史了。民主很可能会继续保持其不仅是作为一个具有争议性概念，而且是一个批判性概念：即是一种标准或者理想，现实通过其得到验证并发现自身缺陷。民主的概念总是会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这并不是说一个完美的民主最终是能够达到的，完美的自由或完美的公正可能会更容易实现些。不如这样说，思想或理想始终是对自满的一种潜在的纠正，而不是一种推力。

讲到这里，我其实就是在说，正如我们或多或少了解的那样，历史将会继续，直到未来（如果人类有未来的话）。到那时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在思想上和物质实体上不断演变和调整的过程，正如我们所发现的一样。认为民主的定义总会被确定下来，或者更加傲慢的认为民主已经或者将在 21 世纪的某时刻上被精确地确立下来，这种观点不仅对于未来的种种可能性缺乏洞察力，而且对我们以往的知识也是视而不见。因此，对民主是什么的任何研究，揭示它的本质或意义的任何尝试，都要必须是基于历史的研究，至少是部分上的。对民主这一理念要作出当代解释就需要参考其在历史上的运用，惟此，才能避免不加怀疑地或探究地把民主的现时理解当做永恒的准确概念。

特别是，一种历史的视角揭示出了民主历史中的一个乍一

民主

看相当令人迷惑而且有些矛盾的特征。在民主漫长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从古希腊时期到当代，民主被智者和有教养的人们看做是政府和社会可以想像到的最坏形式。民主或多或少成为“乌合之众的法则”的同义词，而且精确地说，它是对一个文明有序社会所有核心价值的一种威胁。C. B. 麦克弗森非常恰当的阐述了这一点：

民主曾经是一个坏字眼。几乎任何一个人都认为，按照其最初的意义即人民统治或政府遵从大多数人的意愿，民主就会是一件坏事——对于个人自由和文明生活的优雅品质都是有致命危害的。从很早的历史时期直到大约 100 年以前几乎所有智者们都抱有这种观点。直到近 50 年，民主才开始变成好的事情。^①

很明显，头等大事是了解对这种传统态度的逆转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发生，以及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对民主的赞同会是如此地自发和毫不犹豫？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纪之前或更早，我们可能同样会对如此危险和激进的观念毫不犹豫地不给予任何支持。态度发生如此迅猛和巨大的变化，令人狐疑。难道是大众对民主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剧烈？或者是民主自身已作调整从而吸收了更早的疑义和敌意？

我们也许可以从《浪费》中发生的交流里获得有关一个可

^① Ibid., p. 1.

能答案的一点线索。该剧是由哈勒·葛兰维列—巴克所著，该剧发生在 20 世纪早期的英国统治阶级当中：

布莱克保罗：……政治家的任务是调整顽固事实以适应变化的环境……以及在效果上适应一般较笨的人们的实际接受力。民主包含对这方面的承认和容纳。

朱丽亚（她努力试着耐心）：我至少不是一个民主分子，布莱克保罗先生。

布莱克保罗：我也不是……一个民主分子，仅仅是需要如此而已。这年头在临门议院里我们都得低头弯腰。^①

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政治家私下承认他对普通百姓的轻视，以及在一个民选权日益扩展的时代对民主原则表示口头服从的必要性。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政治家认同这种虚幻的想法。

语言，特别是政治语言，可能被误导为是静态的。许多政党在很长时期没有改变称号，而同一个名称下给人感觉隐含着认同的一致性。我们习惯指伯克、迪斯雷利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为“保守主义者”。但是共同的标签下可能隐藏着他们之间

^① Harley Granville - Barker, *Plays: One*, (戏剧：第一场) London, Methuen, 1993, p. 132.

民主

的不同。类似的，像“民主”这样一个更古老术语的下面也是如此。在柏拉图和伯里克利时代所理解的民主含义与几乎2500年之后所拥有的或所赋予的民主含义之间真正存在着任何共同之处吗？或者说，对民主的研究得受制于对附在民主（民主这个术语仅仅是作为各种含义的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载体）身上的多种含义的研究吗？

本书目的之一就是努力提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过给出一个初步的、简要的答案也许是有用的。迄今为止，我已经强调了该术语的灵活性和变动性，以及试图固定或者冻结如此重要术语的意义的愚蠢性，即便只是出于假定而去固定。但是类似这种主张导向于完全相对论，或者说是一种完全武断的唯名论，一种在《透过镜子和爱丽思发现了什么》中矮胖人(Humpty Dumpty)所代表的类型：“当我使用一个词语时，”矮胖人带着一种相当嘲讽的语调说，“它的定义正是我所选择的希望它的那个意思——不多也不少。”在民主方面，我们是否被逼到了这种境地？民主能够是它的使用者想选择什么意思就能代表什么意思吗？

在一个层面上，对最后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词语本身并没有版权。使用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没有人能阻止它被使用，并且考虑到使用者需要清楚他（她）所使用概念的意思，就需要含义不被混淆。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各种术语使用中，是否有着人们共同接受的核心意思。这种核心意思使我们有权说这种或那种概念运用构成了滥用或误用。所赋予“民主”的各种意思的运用都是合法的吗？或者一些用法表达了一

种表面的替换——试图对一个在某种语境下完全不适合或不真实的术语加以恰当化？

我相信实际上，“民主”就像“自由”、“平等”一样，在民主这个术语的所有使用和解释下面隐藏着单一主旨。核心的意思必须是一般的和模糊的，以便适应各种可能的变化。但是不能模糊到允许对术语附加任何意思。所有“民主”定义的根基，不管是明确还是复杂的，存在于大众权力的理念，存在于权力、以及可能也包括权威依赖于人民这样一种形势。权力或权威通常被认为是政治性的，因此，它经常采取人民主权的理念——人民是最终的政治权威。但是它没必要成为排他性的政治概念。民主并不总是只象征政府的一种形式或者选择政府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是一个应用于整个社会的术语。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民主》主要探讨的是美国社会，而不是它的政府或政治体系。

“民主”概念的本质或核心应具有充分基础性和一般性，以便提供宽泛的空间容纳我们经常碰到的更复杂和更特殊的定义。“民主”不对选举和代表制加以详述，它也不暗示谁构成了“人民”——从“人民”概念的大部分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无法给出单一答案的问题，虽然今天看起来答案似乎是明显和不可回避的。“民主”是一个极易被设定或稀释的理念。它可能在那些担心“人民”和“人民”愿望的人中间引起可理解的敌意。然而，在任何合理的“民主”概念中，人民是一个必要的关键因素。说一个国家或政府、政体或社会确实是民主的或者“在最后分析意义上”是民主的（尽管它可能看起来不太合

民 主

理) 任何一种声明都必须包括这样一个含义, 即关注中的政府、政体或国家在这个或那个角度上是服务于或代表人民的; 人民的“真正”意志通过政府、政体或国家得以表达, 或者说人们支持政府、政体或国家, 尽管这种支持没必要通过类似选举的形式来验证。这些声明也许是假的, 实际确实经常如此。但不管怎样, 它们是以民主的辞藻表达出来的: 他们把人民和人民的意志视为使政体、或者政策或者行动(甚至可能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武断行为)合法化的根基。这也就是共产主义东欧的一党制国家为什么把他们自己归类为“人民”民主的理由。

前段所述是过去世纪的政治以及某种程度上美国和法国革命以来两个世纪的政治的独特之处。“人民”的同意、接受或支持已逐渐成为政府和政体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尽管在现实中政府和政体可能是威权的。信仰, 或者中国人所习惯称呼的“上天安排”至今没有完全被取代, 在伊斯兰世界甚至欢呼它的复兴。不过即便在那里, 它也是一个部分意义上的民主、大众现象。只有保持民众忠诚的信仰才能提供合法性。至于伊朗或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法律和在更少程度上爱尔兰的天主教法规是强制要求接受的, 这是因为信仰本身是被普遍接受的。在缺乏大众基础的地方, 这些法律如果要完全施加于群众的话, 只会带来巨大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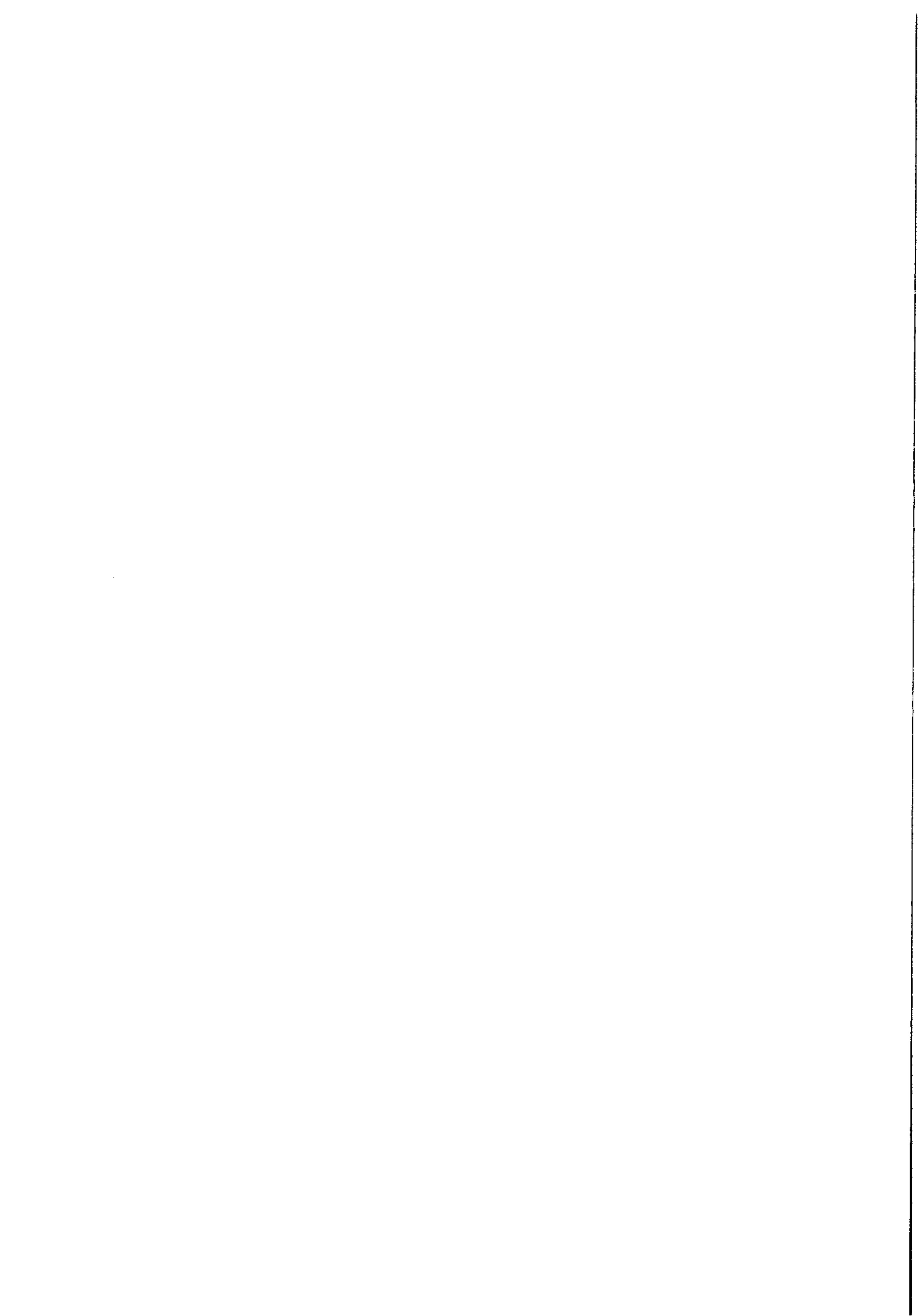
即便严格的穆斯林运动在毫不犹豫地对他们所统治的人们, 不管人们同不同意, 施行刚性的回教法律时, 也准备运用民主辩论的方式来推进他们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穆斯林组织在 1992 年阿尔及利亚大选中获胜。但当那些选举

第一章 导言：界定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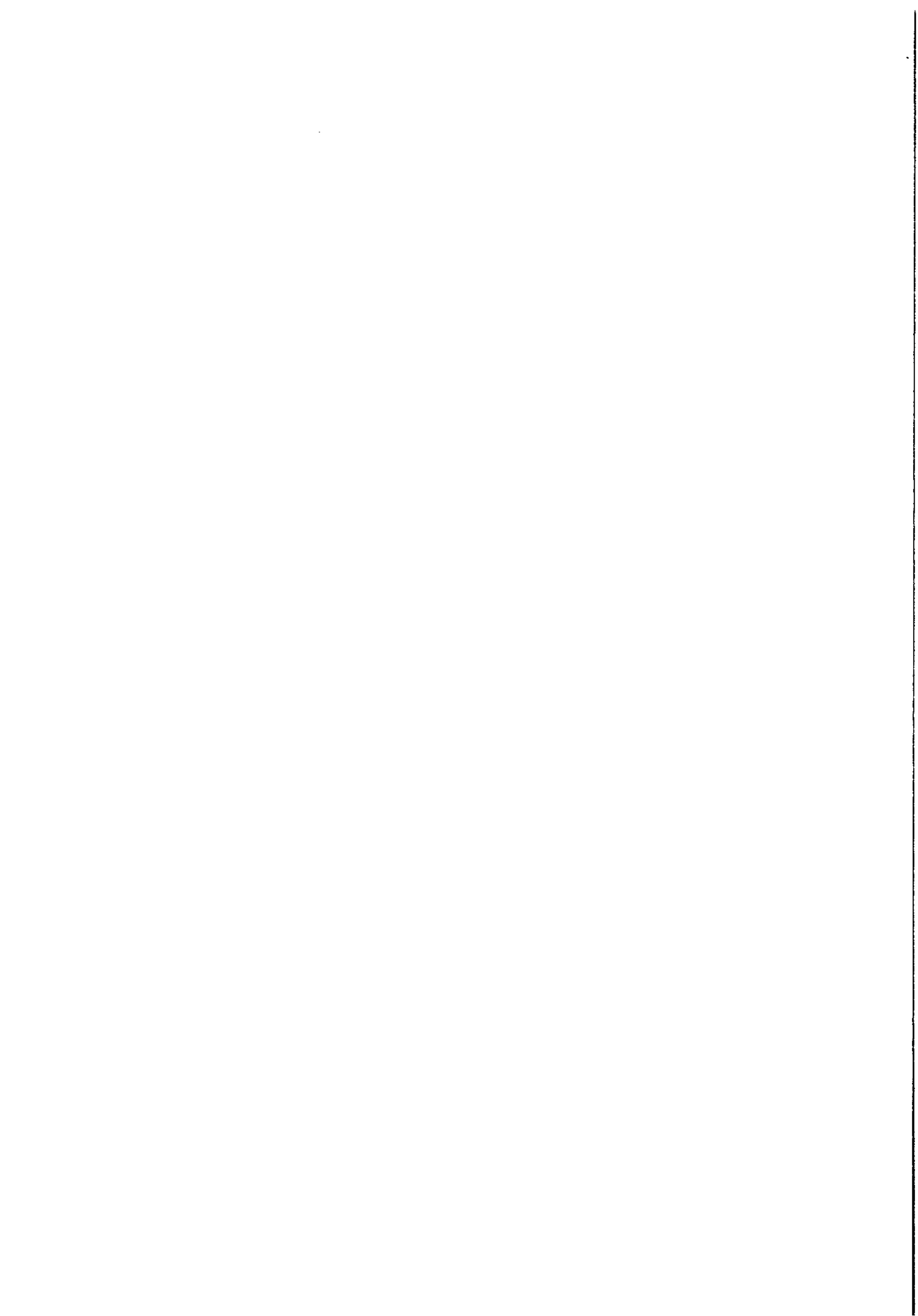
突然被取消后，伊斯兰成为反对派并发动了残酷的内战。

诉求大众的支持或同意可能是无根据的甚至是内在不诚实的。但“伪善是罪恶付给美德的礼物”，在 21 世纪民主代表了政治美德。对原则只予以口头承诺而并不想认真践履的那些人始终是冒着被更具有真诚尊崇感的人挫败的危险。因此民主或大众权力的理念，不论在多大程度上和多么容易被滥用和敲诈，仍保持着巨大的潜力。始终会有一批人倾向于责问现存的选举安排是否遵从了大众权力的基本原则或责问该原则为什么不该应用在迄今未被触动的特权和权力领域。他们不可能被那些认为民主只不过是一种用来选择民族国家政府工具的人所制止。他们也不应该如此，因为如果我的论点是正确的话，他们只是正在发现大众权力这个基本理念的新的用途。他们只不过正在从事对古典民主理念的最新的重释或新颖的运用。地球仍在转动。或者就本文来说：历史在前进。

在从民主理念的发展到它的希腊开端的简单追溯和探索民主理念所涉及的某些问题过程中，如果我们快速地抓住大众权力这个中心原则，那些看起来令人迷惑的大部分事情将变得清楚和可以理解。至少来说，这个问题是本书的前提预设。



第一部分：历史



第二章 民主的发明

“民主”像许多政治的中心术语（包括“政治”）一样最初是个希腊词，由两个更短的词组成，城邦平民（*demos*）和力量（*kratos*）。这两个词有着多个意思。城邦平民可以意指生活在一个特定政体或城邦里的整个公民实体，但也可用来意指“乌合之众”或“暴民”或“下层社会”。力量意指或是“权力”或是“统治”。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完全可以想像团体或个人们有权力但在官方、可见意义上没有在实际统治。因此一个形式上的民主——即人民或人民代表显现为在统治着——可能掩盖了实际权力的一个非常不民主的安排。或者相反，一个君主或贵族形式上在统治的政治体系可能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真正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这两个构成性术语中存在的模糊性，在理解民主的内涵和历史时具有持久重要性，而这种模糊性在民主概念产生之初以及在现实民主中就已呈现。

民主意味着人民统治或多数人统治；但因为多数人也是穷人，故民主经常被意指穷人统治或是暴民统治。亚里士多德特

民主

别清楚地提到这一点。他不认为一个富裕的大多数所统治的城邦能正确称为民主政体：“假设总共有 1 300 人；他们中的 1 000 人是富人，他们对政府的统治权没有和 300 穷人分享，这些穷人也是自由人并且在其他方面也和富人一样；没有人会说这些 1 300 人生活在一个民主政体下。”单纯数量不是事情的本质。“只要人们是依据他们的财富在统治，不管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那么你拥有的是寡头政体；而在穷人统治的地方，你才拥有民主”。^① 因此寡头政体不仅意味着政府由少数人而且是由一些“富裕和出身高贵”的人所统治着；民主指政府由占多数的穷人统治。

关于“贵族制”这个术语，也存在一个相似和互补的模糊之处。从字面上讲，这指的是最优秀者统治或拥有权力，但从该词一出现就获得这种意思完全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假设那些富有者和／或出身高贵的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也是“最优秀的”。诸如亚里士多德之类的作家和在他一个世纪前的所谓年老的寡头政治者（Old Oligarch）——都对民主不同情——很自然地在诸如“美德之人”、“高贵之人”、“最优秀之人”、“少数人”、“名人”、“有钱人”这些术语之间几乎互用，并且把这个精英团体拿来与另一个团体作对比，这个另一团体变换地被叫做

^① Aristotle, *The Politics*, (《政治学》) 1290b. In the Penguin edition this passage appears in Book III, Ch. 8, but other translations order the text differently. (在企鹅版本中这段出现在第三节的第八章，但其他译本安排文本顺序并不相同。)

“乌合之众”、“穷人”、“群众”、“坏人”等等。^①

我们现在不习惯把民主与那种阶级敌视和社会冲突的公开表达相联系。支持民主，可能意味着在一场阶级战争中支持某一阶级，这样一种观念在今天的大多数人看来是荒谬的。然而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政治中，民主不经过斗争是不可能取得的，而且这斗争的很大部分一直是一种阶级斗争，即便是像许多希腊人所描绘的那样，它被简化为一场占多数的穷人反对少数富裕和出身高贵的人的斗争。

对希腊人来说不仅仅是发明了民主的概念。这概念还被计划用来或发展用来描述一个演进着的现实——一种公民实体实际上自我统治的城邦。城邦或城市国家通常是一个小的、自我统治、自我维持的实体（不过远不是政治自主的）只有很少的现代国家那些特征。的确，如果根据国家我们意指是一种政府结构的话，城邦这个术语描述了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而不是国家。在古希腊世界里雅典不是惟一实行民主的城邦，但它是所有城邦中最稳定和长久的，并且是记录得最好的，这或许只因为它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在文化上是所有城邦里最光辉灿烂的。因此像希腊人发展雅典和理解雅典一样，雅典被我们看做民主的榜样。

这种发展的开端通常被追溯到梭伦在公元前 594 年左右为

^① See J. K. Davie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民主与古典希腊》) London, Fontana, 1978, pp. 35 - 6.

民主

了城邦而进行立宪的时期。根据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①中所给出的解释，梭伦的干预本身是一定时期“平民”和“贵族们”之间冲突的结果。在财富或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梭伦把公民实体分成四个阶级。最重要的政治官员被局限于这些阶级中的更高阶级，而最低的阶级被授权参加平民（古代雅典的人民会议）会议，并组成审判团在法庭上就有罪与否和量刑问题作出裁决。这些不是很大的权力，但后来的变化将继续扩展它们。

公元前 508 年，下一轮主要改革同样是由伊萨哥拉斯（Isagoras）领导的贵族保守派和由克勒斯塞涅斯（Cleisthenes）领导的大众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产物。伊萨哥拉斯求助于斯巴达国王克里蒙斯（Cleomenes）的帮助，试图恢复贵族寡头制。伊萨哥拉斯和斯巴达人被群众武力围困在阿克罗波西（Acropolise）并被迫投降。这就为激进改革打开了道路。克勒斯塞涅斯回到雅典并以改变城邦的“宪政”结构的方式确立了变化，该宪政被设计用来缓和君王制和地方忠诚，以及提升公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忠诚。每天碰头并为公民大会的集会作议程准备的议会或众议院（Boule）从 400 人扩大到 500 人。10 个部落或选区之一凭投票选择 50 人当议会议员一年，而在议会在内这 50 人在 1/10 年内以一个掌舵和行政的委员会的身份运作。虽然贵族们把持着传统职务和比如最高法院这样的机构，

^①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雅典政制》) trans. John Warrington, London, Dent Everyman, 1959, pp. 247 - 9.

而且执政官的职务也继续存在着，但权力已向议会和公民大会转移。

接下来的 50 年也是雅典和希腊人坚决反抗在大流士和克里西斯（Xerxes）领导下的波斯人试图破坏他们城邦独立的年份。这些年中，雅典寻求更进一步的民众权力的统治，其中一些措施因战争之需直接推动。在公元前 487 年，执政官制被让步成为一个选举性职务，由贵族们选举然后通过投票予以实施，然而在公元前 461 年由前执政官构成的最高法院被剥夺了权力。从这时起，500 人议会、公民集会和伴有 501 人、1 001 人、甚或更多陪审员的群众法庭——它们都是通过投票从作为整体的公民中选出——成为城邦的最有权力的机构。

因此从公元前 461 年始，大众政府或多或少地被牢固建立起来了，直到在公元前 332 年被马其顿的征服者最后摧毁，被一种反对者始终具有优先权的严格选举制所取代。民主从来没有被普遍接受。实际上，大多数最有名的雅典哲学家和作家都是民主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从理性上看，柏拉图可以被视为所有政治哲学家中最激进和不宽容的反民主者。他的导师苏格拉底至少分享了他的一些观点。

亚里士多德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怀疑姿态看待民主，但明显的是，如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做的那样，是以一种贵族式的鄙夷看待政治中的群众参与和平民领导；甚至在雅典和反民主的斯巴达身陷战争的年月里，戏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一次再一次地嘲讽平民统治和它的领导。结果是在支持民主方面古希腊或雅典不存在一致的持续陈述，而相反的事例几乎占据了后裔的

民主

注意力。

甚至那些谴责民主政治无法控制的人经常构思更微妙的办法对民主予以诋毁。因此许多研究古希腊的近代历史学家顺着修昔底德和其他评论家的思路，辩称只有平民满足于接受像伯里克利这样的上层阶级的有教养的代言人的领导，民主才能运作良好：“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因此，在名义上民主存在的地方，权力实际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正是在他手里雅典达到鼎盛时期。”^① 只是在伯里克利死之后，腐败才开始降临，那时人们坚持跟从所谓的煽动政治家——顾名思义——比如像克里昂，克里昂明显不知道如何行为得体，只会使用受大众欢迎的姿势来迎合“乌合之众”。亚里士多德写道：“他是第一个敢于在讲坛上叫嚣和鄙俗滥骂的人，并且衣服褶得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然后向人们作演讲，然而所有他的前人在演讲时都是仪态威严和穿着得体。”^② 皮特·格林教授确实正确提到，对伯里克利的崇拜以及自公元前 429 年他死后延续的观念反映了许多近代评论者在古希腊问题上坚持对民主持怀疑态度。^③

当然，比其他事件更具有损害雅典民主盛誉的一桩事是在

①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trans. Rex Warn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4, pp. 134–5.

②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雅典政制》) p. 270.

③ This point has been made by Peter Green, *The Shadow of the Parthenon*, (《帕特农神庙的阴影》) London, Maurice Temple Smith, 1972, p. 20, and by Ellen Meiksins Wood and Neil Wood, *Class Ideology and Ancient Political Theory*, (《阶级意识形态与古代政治理论》)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8, p. 64.

公元前 399 年以不虔诚和腐化年轻人的罪名对苏格拉底进行的审判和处罚。的确，这不足以说明在雅典民主方面这可能是“每个人所知道”的惟一事情。正如摩西·芬利先生所说：“据说这是多数暴政的证据……是普通人憎恨天才的证据。”^① 芬利的文章实际很好地处理了因这件事而周知的相对少量的特定事实和围绕事实所建立起来的一些神话两者之间的关系。判决苏格拉底有罪的决议以 281 比 220 票通过，票数接近的事实揭示了决议不是一些普通民众歇斯底里的产物，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如此推定：这个对苏格拉底的严厉判决是典型表征了雅典民主对待他的批评者甚或他的敌人的态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耗费大半生在雅典教书育人这个恰当事实就是一个明证。苏格拉底与 30 个暴君中的某些人有所牵连也不是个决定因素，5 年前 30 个暴君在斯巴达的支持下策动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变。民主复位对苏格拉底不是件好事，不过，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复位的民主制度对曾经试图摧毁它的领导人物表示了过度的宽容。甚至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一个十分钦佩苏格拉底的人，曾在《论自由》一书中用十分夸张的词藻来描绘苏格拉底：“他是其后所有圣人的领袖和楷模”，“是有史以来所有卓著思想家的智慧的主宰”，这时也激动指责民主对苏格拉底的这种可能是误置（misplaced）的慷慨：“我们听的太多雅典人是如何易发怒、满腹怀疑。但实际上，当我们考虑到在他们中间一

^① M. I. Finley, *Aspects of Antiquity*, (《古代各面相》)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pp. 60–73, ‘Socrates and Athens’. (苏格拉底与雅典)

民主

直生活着一个一有机会便想引诱人们颠覆民主的人，那么大多数雅典人更应该由于他们的过于安逸和天然自信而受到谴责。”^① 因此，尽管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定罪并不能体现雅典的民主，但该事件却不足以能使我们从中得出一些概括性和全面的结论。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到的结论告诉我们更多地是欧洲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而不是关于雅典民主本身。

什么是这种民主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引起了当时那么大的争论并引起今天的辩论？其实质在于，公民直接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去。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形式是：设立雅典公民大会，任何公民都有权加入其中，该组织决定政策实行与否。它是一个权利实体，由全体公民组成。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召开 10 次公民大会。它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不是人民每 4 年、5 年或者 7 年选一次政府，而是人们经年累月地自己管理自己。对雅典公民大会规模的估计说法不一，但是雅典居民大概从来没有超过 5 万人。然而出席该会议的人数应该不会少得可怜，因为要对公民的权利和放逐（短期惩罚）做出决定需要至少 6 000 人的法定人数，像这样的决定并不少见。

这个直接民权体系的第二个形式（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就是它实现了不论是政府机关还是法律执行机构的办公部门，都不是由竞选产生，而是通过抽签产生。这同样适用于法庭，被选中的 6 000 个公民，必须每

^① Quoted in M. 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古代民主与当代民主》)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3, p. 90.

年出席陪审团。这么大的陪审团可以很合理地作为代表普通民众意愿的样本。现代法庭中的陪审团也应该做到这一点，但是由于现在陪审团中的 12 人是由立法当局选出来的，他们很可能愿意排斥与自己见地不同的观点，所以很明显不能像古雅典那样构成一个代表民意的微观组织。除了采用普选制（这种体制是美国、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规则性特征）之外，陪审服务是一种最为可能落到任何公民身上的义务，这可能是现代民主中公民可以直接参与法律制定和管理的惟一残存下来的形式。

但是在雅典，这是一个公民在城邦公共生活中期盼可以发挥的许多角色中的一种。除了 10 位将军是由公民大会每年选出之外，其他大部分公共职务通常以公民抽签决定的形式在有限的时间内（通常一年）发挥作用。包括重要的立法会议或者 500 人议会。如果有某个组织每天都管理着雅典的话，那就是 500 人议会了，它一年中有 300 天开会，除了其他的义务，它还承担着准备公民大会日程的任务。但是，人们也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防止议会盗用人民的名义来统治人民：

从议会是由抽签选出和任何人在议会中的服务期限不得超过两年的规定这两个事实来看，很清楚，公元前 5 世纪和 4 世纪的雅典人认为，议会绝不能发展为公司一样的组织，如果不具有公司的特征，那么它将不能代表公众，并且认为议会应该是雅典人民的

民主

公正的样本，它的观点和人民的观点要不谋而合。^①

通过随机抽签来选取政府机构人员，人民享有参与公民大会的权利，这样一个体制意味着，在公元前 462 年到公元前 322 年，雅典实现了人民管理自己的民主理想，它是通过公民参与，而不是现代的代表制度或者代理制度来实现。为了保障在实际操作中，参政不只局限于有闲暇时间献身于政治的公民，雅典人引入了带薪参政制度，起初是给议会成员和陪审服务人员，之后就是给列席公民大会的人以薪水。这一点常常被民主批评家所抨击，他们认为，该制度带来了人们的金钱动机。但这种观点是不公正的，因为薪水通常是比较适中的。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补偿劳动公民因不能参与到其正常工作中去所带来的薪水损失。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业余政府；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认为政府管理是一个十分专业化的行当，就像其他专业的工作一样，所以自然对雅典的现状感到愤怒和轻蔑。外邦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们习惯了君主专政，一人独裁。毕竟，独裁制度是接下来西方 2 000 多年历史的正统思想，同时也是古代地中海和中东的正统思想。欧里庇得斯（希腊的悲剧诗人），在他的《卑微的女人》剧本中，在忒拜的信使和特修斯（雅典之王）的著名对话中提出了他的反对观点。

^① A. H. M. Jones, *Athenian Democracy*, (《雅典民主》)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7, 1977 edn, p. 105.

这个信使把克里安（Creon）王的信稍给特修斯，一到达雅典，便问特修斯：“谁是这里至高无上的王？”特修斯回答道：

这个城堡不是
服从于某一个人的意愿的，它是自由之城。
这里的王者是人民，他们每年轮流管理国家。
我们没有给富有者以特权；
贫苦人的声音拥有着平等的权威。

这位忒拜的先驱显然发现这是不可理解的：

我出来的城市生活在
一人的统治之下，而不是乌合之众的统治下……
一般的人！
没有清晰的推理论证，他怎么能够指导
一个城市在合理的方略下？
经验能比急躁给予更多的见解。你那贫穷的乡
村，
尽管他不是愚蠢的人——怎么样他能够改变思维
从犁田转向政治？^①

^① Euripides, *The Suppliant Women*, in *Orestes and Other Plays*, (《奥瑞斯特斯以及其他剧本：谦卑的女人》) trans Philip Vellacot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pp. 207 - 7.

民主

《谦卑的女人》第一次演出是在公元前 421 年，这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正当雅典被迫和斯巴达达成临时和平，雅典人毫无疑问需要加强士气的时候。但是欧里庇得斯的使者认为柏拉图写的《普洛泰哥拉》中的苏格拉底在一定的程度上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使普洛泰哥拉（Protagoras）成为民主的建议者，而苏格拉底是他的对手：

现在当我们相聚在一起，如果国家正面临着一些建筑方案的时候，我观察到：会邀请建筑师来咨询建筑目的，当是造船时，海军设计者和其相关的人员会被公民大会视为教与学的主体……但是当它是和有争议的国家政府有关时，给出建议的人将会是建筑者或者类似的铁匠、制鞋者、商人和船商，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有家还是无家。没有人提出反对这些，不过有一个没有任何技术资格的人仍嚷着要提建议。^①

普洛泰哥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政治智慧并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事情，而且是任何人都是一分子，在其中每个人有必要一份。“否则国家不能存在。”尽管不是很多人采用了柏拉图特殊的理由来反对民主，但作为一种反对大众无知和无能的专

^① Plato, *Protagoras*, in *Protagoras and Meno*, (《普洛泰哥拉与米诺篇：普洛泰哥拉》) trans. W. K. C. Guthri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6, pp. 50 – 51 and 53 – 4.

业技能问题仍是民主争论中的一个中心话题。

在当今社会，民主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威胁或者是潜在威胁，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多数暴政和公共意见专制的警告。但是在雅典，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内在部分，因为公民治理自己政府的过程必然是在大会和议会上进行公开讨论的过程。那里也没有像现代政党组织这样的渠道，通过这种渠道整合或肃清不同意见。民主和开放的讨论是不可分割的。类似地，确立民主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应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即 *isonomia*。这一重要性可以从以下这些事实中看出：在公元前 404—公元前 403 年间短暂拥有权力的 30 个独裁者（the Thirty Tyrants）判决只有 3 000 名市民有权力审判、其他人只有政府的命令才能执行。大众政治权力建立在对法律面前所有公民地位平等的承认基础之上，以及民主也要确保平等应得到维持。

事实上，是可以超越这些特殊原则与民主的相关性，并且如我们所理解的，可以说在古希腊政治的出现是和民主的出现相联系的。在任何社会政治都能够被合理地定义为政府和权力事务，不管采取的是何种方式。但是，政治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理念（作为公民自己的事务）和政治作为一种理性的理念这两者都规导着政府（与专制暴君们的难以预料的行为相反），这点从民主角度出发容易明确。“那么，最重要的是，希腊城邦发展史的显著标志是政治化和民主化的亲密结合”。^① 那种

① Wood and Wood, (木与木) op. cit., p. 15.

民 主

不得不捍卫政治本身以防范民主的理念，像一些当代作家所建议的那样，^① 可能不被古雅典人们所理解。

雅典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关键是积极公民身份的理念。公民身份不是那种已稀释化了的近代意义上的成员身份；它意味着原初意义上的成员身份，类似于人体的部分结构。它是一个有机关系，这点是连反对民主的亚里士多德也认同的。城邦或政体是一个整体，其中个人是部分，自身不自足，依赖于城邦，这（城邦）正如在现代自由思想中个体所被通常想像的那样。^② 因此，公民仅能通过作为整体社会的一部分来繁荣昌盛。伯里克利，在（修昔底德认为是他作的）葬礼演讲中，清楚知道公民从公共生活退入隐私生活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这里每一个人不仅关心他自己的事，而且关心国家的事。我们不能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是一个只关心自己事情的人；我们说他根本没有事务（business）。”^③ 民主的成功依赖于公民对他们城邦义务的接受，及由此维持着与公民城邦同命运的感觉。“对于伯里克利及其 5 世纪的同时代的人来说，私人没有责任心，如同我们现代意识中对傻子所理解的那样，因为他们对公共事务不加关心。”^④ 因此，希腊的民主实践提出了这样

① see, for example, Bernard Crick, *In Defence of Politics*, (《捍卫政治》)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4, 第三章，“捍卫政治反对民主”。

② See Aristotle, *Politics*, (《政治学》) Book I , Ch. 2.

③ Thucydides, op. cit., pp. 118 – 19.

④ Peter Green, *A Concis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古希腊简史》)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3, p. 79.

一个问题：一个积极的、参与性民主在有效运作之前，是否要求个人们感到他们分享了共同体身份或一种集体或整体的利益这种感觉。

然而谁构成了公民主体？谁是“人民”？在雅典社会有3个主要群体被排除在外。首先，它毫无疑问且想当然地将一半成人——妇女排除。妇女的政治权利以及大多数政治活动被限制，所有官方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是男人所代表，这种状态持续到大约100年以前。第二，公民主体排除了在雅典居住和工作的外国人和混血儿。换句话说，公民也就是内部人员。第三，它排除了奴隶。公民只能是拥有自由，高贵的人。这意味着公民仅占总人口的1/4或更少。不过，仅占整体人口一定比例的雅典公民人数，在公元18世纪晚期之前，远比其他任何公民实体还大。

这通常暗示着由雅典人实施的积极自治政府只有在奴隶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或者可能也只有在为民主提供财政来源的帝国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第一个暗示的要点是，雅典实际上是在维护一个安闲的上层社会，那么就错了。实际上，雅典大多数的公民是辛勤劳作的人们，他们需要用恪守公职换取来的微薄薪俸来补偿他们每日的收入。这就是职务报酬问题为什么成为“一个政治象征”^①的原因——这正如伯里克利和欧里庇得斯宣扬的那样，这是一个民主分子认为贫穷不应该是政治参与的障碍的象征。每当寡头政治接管民主政治时，

① See J. K. Davies, op. cit., p. 69.

民主

职务报酬是第一个被废除的。在雅典，公民的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是很难共存的，直至今日，也是如此。但是民主的整个要点是给与穷人与富人以同样的治理国家的角色。至于第二个暗示，就是民主，或许像英国 19 世纪的自由一样，是寄生于帝国，A. H. M. 约翰指出，雅典帝国消亡之后，民主仍旧在 4 世纪运行，而且，事实上，自从参加集会的报酬被延伸到支付其他公共职务报酬后，似乎那时任何东西都要比以前昂贵好多。^①

许多民主作家相信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经验与现代世界的民主政治关联不大。对这个观点我驻足思考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相信事实是截然相反。在希腊民主的经验中，在民主定义中和在为实现民主的斗争中所涉及的大多数问题都已然清楚。艰苦斗争实现民主，以反抗对出生、财富特权的维护；抗议把民主看成是一群“乌合之众”和“暴徒”的法则；深信穷人和工人没有政治能力；政治平等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艰难共存；争取民主与为自由言论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斗争之间的关联性；民主依赖于一种身份的共同体感觉——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希腊民主经验中发现，而且所有这些都在民主的现代发展中及由此产生的争论中重现。

重要的是，民主的希腊概念摇摆不定，至少直至卢梭和《社会契约论》的出现才确定。民主意味着人民自己统治政府；现在倾向于称为直接民主。代表的选举（而不是由于他们的选

^① A. H. M. Jones, *op. cit.*, pp. 5–10.

举是根据抽签这个问题）被希腊人视为是一种贵族制的设计，不是一个民主要素。当然，在现代社会里，希腊模式的直接参与在多大程度是可能的，这是另一回事了；虽然一个拥有40 000人的公民实体比许多当今的组织和机构要大得多，而这些组织和机构认为在自身内部实行直接民主是不切实际，不值得的。这种公民直接参与的结果所拥有的某种显著意义，这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想像的：“城邦里很少有分立的或是专业的国家设施（state apparatus），……准确的说，雅典民主政治象征着拒绝‘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任何划分。”^① 这对唤起民主最初的及实际的意义有好处：国家和社会是一回事；通过积极参与政治，公民实体直接自我治理；每一个公民不时地承担义务。

① 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p. 43.

第三章 民主的复兴

民主的基本理念，即一切人（至少一切男子）都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穷人的统治或人民的统治，推翻传统社会等级制度，或许从来就没有随芸芸大众在历史中湮没而消失殆尽。确实，在历史紧要关头或革命时期，这些抱负总会不失时机地脱颖而出。“亚当耕兮，夏娃织兮，谁曰士绅？”1381年的英格兰抗税者这样问道。据说参与1549年诺福克的基德起义（Ket's Rebellion）的人曾声称：“过去是士绅统治，现在该由他们（即平民）来统治了。”^① 揭示或恢复这些掩藏在历史背后的平民理念或抱负的工作业已开始，但这项工作可能仍然是民主时代中历史学家们的重大事业。人们开始公开出版1647年普特尼（Putney）论战的内容，开始意识到平等派的意义，不过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至于掘地派，甚至是最近才被发现的。妇女史和妇女运动史仍在撰写之中，有许多东西仍有待

^① 引自 Christopher Hil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17世纪英格兰的变化与承袭》),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4, p. 182.

研究。

因此，关于近代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确切来讲开始于何时，不可能有举世公认的答案。然而，民主演化过程的复杂性至少源于两股潮流。其一，平等主义，它植根于宗教改革的新教教义之中，同时也根植于反抗旧有统治者的、甚至是激进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中，这种理论和实践使平等主义逐步发展起来。其二，从封建制中继承而来的意识形态遗产和制度遗产。等级会议，通常由贵族、教士和平民参加，在封建社会内部已逐渐形成，它大致代表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成员或群体。现在看来，这两股潮流可能最终会合而为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这种汇合。

可以肯定的是，新教创始人一点儿也不想鼓励人们犯上作乱。路德认为，“服从一个作恶的君主，胜于服从一个行正义的庶人”，他还在精神事务与世俗事务之间，在适用于内在灵魂生活的规则和价值与适用于堕落的、罪恶的外部世界生活的规则和价值之间，作了清楚的区分。1525年他告诉施瓦本起义的农民说：“福音与此世事务无涉。”天国与此世的区分虽然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分，却是难以作出的。无论路德还是加尔文都认为，世俗统治者无权管辖精神事务。但精神事务终止、世俗事务开始后，又该由谁来裁断呢？全体信徒作为在圣职身份上都是平等的这一学说仅仅适用于精神方面的事务。然而正是路德指出，“当一个牧师被杀害，则禁止全国的宗教活动”，并

民主

问，“为什么一个农民被杀害后不（禁止全国的宗教活动）呢？”^① 一点儿也不奇怪，新教中许多地位较低的皈依者可能在一种更为宽泛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上将这一信条解释为一种平等主义的信条。伊丽莎白时代有个贵族拥护教权，认为“他们现在向主教们开火，要是被容忍了，他们将会向贵族开火”，^② 说的不算离谱。

相信上帝直接与个人对话，这让新教徒充满自信，并献身于从前西方人可能闻所未闻的理想。从这种宗教献身过程中，迸发了近代在人民权力方面的最初尝试。将这些尝试称为“民主”或许会引起错误的期待。它们既不是开放的，也不是宽容的，它们的平民特征使得有产阶级对之充满了害怕和恐惧。1536年，所谓的再洗礼派教徒占领明斯特这件事，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一再为体面人士所诟病，在这些人看来，“民众”一旦取得政治权力，必然导致预料之中的混乱、野蛮和疯狂。加尔文教徒控制的16世纪70年代的根特和天主教同盟控制下的巴黎，近代以来或许最早进行过人民权力方面的演练，但并没有持续多久。

同样重要的是，1572年圣巴塞罗缪节在巴黎发生令人恐怖的大屠杀后，法国的胡格诺教徒被迫设想出一套道理，以证

^① 路德的引用出自 George H. Sabine and Thomas L. Thors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政治理学史》), New York, Holt - Saunders, 1973, p. 338; 以及出自 *Luther's Works* (《路德文集》),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第 46 卷, 1967, Robert C Schultz 编, p. 35, 以及第 44 卷, 1966, James Atkinson 编, p. 132。

^② 引自 Christopher Hill, 前引书, p. 191。

明他们反抗天主教的统治者是正当的。到后来，荷兰人利用这套道理，对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进行了划时代的反抗。这套抵抗理论根植于传统上对国王和暴君的区分，其当然的结论是，人们虽不应反抗合法的王国，但有义务反抗暴君。在 16 世纪 70 年代加尔文教的政治文献中，这一旧理论被引人注目地向前推进。

在《法兰克高卢》（*Francogallia*）的作者弗兰西斯·霍特门（François Hotman），《反暴君论》（1579 年）的作者（待考），以及《论统治苏格兰之权力》（与《反暴君论》同年出版）的作者苏格兰人乔治·布坎南看来，统治者是否变成暴君，何时变成暴君，这由人民来决定。这三位作家一致认为，国王权威的最终来源并非上帝，也不是传统，而是人民，无论是由于人民最初通过某种决定建立君主国，还是他们要经常性地重新选举统治者。霍特门指出，尽管“有可能只有人民而没有国王，……但无法想像只有国王而没有人民，正如无法想像只有牧人而没有羊群一样”，^① 他认为古老的法兰克高卢王国“不守继承法，王位不是作为私人遗产，而是通常根据人民的选举和决定相授受”（第 247 页）。霍特门借助一种想像的过去，质疑世袭制，宣称人民有权选择统治者，尽管暴君问题可能并不存在。《反暴君论》的作者同样宣称，由于“没有人出生时就头顶王冠，手执权杖，没有人能够在没有人民的情况下自己当

^① François Hotman, *Francogallia* (《法兰克高卢》), Ralph E. Giesey 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01. 括号里另外的页码索引出自该本。

民 主

上国王，君临天下，……结论必然是，国王最初是由人民任命的。”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在所有秩序井然的王国里，这一传统至今仍不绝如缕。”^① 乔治·布坎南也声称，人民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法律比国王有权，人民比法律有权，”因为“人民为法律之父母，为其制定者。”^② 布坎南还像《反暴君论》的作者那样争辩说，君主制的功能在于为人民谋福利，荷兰 1581 年发布的《脱离诏书》中也重复了这一点：“上帝不是为了君主才造了人民，……相反，是为了人民才造了君主。”^③

这么说来，近代伊始，人民主权学说还是发展得相当不错的。人民制定法律，选举统治者；统治者是人民的仆人。之所以有这么激烈的声称，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恰恰正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套理论，主张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主权。这套理论成为 17 世纪、18 世纪欧洲的主要统治模式——绝对主义的思想基础。在有些国家里，比如俄罗斯和奥地利，绝对主义甚至持续到了 20 世纪。当时这一理论最重要的倡导者是让·博丹，他的《国家六论》也发表于 16 世纪 70 年代。他说：

①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反暴君论》), 英译本题名 *A Defence of Liberty against Tyrants* (《为反对暴君捍卫自由一辩》), H. J. Laski 编, London, Bell, 1924. 括号里另外的页码索引出自该本。

② George Buchanan, *De Jure Regni apud Scotos* (《论统治苏格兰之权力》), London, Richard Baldwin, 1689, p. 59.

③ 引自 *Texts Concerning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尼德兰起义资料编》), E. H. Kossmann and A. F. Mellink 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16 – 17.

主权者权威和绝对权力的最重要标志，本质上是有权利通常在没有得到其臣民同意的情况下，在他们中间强制推行法律，……法律不过是主权者行使权威时的命令。^①

17世纪，绝对主义盛极一时，很多传统的等级会议都陷入停顿。与近代制度是和平演进的这一流行的神话相反，在欧洲近代早期，这种会议渐次演进为近代议会，比如像英国所发生的那样，不过是例外而非常规。

然而究竟是谁构成了“人民”？加尔文教派和胡格诺教派有力地断言有反抗君主的权利，那是谁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我们碰到那种对多数人、对民众的恐惧，民众是近代早期民主再度出现时被反复提到的主题。无论是布坎南还是《反暴君论》的作者都明确地论及将最终权力交付民众手中这一问题，两位作者在提到民众时都却说它是“多头怪兽”。《反暴君论》中的回答是，“当我们说到一切人民时，我们的意思是，只有那些掌握着来自于人民的权威的人，即所谓长官，……才能代替人民，或者说是人民设立他们……来代表全体人民的”（第97页）。布坎南走的路子也差不多，不过稍微激进一点。霍特门的理论中尤其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他著作的第一版里面使用了“平民”(populus)这一词，在1576年版中，他又插进去 *ordines* 这

^① 引自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p. 50.

民主

这个词，意思是社会各阶层的指令，以“澄清”意思，或者我们可以猜想，他是想打消人们因第一版里那种危险的民主味道所产生的恐慌。

这些作家都面临着民主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的策略问题。很明显，某种人民主权的观念，为挑战绝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惟一可能的基础。然而人民主权的语言就其本质来讲是普遍主义的。怎样才能为了那些有责任感的、值得尊敬的人士的利益而运用这种语言，而不是将一件意识形态武器交付到“民众”和那些声称他们说话的人的手中？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利用诉诸于“人民”的权力的同时，将“人民”界定得狭窄到足以排除大多数现实中的男男女女。综观自由和民主运动的全部历史，这个困境始终反复出现，因为激进主义团体一再推行一种明显带有普遍主义诉求的逻辑，而那些值得尊敬的阶级却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满足这种诉求。

在这些激进主义团体当中，有 17 世纪 40 年代后期作为英国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而出现的平等派，他们提出过一些非常彻底的要求，可以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有组织的民主主义政党”。诚如 A·L·莫顿（A. L. Morton）所指出的，他们曾公开发表过一份详尽的改革和政策纲领，他们有领导层，缴纳会费的人被组织进地方团体中。^① 然而，他们并不是一个议会政党。他们虽然在议会中有一些支持者，但他们的势力在议会之

^① A. L. Morton, *Freedom in Arm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pp. 30 and 50.

外。他们的方针是通过示威、请愿以及组建军队将这些支持者动员起来。内战之前选出来的议会，已经不再能代表那些向国王开战的人的意见。像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那样，战争的经历使得参加战争并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们重新更有信心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平等派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识，而且从这种意识中导出了一套逻辑清晰的民主政治要求。1647年秋，平等派与军队领导人（后者主要是克伦威尔和爱尔顿）在普特尼有一场著名的论战。平等派争辩说，站在议会这边作战的人应当被授予选举权。马克西米利安·配第（Maximilian Petty）说：“如果一个民族进行了7年的战争，并且是为他们的自由而战，他们当然能把自己从暴君统治下解放出来了。”^①当爱尔顿争辩说选举权应该严格限于有产者时，爱德华·塞克斯拜（Edward Sexby）愤怒地反驳道：

我们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战场上拼命，我们这些等级在这个王国中都没有什么财产可言，可是我们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然而现在的情形好像是，除非一个人在这个王国中有一份固定的产业，否则他在王国中就没有权利。我怀疑我们是受到了极大的欺骗。如果我们在王国面前没有任何权利，那么我们仅仅是一些雇佣兵罢了。（第69页）

^① 引自 A. S. P. Woodhouse, *Puritanism and Liberty* (《清教教义与自由》), London, J. M. Dent, 1938, p. 89. 以下所有有关普特尼论战的引文均出自该本。

民 主

当爱尔顿问起《人民协议书》这一新提出的法规中是否包括了每一个男性居民都应该有投一票的权利，托马斯·伦伯勒（Thomas Rianborough）以政府需有人民同意这一著名的原则作答：

我的确认为，英国国内的穷人与最高贵的人士一样，也要度过他的一生。由于这样，先生，我真的认为，在一个政府之下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同意将自己置身于这个政府之下，这一点非常清楚；而且我确实还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英国国内的穷人根本就不受那个他从未明言将自己置身于其下的政府的约束……（第 53 页）

约翰·威尔德门（John Wildman）讲的也差不多：“我持有如下这条无可辩驳的政府原理：一切政府都在于人民的自愿同意。”（第 66 页）

然而就算我们支持平等派，我们也必须问：谁才算人民？显然，妇女不算，虽然平等派至少有一次提到妇女时宣称“在权利请愿书和国家的其他法律中所包括的那些自由和安全方面，与本国的男子拥有同等的权利”（第 367 页）。C·B·麦克弗森曾论证说，平等派也想把工薪阶层，或者说雇员，排除在选举权之外。我认为，这个看法对于平等派的平等主义来讲是

非常不公平的。^① 然而似乎很清楚，平等派确实不止一次地承认，在他们的设计方案付诸实践时，是不会给一切男子都授予选举权的。一种普遍主义的措词又一次掩盖了颇为严峻的现实。

无论如何，平等派确实挑战了政治权利为有产者或地主专有这一传统观念，并且提出，就连那些被克伦威尔傲慢地描述为“除了呼吸之外别无权利”可言的人们也应享有政治权利这一民主主义的主张。他们还宣称人民高于议会。这是 1646 年《万民抗议书》的作者——可能是理查德·奥维敦（Richard Overton）——提醒下议院时说的，“我们是你们的委托人，你们是我们的代理人；……我们凭借我们自身拥有的权力主宰着你们……因为如果我们认为合适的话，我们可以撇开你们自主行动；……”^②

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偏离了民主是由人民自己统治这一希腊的概念，问题成了人民有权利选择他们的代表，并让代表们负责任；此外，在英国背景下，议会已经变成争取民主的斗争的焦点，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如此。另外，平等派从来不接受主权属于议会的看法。人民，不管如

① 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我对 Macpherson 关于平等派的观点的批评，见 ‘Revolution, the Levellers and C. B. Macpherson’，载于 Francis Barker 等人编的 *Literature and Power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7 世纪的文献和权力》), Colchester, University of Essex, 1981, 那里可以提供更多的参考。

② Don M. Wolfe 编, *Leveller Manifestoe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清教革命的平等派宣言》), New York, Thomas Nelson, 1944, p. 113.

民 主

何界定，才是主权者；议会中的议员不过是人民的代理人，在议会中行使大众的意志，那些不照此行事的议员应被赶下台。关于议员的选举，平等派趋向于一年一次，至少两年一次，而且提议，任何人都不得连任两届。他们还希望不仅议会奉行大众选举的原则，行政官员和法官也应该一年选举一次。^① 在他们关于政治和社会新体制的设想中，人民权力实居于中心地位。

然而，在实行过程中，克伦威尔和爱尔顿的比较保守的观念却占了上风，财产仍旧是政治权利的前提，爱尔顿在普特尼所讲的“如果（要想）维护财产权的话，就不能规定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自由”（第 73 页）这个观点被占统治地位的财产所有者所接受，并被视为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真理。尤其是经过 1688—1689 年政治安排（political settlement）后，人们总是更加公开地宣称政治权力属于有产者，是有产者的权利。

那位其名字总是与英国 1688—1689 年政治安排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当然是约翰·洛克了，他的《政府论下篇》，尽管被人们当成为这次政治安排所作的一种辩解，但非常可能是为了回应 1679—1680 年的“排斥危机”（Exclusive crisis）而写成的。洛克确实被人们视为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既然如此，按照通常的思维模式，他的名字也与民主的理念相关联了。有什么理由呢？按照洛克的观点，作为对抗暴政

^① Don M. Wolfe 编，《Leveller Manifestoe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清教革命的平等派宣言》），New York, Thomas Nelson, 1944, p. 269.

和专制的公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应该建立在契约和同意之上，政府是为了人民利益而设立的财产托管机构。如果这种托管遭到了破坏，比如辉格党人坚持认为詹姆斯二世时代就是如此，人民就有权利反抗这个政府，并以另外一个政府来取代它。因此，洛克属于契约论传统，契约论通常包含着政治权力和权利最终属于人民这个义涵；洛克明确提出和认可反抗权这一事实，也使得他的学说具有某种颠覆性的力量，并为后来的激进主义者有效地加以利用。

从另一方面来说，洛克的政府在于同意这一观念并不具有民主精神。人民可能会同意任何一种他们喜欢的政治或宪法的统治形式，“洛克试图为任何政府确定适当的权威来源，洛克并未在基于同意基础上的政府的不同形式之间作出区分。”^①同意之有必要是相对于一个政府的体制或结构来讲的，而不是相对于某些特殊的政府来讲的，更不用说特殊决定或政策了。

更有甚者，洛克对于同意包括些什么的解释过分通融而丧失掉这一观念的许多实质。由于只有成人才能有同意的表示，洛克必然在逻辑上承认儿童“生下来是没有国家、没有政府的受监护者”^② 一个（男性）成人在他成年时表示他对政府的同意。怎么表示呢？是通过接受他可能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不管多少财产。但是还有一些什么都无可继承的人又怎么讲

① Geraint Party, *John Locke* (《洛克》),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8, p. 96.

② John Lock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政府论下篇》), i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 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民主

呢？对于他们，洛克保持沉默。是真的不需要无财产者的同意吗？洛克的拥护者不情愿承认有可能是这样。洛克论证说，英国有基于同意的政府，这仿佛暗示了，绝大多数英国男性成人欣然同意不享受政治权利，而这种看法似乎太不合情理。洛克还提出，一个人存在于某个特定的国家，这种存在意味着这个人默示同意该国的政治体制。这样一来，同意这个似乎充满活力、积极的概念，几乎被彻底抽空了。

洛克的所有权概念，是出了名的含混不清的，它有时是指“生命、自由和财产”，有时仅仅是指财产或者平常意义上讲的所有物，这也使得人们难以肯定，政府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一切人的利益呢，还是仅仅是为了通常意义上的财产所有者的利益？麦克弗森表明，在洛克的社会中，会存在着双重的社会成员资格，只有财产所有者才拥有完全的政治权利。^① 这可能是洛克的本意，也可能不是。但这的确有利于有地产的上层阶级以那种方式来解释他。这样一来，人民主权、同意和反抗权这些原则，连带它们可能具有的激进义涵，都被洛克纳入一个以财产和所有权为核心的理论之中。从而，那些有可能促成民主的理念，却为有产寡头的统治作了辩护。诚如巴兹尔·威莱（Basil Willey）所言：“‘人权’到了那时仍是有产者的权利。”^②

^①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 pp. 247 – 51.

^② Basil Willey,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 (《17世纪的基本情况》), London, Chatto & Windous, 1934, p. 240.

与此同时，“民众”或者说“暴民”（mob）——后面的这个词在这段时期里开始被普遍使用——被明确排除在人民的正统定义之外，洛克的朋友詹姆斯·泰瑞尔（James Tyrell）清楚地说明：“我希望读者记住，我用的人民（people）这个词不是仅指庸人百姓（vulgar）或暴民，而是指整个共同体，其中包括牧师、贵族和平民”；并且说“当我用人民一词时，意思不是指庸人百姓或混杂的民众（mixed multitude）。”^① 同样，当时流行的“自由民”（freemen）也是在一种非常严格的意义上来使用的，比如哈德威克爵士曾宣称：“我们这些有财产的人才是自由民。”^②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区分了不动产的终生保有者与纯粹的居民，并认为，既然不动产的终生保有者拥有国家，他们就有权利制定法律并在纯粹居民中间强制推行，他说，那些居民实际上不过是些“寄宿者”罢了。^③ 有人争辩说，只有有产者阶层才具有一个自由民所必需的经济自立能力。从这个论点当中本来可能推导出，应该尽可能地分散财产，以扩大公民主体的范围。但 1688 年以后，辉格党支配下的议会往往趋向于限制而不是扩大选举权的授予，有些人甚至丧失了他们原有的投票权。根据 1716 年的一个法案，每一届议会的持续时间从 3 年延长到了 7 年，而且许多选举都是没有

① 引自 J. P. Kenyon, *Revolution Principles* (《革命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48–9。

② 引自 H. T.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自由与财产》),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7, p. 128。

③ 同上, pp. 88–9。

民主

竞争的选举。^① 18世纪的不列颠，并不是像辉格党历史学家所显示的那样，不断朝着民主政治迈进，而是毅然决然地开民主政治的倒车。那些穷人，或者是“暴民或人民的残渣余孽（dreg of the people）”，查尔斯·詹姆斯的父亲亨利·福克斯这样称呼他们，由于他们无知，而且缺乏据信是财产带来的自立能力，因此，他们不仅被认为是全然没有能力去统治，甚至被视为对自由的威胁——自由曾使得英国声名远播。约翰·卫斯理说：“人民在政府中占的比重越大，一个国家所享有的公民自由或宗教自由就越少。”^②

埃德蒙·柏克，这位后来成为近代英国保守主义开山鼻祖的辉格党政治家，肯定会同意这一点。柏克的名字，不仅常与保守主义相联系，而且还常与英国整个民主政治的基本哲学联系在一起，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关于政党在政治中的作用的看法，以及他对代议制的本质的说明（后面这一点见第8章的讨论）。这本身就值得玩味，因为柏克并不是一个民主派。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许多人，包括柏克的一些辉格党朋友和同僚如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等，都热情洋溢地为之欢呼。柏克在反对这种狂热的过程中，用激烈的言辞痛斥民主。他鄙视那种认为某个人的票与任何其他个人的票应该价值相等的看法：“据说，2400万人应该压倒20万人。确实是的；如果一个王国的

① 见 Kenyon, 前引书, pp. 181–2 and 203。

② 引自 J. H. Plumb,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英国18世纪》),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0, p. 94。

宪法是一个算数问题的话。”他还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一观念的始作俑者：“民众的暴政是多重的暴政”，这一观念至今被那些对民主怀有疑虑的人们激赏不已。^①

当然，柏克确实坚定地信奉议会统治和议会主权，但那与民主不是一回事。他反对议会改革，他所捍卫的议会整个是由土地所有者统治的议会。在柏克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正统观念看来，这完全是应该的。土地所有者应该统治国家。当然了，能力应该和财产一样，能在立法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财产“在代议制中的影响应该占绝对的比重”。大的财产所有者应该统治也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在财产较少的一切等级的周围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壁垒”（第 140 页）。柏克估计，应该享有投票权的即他所谓的“人民”，大约由英格兰和苏格兰的 40 万人组成。他非但不希望看到被授予选举权的人数有所增加，甚至在 1769 年时还赞成减少享有选举权的人数。^②

法国大革命，由于它相信某种平等，这种平等暗示了“一切职业都是荣誉的”，诸如“理发匠”、“蜡烛制造商”这些操持贱役的人也应该有权在政治上说话，本身就是向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开战，在柏克看来：

①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法国革命论》),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8, p. 141. 同时见 pp. 287 and 291. 括号里另外的页码索引出自该本。“民众的暴政是多重的……”出自一封 1790 年 2 月 26 日的书信。

② 见 C. B. Macpherson, *Burke* (《柏克》),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2 and 48.

民主

这类人是不应当受到国家的压迫；但如果允许像他们这样的人个别地或集体地来进行统治的话，国家可就要遭受压迫了。在这一点上，你们认为自己是在与偏见作斗争，但是你们却是在向自然开战。（第138页）

甚至连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各位思想开明的大师，不管他们在倡导舆论宽容和舆论自由时是多么大胆，也决不能算是民主派。狄德罗认为政治权利是属于财产所有者的，伏尔泰同样把“人民”等同于中产阶级。著名的美学家、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明确地给出他对“人民”的定义：

关于人民这个词，我并不是用它来指麻木不仁的老百姓……每一个靠其财产的收益过着体面生活的人以及每一个拥有土地一家之主都应该被视为一个公民。

其他人则不能成为公民，“直到他们靠努力和勤奋为自己取得地产”。^① 这实质上是辉格党人的观点。选举权依然是有地者的特权。

然而在穷人、暴民、残渣余孽被严格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却认识到，同样是这些

^① 引自 Sabine and Thorson, 前引书, p. 524。

无知的、粗鲁的民众却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早在 1684 年迪安·希克斯（Dean Hicks）就写道：“穷人是政治躯体的手足……他们开垦着我们的土地、挖掘着我们的矿藏、清扫着我们的街道……没有穷人，国家将无法维续。”^① 或者像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以他惯有的矛盾和嘲讽的风格所讲的那样：“很明显，在一个不允许有奴隶的自由国家里，最实在的财富必然是出自于劳苦民众手中。”^② 也就是说，自由的国家与不享受选举权的劳苦大众是共存的，穷人在经济上必不可少，但在政治上却是危险的。这种矛盾的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① 引自 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革命的世纪》), Edinburgh, Thomas Nelson, 1961. p. 309。

②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蜜蜂的寓言》), Philip Harth 编,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0, p. 294.

第四章 平民政治

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才不再仅是一个文词，而是成了政治词汇中的一员。

——欧内斯特·威克利^①

改变近代民主历史的，最主要的是民主的理念——如上文所述，在18世纪，民主的理念只是一种虚弱无力的存在；而是平民的行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代进发的参政大潮。我们几乎可以说，一下子，曾经作为哲学家或者平民激进分子头脑中的抱负或梦想的政治理念，被提上了现实政治的日程。不仅法国乃至欧洲是这样，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先例促成了海地加勒比人首次奴隶起义的成功以及南美洲

^① E. Weekley, 转引自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1780年至1950年的文化与社会》),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 p. xiv.

的政治独立运动。这些运动都提出了民主问题，即人民权力问题。

这些运动提出了问题，但它们未必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当人民更有可能获得现实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时，过去那种对暴民的恐惧也进一步增强了。因此，在1789年以后的平民政治时代，在这个朝向民主前进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反对民主的声音也日益增强，这种反对具有比自柏拉图以来的任何时代都远为复杂的理论基础。

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10年后，美国制定新宪法，在围绕这两件事情的辩论中，对民主的反对和批评首次被有机地连贯起来。在这些辩论面前，这个新生国家的前途未卜，因此，对政治的讨论自然而然触及基本原则问题。要让各州及合众国接受民主制，存在着相当大的压力，在实践上也几乎不可能，因为当时民主的意思仍然是指人民直接参与统治。在讨论公职轮换问题过程中，有人提出每年举行一次选举。激进分子托马斯·潘恩虽然接受事实上无法避免的代议制，而不认可直接民主，但他极力主张，为了让“那些被选举出来的人不会因形成自身的利益而脱离选民，深思熟虑后会发现，经常进行选举是恰当的。”^① 在纽约州，像“木匠、修鞋匠和屠户”这类干粗活的人要求，州宪法应该取得人民表决的认可。在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戈登反对政治权利只限于有产者的想法，“富人

^①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常识》),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6, p. 67.

民主

将比没有政治优势的穷人拥有充分的优势。仅仅财产不足成为资格证明，为什么缺乏财产就能成为取消资格的原因呢？”^① 民主派一般赞成单院制议会或者以某种能最直接的方式反映或体现人民意志的一院制立法机关。

然而在极大程度上，得势的并不是民主派，而是辉格党的国父们，他们与他们在英国的搭档们一样，念念不忘要对人民意志设立限制，要保护富人和有产者的利益，要将选举权严格限于财产所有者。当然了，相对于欧洲来讲，财富确实是更为分散了。因此，尽管在马里兰州，财产作为投票资格的限制程度高过了许多人的愿望，但仍有过半数的男性自由民被授予了选举权。^② 在宪法制定者中相对比较激进的杰弗逊建议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为了给尽可能多的男性自由民授予选举权，有必要采取措施，将土地分配给更广泛的人群。他不信任富人，而是时常声明他相信人民。但是与他同时代中的许多人一样，他对什么是人民虽有卓尔不群的洞见，但这并不妨碍他偶尔像柏克那样，使用“粗鄙的民众”这样的字眼。^③

杰弗逊批评弗吉尼亚宪法，说它单一地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立法机关。他坚持认为，这将会导致专制主义：

① 引自 Elisha P. Douglass, *Rebels and Democrats* (《造反派与民主派》),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5, p. 153.

② 同上, p. 54。

③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美国的政治传统》), London, Cape, 1962, p. 28.

173 名专制者与一个专制者一样令人难以忍受……我们曾为之战斗的统治并不是一个选举的专制统治，而是这样的一种统治，在这种统治里，统治权力应该在不同的机关或地方机构中具有相当的分散和平衡，以至于没有一个机关会超出它们的法律权限而不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①

杰弗逊及其同仁们所追求的并非民主制或人民的统治，而是有限政府，或者他们所谓的“共和国”或“代议制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穷人有参与权，可发言，但不能在重要性上超过富人，也不能不按照有产者和富人的利益来投票。“所有的社会都分成少数人和多数人。少数的人富有、出身好，另外的人是人民群众。”汉密尔顿在 1787 年的联邦大会上讲的这席话，被人当做至理名言一再重复。“将一切权力授予多数人，他们会压迫少数人。将一切权力授予少数人，他们会压迫多数人。”因此，有必要让那些“富有、出身好的人在政府中享有独特的、固定的比重”，这样他们就可以“制约民主制的轻率”。^② 这可能是亚里士多德说过的。约翰·亚当斯解释说，这种制约职责由参议院承担：

^① 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弗吉尼亚州小记》), 见 *The Portable Thomas Jefferson* (《袖珍杰弗逊文集》), Merrill D. Peterson 编,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7, p. 164.

^② Richard B. Morris 编,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汉密尔顿与建国》), New York, Harper Torchback edn, 1969, pp. 154 and 152.

民主

富人应该在宪法中设立有效的屏障，以避免被剥夺、被抢劫、被谋杀，这跟穷人一样，因此，不能没有一个独立的参议院。①

总的来说，美国联邦宪法和州宪法的制定者们对他们的作品是很满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权力确实被分散了，就可以对大众选举的下议院加以限制。在汉密尔顿看来，代议制民主避免了“简单的民主制”明显固有的危险：

如果将审议权或司法权全部或部分地委诸人民的集合体，可能就会造成错误、混乱、不稳定。但是代议制民主——其中选举权利得到很好的保障和控制，立法、行政和司法职权被交付给真正地而不是名义上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来行使——在我看来很可能是理想的、有秩序的、持久的。②

意思是说，选民们应该选择那些在他们看来比他们自己更出色、更明智的人来统治他们，那些人比他们自己还了解他们

① 引自 V. L.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美国思想主流》) vol. 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7, p. 137.

② Morris, 前引书, p. 131。

的真正利益所在，因而人民会接受其决定。^① 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表达过许多相同的看法。因此，代议制政府加上分权，被视为防范民主制之危险的安全措施。

相当吊诡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相对于人民统治理念的另一种民主观的萌芽。这种民主观的根源在于将社会理解为一个具有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利益的集体，诸如富人的利益和穷人的利益，在民主的统治体制下，各种各样的利益都被视为是正当的，因此都具有发言权。“有财产的人和没有财产的人，在社会中始终构成了截然不同的利益。”^② 阶级和不平等被认为是永久性的、不可消除的，并可体现为政治体制之内的不稳定的平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多元主义理论的滥觞。

然而，法国发展出了一种相当不同的民主思想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共同利益不是不同的集团利益的总和或折衷，它实际上是与局部利益相对立的。这种思想传统最初来源于让-雅克·卢梭，卢梭的社会概念，至少《社会契约论》中的社会概念，与诸如霍布斯、边沁等个人主义作家的社会概念正好相反。在卢梭看来，社会在本质上是分散的个人借助法律和权威而形成的集体。卢梭强调，社会的普遍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意也不是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大于个人意志

^① 见 *The Federalist* (《联邦党人文集》), Max Beloff 编,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8, p. 366.

^② 同上, p. 43。

民主

的总和。因此，他非常清楚地断言，多数人的决定并不必然体现公意或者表达了普遍利益，这要取决于每一个人是仅仅按照他或她的个人利益去行动和投票呢，还是考虑到了共同体的利益，并按照共同体的利益去行动。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同麦迪逊和其他美国宪政主义者观点一致，他们也不认为多数决定就必然正确，但是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有必要对多数人的意志从制度上加以制约，而卢梭则是简单地接受了多数决定的原则并试图构想，究竟是在哪些条件下，多数人才会真正地代表整个共同体，而不是代表集团利益或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

在这方面，卢梭的结论通常带有一种悲观主义和怀旧主义的色彩。只有在那些较小的、相对单一的社会中，这些社会还没有被制度化和由此带来的劳动分工所撕裂，公民们似乎才更能意识到他们是整个社会的成员，而不是意识到他们是社会中的一个特定群体的、职业的或利益集团的成员。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卢梭成为某些雅各宾主义者以及其他革命者的崇拜偶像。不管正确与否，他总被解释为鼓吹人民主权或者公意高于一切党派或集团利益的哲学家。在美国国父们以及像柏克这样的辉格党人看来，这种观念预示着民主的或者平民的暴政，并对少数人的权利和个人权利构成威胁。但是，在法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民主派人士坚定地认为，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富人和有产阶级不应该再有能力妨碍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

西耶尔（Abbé Sieyès）在他 1789 年发表的著名的小册子

《什么是第三等级》^① 中宣告，第三等级即平民，并不是与其他两个等级——贵族和教士——并列的一个等级，而是国家本身。由于国家是代表惟一意志的惟一实体，旧有的等级在国家里面已经没有一席之地（第 154 页以下）。所以关于什么人构成了国家或者人民，西耶尔明确地认为，它并不包括每一个人：

因此，不管是对还是错，任何地方都将妇女们排除在这类授权者之外；流浪汉、乞丐不可担负国家的政治信赖，这一点儿也没有什么问题；难道一个佣人，或者任何一个受人役使的人，或者一个没有归化的外国人会被允许出现在国家的代表当中吗？这样看来，政治自由有其界限……（第 74—5 页）

他也将旧有的特权等级排除在刚解放了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

然而，选举权的授予问题不足以涵括大革命时期人们对民主的普遍理解。华兹华斯在 1794 年的一封信里坦承，“我属于那个人们谓之民主派的讨厌阶层”，他暗示了他并不怎么支持人民这边提出的将议会选举权授予更多人的要求，也暗示了他是一个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平等派，但不必然是一个经济上的

① The Abbé Sieyès,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什么是第三等级》) S. E. Finer 编, London, Pall Mall, 1963. 括号里另外的页码索引出自该本。

民 主

平等派。他在《序曲》诗中回忆起：“我把整个心/给了人民，我的爱属于他们”（1805年，第九卷，第124—5行）。民主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社会类型，而不仅是指一种特定的政府形式或选举一个政府。华兹华斯认为他童年时代的坎伯兰郡拥有有这种社会的某些卢梭式的特征：

……生于穷乡……
在我的学生时代
我有幸不曾得见
公子老爷的脸
自称富贵
要人殷勤，要人恭敬……

而到了剑桥大学，他发现：

在那个地方无法眺望
共和国，每个人都
平等地站在地面上，兄弟相称
保持着尊严，在共同体中……

（第九卷，第217、221—5、228—31行）

华兹华斯在他的许多描写他家乡地区的诗里，例如《坚毅与独立》、《米迦勒》和《坎伯兰郡的老丐》等，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每一个人，无论多么卑微、贫穷，都有其价值，并

且重新强调了劳苦大众的积极品德以及他们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贡献，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民主精神的某些方面。华兹华斯信任“平凡”之辈，在他眼中，他们的品质远非平凡，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人们要求平民掌权以及将选举权授予更多的人，这些政治要求都是正当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曾经针对将平民抗议视为“暴民”行为这一传统观念发起挑战，他于1812年首次在上议院发表讲话为勒德分子辩护：

你们称这些人为暴民，说他们凶暴、危险、无知……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些暴民的责任呢？正是这些暴民，在你们的田地里劳作，在你们的家庭里帮佣，装备你们的海军，补充你们的陆军……你们可以将人民称为暴民，但是你们不要忘记，暴民也常常道出人民的感受。^①

拜伦有一次确实曾将民主定义为“流氓无赖的贵族制”（第434页），并且怀疑像潘恩、古伯特这些平民领袖和辩护士。不过，在旧秩序和“人民”之间，他满怀深情和责任地站到了人民这一边。

国王时代正迅速终结。必有血流成河，涕零如

^① Byron, *Selected Prose* (《拜伦散文选》), Peter Gunn 编,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p. 111. 括号里更多的页码索引出自该选集。

民主

雨，但人民终将得胜。我有生之年看不见这天，但我预见到了这天。（第 372 页）

这一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民主观念解释了为什么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这一研究美国社会的著作中，更多地关注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及其政治义涵，而不是仅仅将民主狭义地界定为一纯粹的政治体制。1836 年，即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面世这年，他的崇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高工资及普遍阅读是民主制的两要素，当这两要素同时具备时，除了代表公众意见的政府而外，所有的政府都是不可能的。”^① 在 19 世纪关于民主的讨论中，整个社会都在进行民主化，选举权范围的扩大通常伴随着这一进程而来，并反映了这一进程，而不仅仅仍旧是纸上谈兵。因此，早在英国 1867 年的改革法案出台前夕，詹姆斯·布赖斯就注意到，“民主的社会进程比其政治进程走得更远”，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缺乏民主制度的民主社会更加危险的了。”^②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人民群众扮演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角色，旧日的忠顺和服从传统被人民中间的平等意识所取代，人们感觉人与人之间差不多，或者至少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受到尊重和注意。

^① 引自 J. H. Burns, ‘J. S. Mill and Democracy, 1829–61’（《J. S. 穆勒与民主，1829 年至 1861 年》），载于 *Mill*（《穆勒》），J. B. Schneewind 编，London, Macmillan, 1969, p. 290。

^② W. L. Guttman 编，*A Plea for Democracy*（《为民主一辩》），London, MacGibbon & Kee, 1967, p. 177.

从而，民主必然与平等相联系。只有当足够多的人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自身的价值和权利时，对普选权或平等政治权利的要求才能奏效。

在相信每个人的权利或价值平等这一点上，功利主义构建了一种颇有影响的理论。功利主义民主观总是认为，每个人的幸福和痛苦都具有同等的分量。不仅需要增加人类幸福的总量，而且还要在人群当中平等地分配幸福。然而这怎么能实现呢？迄至法国和美国革命，边沁和其他功利主义者一直希望他们能够说服某些开明的统治者或专制者致力于增进和扩展人类福祉这一不言而喻的可敬事业。这一希望落空了。1789年之后，边沁作为被大革命授予法国荣誉公民称号的杰出人士中的一员，看到了人民自己能够进行政治行动，从而接受了政治民主的一般原则。^① 由于每个人都追求他或她自己的福祉，每个人都会根据他或她自己的利益来进行表决。因此，个人表决的总和就会推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目标。有望为人民追求利益的只有人民自己，人民通过他们选出来的责任代表来追求自己利益。“说到普选权”，边沁写道，“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加无可辩驳呢？”^②

詹姆斯·穆勒在他著名的1820年首版的《论政府》（*Essay on Government*）一书中尤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认为，

^① 见 Mary P. Mack, *Jeremy Bentham* (《边沁》), London, Heinemann, 1962, pp. 432 and 413 – 6。

^② 引自 Robert Eccleshall 编, *British Liberalism* (《英国自由主义》), London, Longman, 1986, p. 149。

民主

事实证明，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不可避免地会以普遍利益作为代价来追求君主或贵族自己的私利。穆勒不得不承认，只有当群众作为一个整体时，它才会追求普遍利益。但是，同样明显和直接的是，在现代世界中，参与型民主即便不说不可能，至少也是非常不可行的，并且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导致坏政府的馊主意：“群众不适合做政府做的事，……所有人数众多的集会实质上都做不成任何事。”^① 走出这一困境之道是代议制的设计：“人们或许可以从现时代的各种重大发明中，发现代议制政体这一解决所有理论和实践困难的不二法门。”（第 73 页）经常性选举这种认可举措，是选民加之于代表身上的制约，与此同时，代表们也有权力制约行政部门。穆勒相信，通过这些办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将变得协调一致。

通过代议制的设置，可以将民主制原则与国土大小的事实相协调，这个观点并非源于穆勒。最早在这方面有所论述的是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

至于说简单民主制，它提供了政府得以大规模创始的真正论据。简单民主制不能扩大，不是由于它的原则，而是由于它的形式不利……简单的民主制是社会不借助辅助手段而自己管理自己。把代议制同民主

^① James Mill 的 *Essay*（《论政府》）、Macaulay 对他的批评，以及随后的讨论被结成集子，见 *Utilitarian Logic and Politics*（《功利主义的逻辑与纲领》），Jack Lively 与 John Rees 编，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 59. 括号里另外的页码索引出自该本。

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①

然而，和潘恩不同，穆勒必须面对一般资产阶级对男子普选权的反对，资产阶级认为，人民群众不宜于统治，他们会利用政治权力去“掠夺富人”，比如说麦考莱正是像这样对穆勒的《论政府》提出强烈的非难的。而穆勒的回复实际上是认为，中产阶级“这个一般被形容为共同体中最明智、最有道德的阶级”，在民主制中仍然会居于统治地位，这是因为，“中产阶级下面的人民大众必定会以他们的建议作为指导，以他们为榜样。”（第 93 – 94 页）中产阶级中的激进改革派坚持这种乐观的看法。爱德华·迈阿尔（Edward Miall）19 世纪 40 年代期间争辩说，授予工人阶级选举权，这可以赋予他们以公民责任感——据说他们以前缺乏这种责任感，从而使得中产阶级能够将他们带领到“中产阶级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去”。② 尽管麦考莱对穆勒的期望曾加以冷嘲热讽，但事实证明，它是相当正确的。普选权的授予，并没有带来 19 世纪这场论战双方的许多人士所担心或希望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潘恩、边沁，以及较为次要意义上的詹姆斯·穆勒，都具

①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人权论》),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4, p. 180.

② 引自 Eccleshall, 前引书, p. 119.

民主

有 1789 年后的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倾向，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像威廉姆·哈兹利特这样的激进主义者才有可能无条件地坦然断言，民众之声即神之声（*Vox populi vox Dei*），是一切好政府的准则。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人民统治这一民主制理念被视为惟一合法的政府形式，被视为扫清个人专制者和无知贵族统治的利器，那些能说会道的发言者才敢于公开宣告，他们相信全体人民的品德和良好的判断力。

但是，到了 1820 年，这一时刻已然消逝。功利主义传统的钦定接班人，詹姆斯·穆勒之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很快就与其早年导师的那种鲜活的民主信仰分道扬镳了。小穆勒受到包括托马斯·卡莱尔、圣西门、托克维尔等不同思想家的影响，变得和 19 世纪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对民主充满疑虑，且明确地表示过这些疑虑。他晚年写道：“还很早的时候，“我就不再将代议制民主视为绝对原则了，我认为它是一个由时间、地点和环境所造成的问题。”^① 关于他对 19 世纪 40 年代的看法，他写道：“我们现在已不再是我从前那样的民主派了，因为只要是教育还继续是那么不幸地不如人意，我们就会为群众的无知，特别是自私和粗野而感到忧虑。”（第 138 页）

穆勒对民主的担忧不在于它带来的政府类型，而是更多地在他视之为社会中平庸的公众意见统一体的优势，这种公众意见不仅对持异议者不宽容，甚至对仅仅是行为怪癖者也不宽

^① John Stuart Mill, *Autobiography* (《自传》), Jack Stillinger 编,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02. 括号里另外的页码索引出自该本。

容。这个问题是他的《论自由》（1859年）所关心的头号问题。正因为他看到公众意见较之国家更能构成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他才会有对民主制这一倾向的担心。他说：“多数人的暴政通常已被列入社会所警防的诸种灾祸之内了。”^①“在政治生活中，指出公众意见现在统治着世界，几乎了无新意”。形成所谓公众意见的那些群体永远是一些“集体的平凡人”（第131页）。与他同时代的麦考莱用非常相同的笔调写道：“仅仅是民主的制度迟早会摧毁自由，或许还会连文明也一道摧毁。”^②我们早已注意到，认为民主会威胁到自由，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但在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思考中，这个观点具有重要意义。

穆勒的这种担忧实际上使得他赞同这样的提议：即给受过教育的人比人民群众更多的选票。^③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人都应有一票，但是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根据他们的教育水准而占有更多比例的选票；穆勒认为，这将提供一种保护措施，以防止他非常担心的人民群众的无知、自私和粗野。穆勒身上带有柏拉图式的精英主义，他所长期致力的，正是调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政府和社会领导权应该稳妥地委诸于社会上最优秀的、最

① J. S. Mill, *On Liberty* (《论自由》), Gertrude Himmelfarb 编,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4, p. 62. 括号里另外的页码索引出自该本。

② 引自 Joseph Hamburger, *Macaulay and the Whig Tradition* (《麦考莱与辉格党传统》),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 134.

③ 见 Burns, 前引书, p. 323, 和 Mill, *Autobiography* (《自传》), pp. 153 - 4 and 184。

民 主

开明的精英之手这一理念。议会和政府应该由大众投票选举产生，关于选票的分配可以有所调整，但一旦选举出来，人民就应该承认，一个“由全国最优秀、最明智的人”所组成的会议作出的决定，一定会比人民自己作出的更好。因此，穆勒不同于激进主义民主派，他不赞同短期议会。无论如何，只要议会议任期少于 5 年，都不过是鼓励代表们去考虑其选民们的“蝇头小利” (*timid subserviency*)。

合乎理性的民主制的理念，不是说人民自己统治，而是由人民作为好政府的保证……最好的政府（这一点还需要讲吗？）必定是由最明智的人士组成的政府，最明智的人士永远是少数。^①

这里，值得推敲的地方是限定性的形容词“合乎理性的” (rational)。

在英国 1867 年“改革法案”通过前的辩论时期，上述焦虑、警告和限定进一步加强。这场辩论的始作俑者、并使选举权问题复活的关键人物也许是约翰·布赖特 (John Bright)，至少在格莱斯顿转而致力于这一事业之前是如此。不过，尽管布赖特被称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并且因攻击旧有的贵族秩序和封建秩序而闻名遐迩，但他强调说，他不是民主派：“我并不自称民主派，我从来不接受那个头衔，我相信，那些了解我

① 引自 Burns, 前引书, p. 294.

的人以及真诚地谈及我的人，也不会将它用在我头上。”他 1860 年在下议院宣称：“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别处我都从来没有说过我赞同普选权。”^① 如果连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也得像这样百般抵赖的话，要表明他们所讨论的实际上正是民主，就显得有点吊诡了。但是，无论即将进行的改革是多么地适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次改革在社会和政治体制发展方向这一点上，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

如上所述，除了像詹姆斯·穆勒和爱德华·迈阿尔这些自信的中产阶级人士之外，无论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的人们，比如说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派，还是那些害怕、反对普选权的人们，都一致认为，普选权将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铺平道路。工人阶级在投票时将会团结一致地将选票投给代表本阶级的候选人，由于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明显占多数，还有什么能阻碍工人阶级取得政治优势呢？1867 年法案的激烈反对者罗伯特·罗伊（Robert Lowe）警告说：“一旦把选票给了工人，国家机器就随时会将这些选票一整块儿地砸向国家的各种制度和财产。”^② 中间阶级和上层阶级之所以作出让步，同意逐渐扩大选举权，主要的理由或许恰恰是上述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从一开始，男性工人阶级的选票就已经分别投给了原有的各个政党，当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出现后，这些政党也

① 第一句引自 Asa Briggs, *Victorian People*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民》),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5, p. 209; 第二句引自 John Vincent, *The Formation of the Liberal Party* (《自由党的形成》), London.

② 引自 Briggs, 前引书, p. 250.

民主

很少能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人们原以为工人是会团结一致地支持它们的。不过，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将 19 世纪的民主问题视为阶级问题。因此，无论是争取民主的斗争还是反对民主的斗争都很激烈。

不过自此以后，在公众态度方面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变化。从约翰·布赖特愤愤不平地宣称自己不是民主派到 20 世纪早期，在其中的某个时刻，发生了官方和公众对民主的态度的逆转。曾几何时，除了最激进者或“极端分子”而外，所有人都急不可耐地拒绝民主原则，转眼之间，除了极反动者而外，所有人都声称自己信仰它。20 世纪 20 年代期间，墨索里尼或许是受到精英理论的影响，他声称他蔑视民主，这一立场使得他成为抵制自 1789 年以来的那股广泛的政治趋势的代表性人物。人们在态度方面的这种出其不意而又异常迅速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

据我所知，任何有关这个变化的研究，都没有能够以一种明确的、资料翔实的方式回答上述问题。最通俗的解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索姆河战役中的重大牺牲以及西线其他战役中的大屠杀，使得人们在态度或者语言上必然有所变化。人们感觉，单说帝国和为国尽义务已经不再能够向公众解释这些牺牲。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自由主义民主辞令更适合于当时的情境。“为了民主的缘故，可能要求牺牲，这些牺牲不能像过去那样被视为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纯粹爱国主义而作出

的。”^①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顺应现实。成年男子的选举权至少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普及，然而社会中仍然还存在着对“民主”理念的抵制。托克维尔曾经建议人们将有限的代议制形式当做民主制的不可避免的基本框架，并予以认可和接受，在这个框架之内，传统的权力结构和价值能尽可能地被保存下来，或许这个基本框架还不够好？

这里不是说，在20世纪，对民主的公开敌视已经全然消逝。像墨索里尼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曾经公开地宣称他们对民主的蔑视：

法西斯主义拒绝相信，多数人仅仅凭借其为多数人这个事实，就能统治人类社会……说到民主政体，我们指的是，在那些政体里面，人民时常会沉溺于当家作主的幻想之中，而真正有效的主权却操控于其他——或许是不负责任的、秘密的——势力之手……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这一荒唐透顶的政治平均主义的常见谎言……

而就连是墨索里尼以及他的笔杆子詹泰尔（Gentile）在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有组织、有集权、有权威的民主”时，也表现

^① Crick, *In Defence of Politics* (《捍卫政治》), p. 67; 又见 R. R. Palmer, ‘Notes on the use of the word democracy – 1789 – 1799’,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LXVIII, 1953.

民主

出了对民主这个术语的口头赞成。^①

而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不喜欢或者害怕民主——至少是大众意义上的民主——的那些人，发现了一些更为深奥复杂的方式来表达对这类传统的情感。现代的精英主义者已经不再谈论“暴民”或“普通百姓”（J. S. 穆勒语）或“粗鄙的民众”（柏克语）这样的话题，而是讨论“群众”（the masses）和“群众社会”，并区分“群众型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威廉姆·科恩豪瑟（William Kornhauser）在《群众社会的政治》（1960年）一书中这样说：“所以，民主社会中的群众政治是反民主的，因为它否认宪政秩序。”^②美国另一位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则指出，在各个自由主义民主国家里，“群众意见”已经开始凌驾于政府之上，这代表“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功能性的紊乱”。^③他认为，“有必要保护行政权和司法权免遭各种代表大会及群众意见的侵害。”（第45页）看来民主走得太远了。人民，或者说“群众”，已经侵占了本应该属于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和功能。李普曼和 J. S. 穆勒一样认为，选民有权利挑选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但除此而外，他们应该对政府的统治不予干涉或施压：“他们的

① 墨索里尼，引自 Adrian Lyttleton 编，*Italian Fascisms*（《意大利法西斯主义》），London, Cape, 1973, pp. 49–50。

② 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群众社会的政治》），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0, p. 277. 括号里另外的页码索引出自该本。

③ Walter Lippmann, *The Public Philosophy*（《公共哲学》），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6, p. 17. 括号里另外的页码索引出自该本。

责任是产生政府官员，而不是支配政府职员。”（第 46 页）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也提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看法，他在谈到公民复决这种罢免代表和恢复其他种种为了大众干预政治而作的设计的权力时说：“他们忘记了政府的首要事务是进行统治……只有政府才能够确定现实社会里各种事情的轻重缓急并制定出实际的政策。民主只能提建议和表示同意，而且只能以一种间接的、不定期的方式提出。”^①

这些试图限制“群众”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努力，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传统民主理论的修正，人们将传统民主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的发现结合起来，此外还混入了像帕累托、莫斯卡和米歇尔斯等古典精英理论家的某些论点。精英理论的核心是坚持认为，民主，其严格的传统意义是指人民的统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的统治都是精英在统治，或者最多是许多相互竞争的精英群体中的一群精英在统治。古典形式的民主制抱负注定失败——对于这一结局，相关的理论家出于自身的政治倾向，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感到惋惜。雷蒙·阿隆将这一结论简洁地表述为：“政府由民享而不由民治。”^②

那些决定改写民主理论以使之与中央集权的精英主义观点相结合的作家们倒是没怎么感到惋惜，他们并不总是像李普曼那样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似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

① Crick, 前引书, p. 69。

② Raymond Aron,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Ruling Class’ (《社会结构与统治阶级》),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I, 1950, p. 9.

民 主

数都主张要重新定义民主，在重新定义时祛除传统上民主所包含的那种大众参与的抱负。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成功实现民主和精英统治的最佳结合了。他们也能够在声称捍卫民主的同时拒斥某些趋势和抱负，这些趋势和抱负曾经招致他们那些不够深奥复杂的理论前辈们对民主有如上的声讨和抨击。^①

现代精英民主论（或曰民主精英论，都是一个意思）发展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或许要数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 年），熊彼特将他所使用的民主概念彻底限定为“达到政治——立法和行政——决定的一种政治方法”，因此，他说，“民主本身不是目的。”^② 他随即总结道，由于人民乃举世公认地无知、无理性和冷漠，民治政府的古典理想不仅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而且是不可取的（undesirable）。此外，传统的民主理论没有能够“适当地认识到领导这一至关重要的事实”。由于上述种种考虑——有些是经验的考虑，而有的则是比较明确的规范的考虑，熊彼特得出结论说，人民的适当角色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选择他们的统治者，然后让统治者去处理统治事务。选民“必须懂得，一旦他们选出了任何个人，政治行动就是他的事而不是他们的事了。这意味着他们得约束自己，不要吩咐他应去做什么。”（第 295 页）这一点当然是承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以前柏克答复其布里斯托尔选

① 见 Williams, 前引书, p. 299。

②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43. 括号里另外的页码索引出自该本。

民时的传统。这样，熊彼特得出了他那个被广为征引的所谓“民主方法”这一术语的定义：“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第 269 页）

20 世纪 50 年代，有些追随熊彼特脚步的理论家甚至更加看轻大众在民主政治系统中的角色。例如 S. M. 李普塞特写道：“民主制中最有价值的特别要素是政治精英竞取大体上是消极的选民手中选票的过程。”选民的消极性，非但不被认为是值得担忧甚至惋惜的理由，反而被积极地认可，李普塞特称：“相信高水平的参与永远有利于民主是没有根据的。”^① 过多的大众利益和大众行为会导致科恩豪瑟讲的“群众运动颠覆自由及民主本身”（第 129 页）。爱德华·希尔斯主张，“多元政治的标志”是“政治介入的适度”，并防止“情绪化的热情”。^② 其他人走得还要远，觉得政治冷漠可能“反映了民主制的健康”（李普塞特），或者赞扬政治冷漠，认为它“多少能成为反抗狂热分子的有效力量，狂热分子才是自由主义民主的真正威胁”。^③

这种修正论的另外一个重要预设是，并不存在所谓的大众

① 第一句引自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p. 12。第二句话, 见 S. M. Lipset, *Political Man* (《政治人》), London, Heinemann, 1960, p. 32。

② Edward Shil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秘密的折磨》), London, Heinemann, 1956, p. 226.

③ W. H. Morris-Jones, ‘In Defence of Apathy’ (《为冷淡辩护》), 载 *Political Studies* (《政治研究》), 第 2 卷, 1954, p. 37。

民主

意志。上述所有理论家以及其他人，都强调克里克所谓的“本性洞见，即一切已知的发达社会都天生是多元的、有分歧的”（第 62 页）。如果事实确实如此的话，那么任何试图构想出一种单一的大众意志的努力都不过是欺人之谈，并且对社会中的群体和个人的权利构成威胁，因此，照这种观点来看，群众政治运动就很值得怀疑。如果社会在本质上是多元的，那么群众运动只能是歇斯底里的、蛊惑人心的操纵的产物。但是，选举过程中如何体现这种多元主义？最显而易见的答案似乎是，通过各个政党的多元性来实现，如此则任何政府都将变成代表着至少是相当数量的这些不同利益和群体的联盟。然而，这些修正主义理论家也非常关心政府的强大和稳定。因此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倾向于赞成美国和英国那种两党制所产生的由一个政党控制的政府，而不赞成政党联盟政府，不论后一种政府能够多么准确地反映社会是“多元的、有分歧的”这一特征。

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提升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在新式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各种集团和组织代表了社会内部利益的巨大分歧。政府的职责在于裁断、调和这些利益并制定出折中的解决方案，尽可能多地把一切“正当的”的利害关系和利益都考虑在内。约翰·派拉蒙纳兹（John Plamenatz）热情地宣称，通过这些组织的代言人，“人民的声音是可以永远被听见的”。罗伯特·达尔则相信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拥有“一套政治制度，在这套制度中，全体人民当中一切活跃的、合法的集团都能在

某些关键性的决策过程中让政府听见自己的声音”。^① 由于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的存在，人们可能认为，旧有的民主参与原则又得到了重申，但是它是以一种适于现代社会的形式得以重申的，它认同集团而不是个人。

因而，20世纪这个所谓“平民的世纪”对民主的疑虑并没有消失，由于选举权的扩大和政治生活特征的相应变化，这些疑虑甚至被进一步加深了。但是，它们并不总是含有对民主原则的直接挑战。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对民主的直接挑战在政治上已经不再能被人们接受。不过，民主的定义本身经历了修正、调适、限制和冲淡，目的是为了使得民主与相信精英统治的必要性和优势这一持续多年的信仰相一致，与同样持久的对“群众”的不信任相一致，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使它与西方现实政治制度相一致，西方世界称它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为“民主制”。由于这个经过修正了的民主定义，人们在讨论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是讨论如何维护和捍卫民主，而不是实现民主，因为在像英国、美国这些幸运的国家，民主已是现实的存在。

通过宣称民主已经来临，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意识形态化政治的终结，20世纪50年代的修正论者或许希望结束有关民主的年深日久的论战。然而事与愿违，而且可以预料的是，他们挑起了新一轮的论战。他们想抛弃古典民主理论中的许多理念和理想的努力，立即招致其他理论家的反对。

^① 见 Anthony Arblast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Liberalism* (《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p. 329 及相关论述。

民 主

与此同时，他们对建立在“冷漠政治”和“大体上是消极的选民”基础上的现存民主制的歌颂，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叶，当这些人的著作还正在撰写和出版的时候，就遭遇到了大众行动和激进主义运动的显著复兴。人们提出了新的参与要求，这些要求引起了对民主这一被认为是陈旧概念的新讨论。中央集权和官僚化的发展趋势非但不为人们所接受，而且还招致反对，反对派强调小政府、亲和性、公开性和分权化的诸多优点。全球化，尤其是经济权力以跨越国界和使民选政府的权威失效的方式集中，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反对趋势。这种反对还不是一呼百应、互相协调，较之集中化的种种趋势，它还显得缺乏力量，但是，正如其先驱之一卢梭在著作中说道，它奏响的黄钟大吕，将在那些感觉自己无权或者厌恶权力的广阔人群中产生共鸣。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民主有什么前景呢？对近年的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们或许认为，共产主义受到报复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对共产主义崩溃的回响，标志着民主原则开始获得全球性胜利。东欧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已实行选举并由这样那样的民选行政当局所统治（并非所有前苏联成员国都是如此），这些一党制国家的下场削弱了其他地方的此类组织结构的基础。像南非、智利、尼加拉瓜、赞比亚、安哥拉和柬埔寨这些全然不同的国家都已经实行选举。在许多情况下，那些选举的真实性也为其实结果——逐走现行政权——所证实，比如说尼加拉瓜的赞比亚的情况就是如此。

右翼政权也已土崩瓦解。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被一次公民

投票所废黜，而在这次投票中，他是惟一被许可的候选人！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被民选总统所取代。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历尽波折之后，终于以黑人的统治取代了白人至高无上的权威。20世纪70年代，葡萄牙和西班牙都相当平稳地走出了长期的独裁统治，建立了议会选举体制。与此相似，希腊在这个时期也摆脱了军人独裁统治连带君主制，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些重大发展或许可以被解释为民主或大众选举的一种全球性运动或至少是全球性趋势。民主和大众选举被认为是对政府而言的最稳定、最可接受的基础。我认为乐观主义的基础在于，除开一个例外——一个非常巨大、显著的例外，即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在那些国家里，惟一具有正当性的政府是那些执行伊斯兰教教法（即神法）的政府——大众选举越来越被视为任何政府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正当性基础。这并不是说，民选的政府必然具有议会的性质，或者将会推行自由主义政策。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选举意外中止，否则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一个伊斯兰政府，这个政府将会全力在那个相当西方化的社会中强制推行穆斯林的法律和习俗——这正是阿尔及利亚人不惜以内战的方式，不顾重大的、可预知的后果中止这次选举的原因。

希腊和伊比利亚半岛的独裁制于20世纪70年代终止，看起来似乎标志着南欧的右翼权威主义与自由进步势力之间的长期斗争的最后结束。只有极端乐观的人才会对晚近中欧和东欧的发展进行比较分析。像俄罗斯和波兰这些国家，（与捷克共和国相反，）过去并无民主政治的经历，再加上经济问题成堆，

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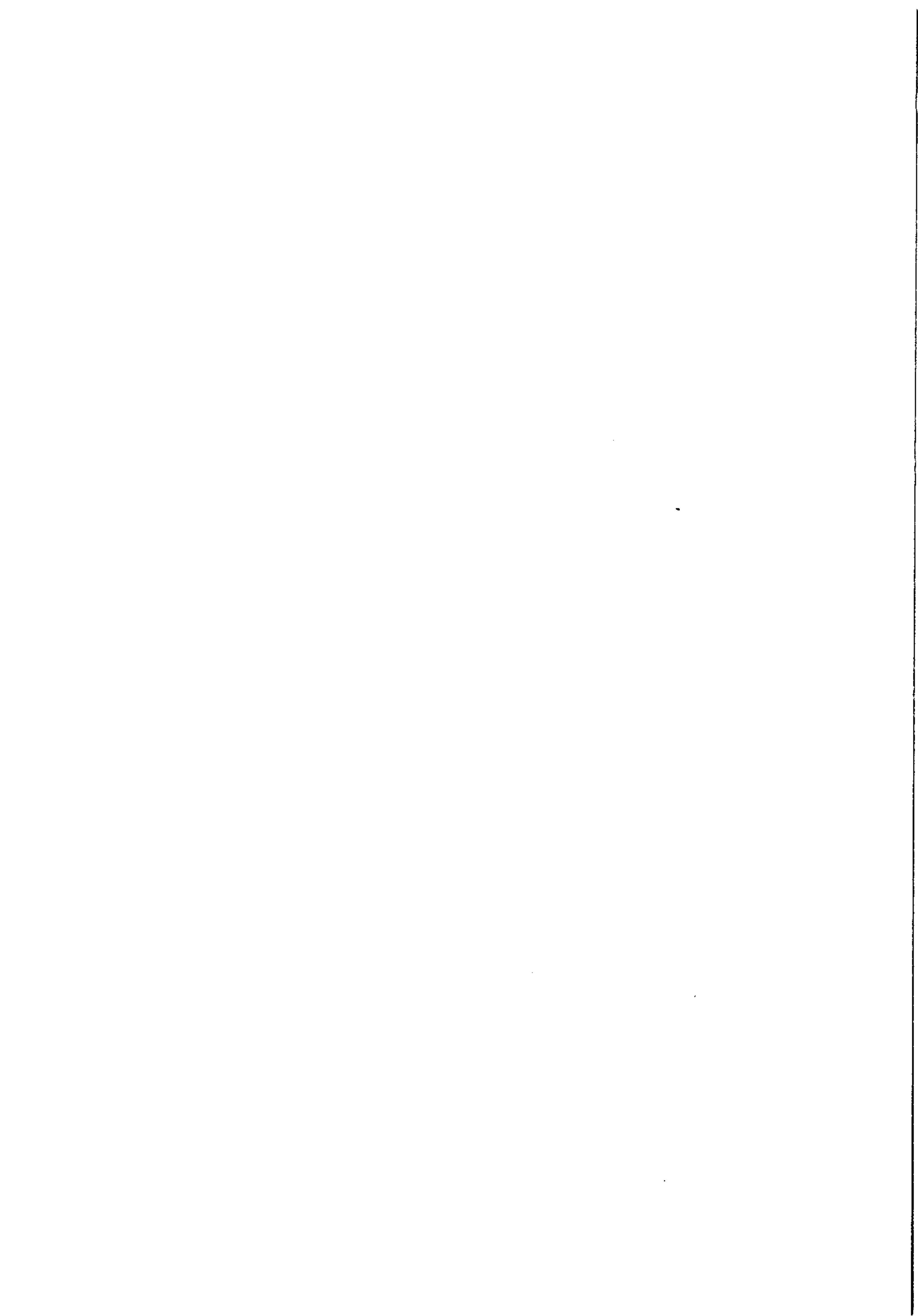
民族纠纷和边界纠纷不断，所有这些都为形形色色的权威主义统治的卷土重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那些口若悬河地谈论着“自由市场民主”的人们，似乎认为自由市场一开，必有民主伴随而来，他们指望我们对许多国家忽略不计，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治曾经或者正在携手共进。西方资本主义早就渴望着把前共产主义国家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之中，经济顾问、投机商已大量涌人东欧。可以料想的是，旨在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起坚实的民主制度和习惯的努力，要少得多。结果与拉丁美洲、非洲部分国家和东亚一样，资本主义与权威主义政府的结合正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前苏联其他一些共和国中重新出现。人们对东方一些国家的压制政策和权威主义始终视而不见，这说明打开共产主义社会和前共产主义社会的贸易和投资市场而不是争取在这些社会中创建民主，才是西方国家真正关心的利益所在。

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最小限度的民主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而获得一丝安慰，最小限度的民主原则意味着，对于任何政权或者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应该由大众选举产生，这是检验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标准。民主将不会像 20 世纪中叶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被公开的权威主义浪潮淹没。事实甚至是，非民主的权威主义最为强有力的各种意识形态形式，现在要么已经死亡了，要么已经臭名昭著而注定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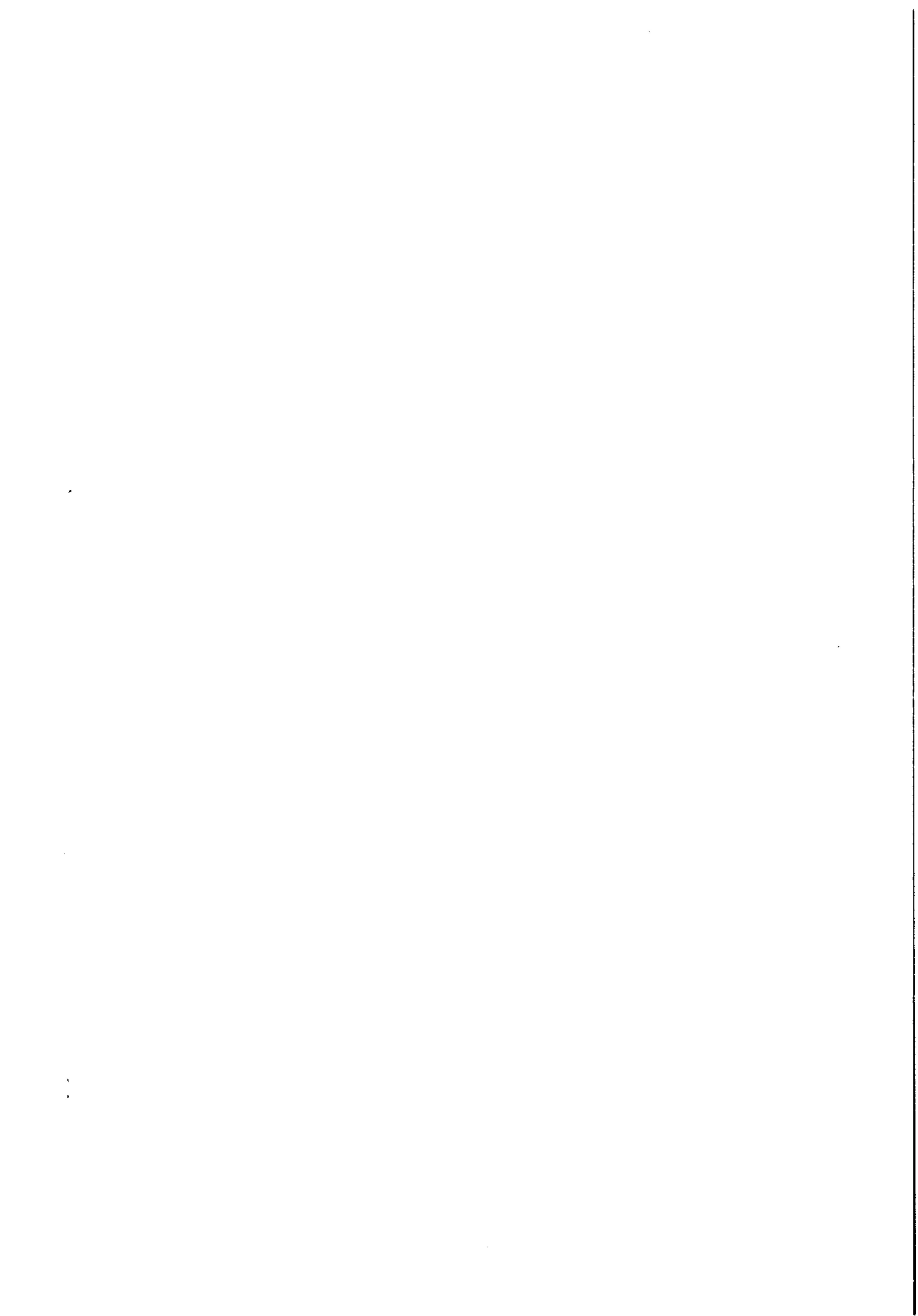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独裁统治或军人统治通常也不想怎么设法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掩饰自己，或者为自己辩护。武力的统治很容易以对秩序的需要、被颠覆的危险等等借口来为自己辩护。本

第四章 平民政治

书上文已表明，对民主的敌视从来就没有从当代政治中消失。还有许多有势力的、享受特权的集团把民主视为对其自身及其价值观的威胁，因此想方设法地阻止民主的发展，包括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在内——如果暴力和镇压被认为能起到效果、是必需的话。也有许多人，民主以及常常随之而来的自由对他们来说是令人感到不方便的东西，是他们无拘无束地追求财富和利润的障碍，因此，他们欢迎我刚才提到过的自由市场和权威主义的结合。在这个后共产主义时代里，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构成了对民主政治发展和蔓延的最大障碍。



第二部分：理念



第五章 民治政府

对民主及其对立面的历史作一个简短的和摘要性的回顾，会发现是时候回归定义问题了，历史性的观点将有助于阐明该问题。在本书的前段，已提出“大众权力”（popular power）的概念可被视作民主的各种思想和概念的核心。这样做的理由目前应该稍微清晰点了：尽管民主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近来甚至被更精确地认作是选择政体的方法，然而在政府问题上的过多强调转移了民主理念之后的最持久的意愿，即架构甚至是废除的愿望，政府与被治理者间，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隔阂，它们暗含在如此之多的惯常的政治思考之中。

被称作“直接”民主的东西，曾在古希腊实践过，在废除差别方面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多数人包括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各种制度中，在选举决策者（通常是每年度的）的原则中，以及在这些团体成员的通过抽签而不是选举的选择之中，所有的这些措施保证了参与并不仅限于行动主义者的少数而是传播到了整个公民团体之中。同样地，卢梭也确信没有人能在

民 主

不能支配他或她自身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自由，因此只有少数种类的直接民主能提供治理与自由相互协调的框架。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进行了说明，其中，他嘲笑了英国人，认为英国人“只有在议会议员的选举时才是自由的；一旦议员被选举出来，人民就被奴役了；他们就等于零了”（第一卷，第 15 章）。^① 一旦你将你的自治权转交给某人之后，即使你相信那个人会成为你的“代表”，你也将不再自由。对卢梭而言，议会主权国家的学说是不合逻辑的，否则就是不能理解的。在他看来主权与人民是不可分离的。问题在于决定他们如何持有和行使主权。

以上就是对民主的原初的理解：人民直接治理自己，或如有必要，则通过公民中的治理机构的运转来实现，而无须由选定代表来协调。许多现代的评论家，从伯克、汉密尔顿以及麦迪逊直至今日，都坦诚代议制是限制普遍参与和控制的一种方法，并且它保证了将日复一日的治理权力掌控在精英分子（适宜于受过教育的）手中。可能出现的对普遍权力的如此这般的限制不可能是民主的。在论述代议制的问题上民主的观点颇有所不同。举例而言，已被潘恩和詹姆士·密尔典型证实了的是，只有在广阔的和人口众多的社会中来这样实行民主原则才是正当的。因此，他们关注的就是阻止选出的代表获得过多的独立权力，或者是成为永久自存的寡头政治集团。建议一年一度或

^① Jean - 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论》) trans. Maurice Crans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8, p. 141.

第五章 民治政府

两年一度的选举的目的就在于此，这也是禁止任何代表超出两个连续任期和禁止单个议会立法机构的等等建议的目的所在。意图就是要让人民保有大众权力的实质。

社会意识到自主政府的民主理念越迈进，公民参政的程度越高，政府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惯常的区分消融的越彻底。在这样的环境下简单将民主作为政府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容易让人误解。当然，自我治理确实是对政府问题的（谁统治？）一个回答，但是它并不完全是或仅仅就是那样。在该环境中，国家被社会化了而社会被政治化了。共享的民主必要地暗含了社会生活在其中，将其视作一种生活方式和运转整个社会的方式胜过将它单纯看做一种政治策略和方法。这是在伯里克利著名的葬礼讲演中提到过的。（已在 23 页引用）。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 J. S. 密尔那样的作者，在其所有的有关公众意见和大众无知的理解中也从未抛弃基本的民主原则，即人民应当尽可能的统治自己，因此，最终的目标就是最大化直接的个人参与：

显然，惟一能全部满足所有的社会国家的苛求的政府就是在其中所有人民都参政的政府；任何参与，即使在最小的公共职能而言，也是有用的；这个参与应当在各处都能在社会许可的改进范围内尽可能的普遍化；允许所有人都能享有国家的统治权，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于人民的本性了。（J. S. 密尔：《代议制政府》）

民主

么比这更令人最终想望的了^①。

只是在 20 世纪理论家们试图阐释民主，在其中，普遍参与被待之以猜疑，否则就认为它肯定是不合需要的。这个理论使得对民主的理解从传统的理解民主是什么或曾是什么的分离中迈出了基础的一步。无论是否赞成——通常都不是的——直到那时从所有的侧面来理解民主都或多或少的是普遍权力，普遍主权，普遍参与。没有充足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传统的理解现在应当摒弃，尽管对某些另外可能掩身于民主这一术语庇护之下的人而言也许有些困难。

我们也需要弄清，对国家政府的民主原则的限制是否真正满足了民主意图实现的愿望。民主就意味着民享政府，或至少是人民的负责任的代表来治理的政府，这一信条是建立在政府权力就是社会权力、政治统领社会和经济生活、以及没有个别的派系权力或利益集团能够抵抗普遍意志的合法力量，这些假设之上的。合法的国家权威就是权力。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存在不具有有效权力的权威。

但是我们现在更清楚的是政府的权力，包括选定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大型的跨国公司及其集结体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势力绕过和淡化。这些公司和集结体的决策及方针可以决定许多国家

^① J. S. Mill, *Representive Government*, in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中的代议制政府》), *On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论自由与代议制政府》) London, J. M. Dent, 1976, p. 217.

的贫富模式，彻底的超出了任何政府的能力范围。这不仅是破坏了选定政府的合法地位，同时产生了针对政治整体的漠然和犬儒主义心态。

当代政治思想中一个矛盾是，在大量的常规理论试图将民主思想限制在从精英分子的竞争中选择内阁的同时，同样被广泛认可的是，这些“民主”政府的理论上的权力与它们在社会中的实际权力是不相称的。如果如此之多的权力存在于选定政府的范围和控制之外，那么在政府独立地被大众选定并且原则上负责的时候仍坚持民主的需要已被满足显然就是多余的了。当民主的应用受限且其结果也无效时，民主的名声的确就被贬低了。这里我们对为什么只在政府的层面上定义民主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有更深层次的理由。

在英国和在别处一样，非选定权力与选定权力间的不平衡和负责的当地政府的权力近年来有系统的增长了。选定的议员在诸如治安和卫生等机构中行使的权力减少了，他们的多项权力被中央政府接管了，在许多城市中，诸如“城市发展局”这样的拥有广泛权力的代理机构产生了，它们能完全绕过选定的当地政府。无论怎样支持这样的发展，它们也肯定不是民主的。如果我们认定民主思想就是大众权力，那么明显地，将众多的权力集中在不能负责的掌控者手中，超出选定机构的控制范围，与民主是矛盾的。民主的古老而宽泛的定义还远未过时，它坚持弥补选定的代表集合的缺陷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在其周围的官僚政治和垄断组织来淡化其目前的状态。

在英国，只有 59% 的合格选民愿意在 2001 年的大选中投

民 主

票，选举参与的正常水平以前是在 70% 到 80% 之间，这个在正常线之下的剧烈的下跌引发了大量的急切的讨论。许多议会议员自身所担心的是议会的效用地位的下降，以及正式的选定的统治权力处于一个粗糙的政治体系之中。政府的大部分已经进入了“代理机构”的掌控之中，进入了其他的那些没有长官负有直接责任的机构之中，因此加以说明很困难，否则也是不可能的。有一些政治家和评论家欢迎此类发展，并欢呼“大政府”的结束。但是群众的反应看来是如果选定的代表和政府负如此之少的责任的话，那么便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去对他们报以极大的关注了，地方治理就足够了，但这对于民主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危险的。

我认为“大众权力”和“民治政府”并非空洞的口号，但由于有人在运用它们时未能在实践中和某些细节上阐明自己的意思，批评家和怀疑主义者确实容易将它们当做纯粹的花言巧语加以取缔。于是如何在有限的可利用的空间下进行阐释就成了我们的下一个任务。什么是民享政府？或说在大规模的现代社会的环境中它是什么？讨论“人民意志”仍然——如果曾经有的话——有意义吗？任何大的社会都有“公意”或说公共利益吗？

我们先将拦在或说我们相信拦在直接民主道路上的实际困难暂且放在一边。即使在制定决议和政策的过程中所有的公民都有个人参与，但是惟一的情形是在其中显而易见的是被称作人民意志的东西将导致一个一致的决定。全体一致，或说是以下的最好是没有人提出实际反对意见的决定——尤其在相关的

小团体或社会中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团体越大，全体一致就变得越少。然而，尽管人们渴望取得全体一致，这至少在基础价值和大体方向上为一个社会所渴求着，但在任何不同的社会中将其作为一个准则或说需要仍然是不明智的。为此，杰克·莱弗里教授指出，任何少数，即使是单个个体，也有可能阻碍一个在各方面都取得压倒性优势支持的决议或政策。^① 也许除了在某些不寻常的和特殊的情况下，很难说对个体或少数人的否决权施加强权是民主的行为。

正如我们所见，一些作者对全体一致持有怀疑，他们的根据是，全体一致只是或至少最有可能是来自上层的操纵的产物，或者是其他的多数意见的强制性压力的产物，或者是以上二者的结合。确实存在这样的真实情形。但是即使全体一致是全体的每一部分的自由决议的真正产物，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卢梭和边沁曾从迥异的角度提出过这些问题。

边沁对所有的诸如“共同体”，“公共利益”及与之相似的概念都持有明显的怀疑态度：共同体是一个虚构的机构，它由那些被认为仿佛是其成员的各个个人所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那些组成它的几个成员的利益的总和。^②

然而事实上若假设每个人都根据他或她所感知到的个人利益或愿望来投票或者决策的话，那么结果就是所有人乃至多数

^① See Jack Lively, *Democracy*, (《民主》)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5, pp. 13, 17 – 18 and 24.

^② 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 Ch. 1, para. 4. 这点在边沁著作的大多数章节中都能见到。

民 主

人的善，这是不成立的。弗瑞德·赫尔斯在《成长的社会限度》一书中给出了一些好例子。假设研究阶段的教育被看做似乎足以成为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那么所有的父母都将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这样的教育。扩大研究教育的建议从而可能取得多数人的支持。但是接受研究教育的人越多，他们找到事业的起点的可能性越小。正如赫尔斯指出的：

如果每个人都踮起脚来的话，那么没有人能看得清楚。在这类社会互动出现时，个人行动将不再是实现个人选择的可靠选择：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取得最优结果。

这个例子被他称作“在个人主义行为与个人主义选择之间的现代冲突。获得个人想要的与做个人喜欢的逐渐相去甚远”。^① 所以即便有依照个人自身利益理解的来自个人自由行动的一致决定，也不一定能产生个人想要的结果。

卢梭理解了这一点，并且这也是为什么他希望区分众意和他称作“公意”的意愿的原因。总的说来，我们所有的人作为个体所需要的和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所需要的不同的。即使是全体一致也不能确保普遍的和共同的善的成功。卢梭敏锐地觉察到了多数人的决定或即使是一致的决定也不必然正确。所

^①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增长的社会性限制》)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pp. 5 and 10.

谓正确，就是不仅是根据任何特殊个体的道德标准的正确，而且在共同体自身的善的观点而言也是正确的。这个并未引导他质疑多数人决定的原则，但确实引导他关注到了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环境，在这些环境之中众意，或是多数人的意愿较重，而不太可能与“公意”一致。卢梭用这个术语旨在说明我们所有人的意愿是什么，即如若我们不把自己看成私人个体，而是看做共同体的善而服务的相同的公民。

作为一个民主理论家，卢梭招致了许多敌对的评论，特别是那些从他的《社会契约论》里看到了“极权主义”暗示，甚至是看到了被定义为“极权民主”的蓝图的作者。他们发现卢梭著作中的对于社会联合的强调，以及他对各派或利益集团的厌恶，这威胁到了作为自由主义式民主特点的多样性的复多和包容性。但这些批评者们却从未追问过自身，是否任何社会都完全不需要维持社会的限度，或说在没有瓦解之前，即便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能接受多少多样性。^① 卢梭对于“可组合的联合体”的厌恶原因在于，他看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人们将自己从根本上等同于这些联合体以及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将社会作为整体来看待，从而忘却了他公民的义务。这是一个精到的看法，并且与现代的多数社会都密切相关。也许仅仅因为在那些社会中公民义务到了甚至大多数公民能自愿投票的最小化程

^① See Anthony Arblaster, ‘the Proper Limits of Pluralism’ in Iain Hampsher-Monk, ed., *Defending Politics, Bernard Crick and Pluralism*, (《捍卫政治、伯纳德·克里克与多元主义》) London, British Academic Press, 1993, pp. 97 – 111.

民 主

度，这些社会才能作为整体的国家而幸存。

所以尽管参与的公民的自发的全体一致确实可被认作是作为个体的所有人意愿的真实表达，但其自身仍然不能确保公共善或公共利益的实现。这是我们应当回答的民主问题之一。然而目前，认识到即便是全体一致在大规模范围内也很难取得就足够了，下边我们需要思考下一个最必要的问题，即在其中民主通常被粗糙定义了的原则：多数人的决策制定或多数人的统治。

第六章 多数人的统治及其问题

在缺乏全体一致的意见时，将人民的意愿与多数人的意愿等同起来，正如在日常政治中常做的一样，这是合理的吗？为了看清楚这里的危机是什么，我们可以将这个疑问和其他两个指向同样问题的疑问并列起来。难道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少数人或说任何少数者都不能作为人民的承担责任的一部分吗？或者是，认为那些反对且投票否决某项特殊政策或决议的人是在表示赞同，或说当他们投票否决已采纳的政策时就说他们是在治理自己，这有任何意义吗？多数人的代言人通常试图将提出反对的少数人描述成完全不属于“人民”的一部分。“人民”一词的概念一般是具有阶级内涵的，如同西埃斯所说，在“人民”的定义中排除了贵族和资产阶级。所以，现在指出这个或那个少数派有着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善相对立的既定利益，也是相当合理的了。但是若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少数派因而不享有政治权利，或是应当被剥夺其他一切公民都平等享有的权利，这就不合理了。我在民主思想中并未发现有令我们觉得“人民”不是公民的全体的思考，事实上少数者与多数者是同

民 主

等的，反对和不赞成的人与隶属于占统治地位的多数阶层的人也是一样的。将人民的意愿与多数人的意愿等而视之，在忽略的政治思考中也许有其合理因素，可是对少数人而言，不论他们是否在处理特殊问题上还是在更长远和基础性的道路上，他们都有权提醒社会的其他分子，他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若多数人忘记了这一点或试图加以否认时，那么北爱尔兰在过去的 30 年或更长远的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例子。

在谈及与自主政府的民主原则有关的少数人的地位时，卢梭同任何人一样提出了严苛的论点：

但是人们会问，一个人怎么能够既是自由的，而又被迫遵守并不是属于自己的那些意志呢？反对的少数者怎么能够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从为他们所不曾同意的那些法律呢？

《社会契约论》（第 4 卷，第 2 章）

对于该问题的简单生硬的回答（并非卢梭给出的回答）就是他们不能。治理少数人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多数人。因此在基本意义上就是不自由的，这也是卢梭的出发点。走出这个僵局是艰难的。由于存在着对集体制定决策的需要，以及对为整个共同体或曰社会提供导向的政策的需要，并且由于无论何时都不可能取得全体一致，所以要让被强制服从多数人决定的少数人有所选择就非常困难。正如洛克在证明多数人统治的正当

第六章 多数人的统治及其问题

性时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以单一的方式运行”。一个社会能容纳许多差异性——比洛克所处的时代要多，在那时宗教要求的一致是获得全部公民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任何社会都必然具备某些共同准则和政策，而无论是其如同在马路的哪一边行驶一样的微不足道，还是如同是否保留死刑一样的重要。民主的原则应当是，当全体一致不能达成时，就该根据多数人的意愿或愿望来解决事务。

罗伯特·保罗·沃尔夫将卢梭的疑问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从这个僵局中推断出自由的，道德自治的和每个人都受到保护的社会的惟一类型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① 这个理论取得了强有力的一致性意见，这由其激发的热烈反响可以证明。但是它不能驳倒上个段落的论点：由于我们认定存在一个政府和共同政策的需要，民主原则就要求少数人必须接受自己所反对的多数人作出的决定。

但是，从这个毋庸置疑的难处理的事实上获取大量信息却是可能的。虽然我们不能明确地讲，当不顾反对者的意见而执行某项决议和政策时，那些反对该项特定决议或政策失败了的人就是对此表示同意了的，但是我们却可以说，他们仍然被限制在这样一个决定上，即他们接受了多数人决定的原则和程序的公平，而通过该程序制定了决议和政策。如果你承认全体一

^① See the argument presented by Robert Paul Wolff in *Defense of Anarchism*, New York, Harper Torchbacks, 1976, 特别第二章，他也隐含了对他的批评之一的一个回答。

民主

致近乎不可能，并且多数人的决定是次好的，那么你也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普遍准则，当结果是你处于少数人中时，你将遵守多数人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多数人制定决议（而非任何特定的决议）的体系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的。并且至少是在某些主要或重大的问题上，由于所有的公民都有好机会成为多数人的一分子，他们中的多数或说他们全部都将乐意接受这个多数人的原则。他们将不会感到这个原则是在歧视他们。

不幸的是仍有许多国家和社会的情况全然不是这样。设若一个社会被划分为在其中有一个或多个的永久性的少数派，而他们知道在处理问题时大多数时候是决不会以他们希望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上面提到的原则就不够了。永久性的少数派的渴望，要求甚至是原则都在集体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被有系统地忽略或抹杀了，而他们的存在轻易使得多数主义者的民主成为不公平的和不能实行的。严格的数学上的每个人同其他人的投票的平等掩盖了的事实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少许人的投票全无分量和影响。这些被排斥的或是无力的少数派曾经倾向于成为宗教性的。而今天他们更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在北爱尔兰少数派既是宗教性的又是民族主义的。

有些问题有时隐藏在多数主义者关于民主的思考中，北爱尔兰为其提供了特别清楚的例证。这些隐藏的问题中的一个就是即便要做决定，那么哪一个多数派应该成为决定者。换言之，哪一个是应该作出最终决定的团体或“选区”，以及哪一个多数派的观点应该获胜？正如早期关注过的，北爱尔兰自身在过去的选举中总是产生明确支持联合政府的多数者。尽管如

第六章 多数人的统治及其问题

此，结果却是由于天主教徒和爱尔兰民主主义者这样的永久性少数派被排斥在新教徒的联合主义的“人民”概念之外，而被称作“阿尔斯特人”，民主变得滑稽。少数者的投票并不能完全表达少数者的意见；除了被看做是对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不忠的证据外，他们在多数者眼中再也无足轻重。

因此北爱尔兰存在对少数派的压迫。对此作出的一个反响是提出在面临危机时有决策权的不应当是本省的人，而应当是整个爱尔兰的人，这就直接挑战了该省的多数派的地位。这个提议将急速的扭转北爱尔兰的多数者和少数者的相对地位。在将爱尔兰视作一个整体时，新教徒将成为一个完全的少数派，而天主教徒和民主主义者在爱尔兰整体中作为多数派将轻松地压过新教徒的分量。以民主的观点看来，在这个更大的整体中，若新教徒少数派的意愿同样不作数的话，情况肯定没有改善。而第三种可能的分组方法则应用了多数主义者的原则，将联合王国看成一个整体。在那样的选区划分中，联合主义者也只是少数者。但由于联合主义的官方解释宣称北爱尔兰作为完整的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与约克郡和萨克福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因此联合主义者就很难有理由去反对由整个联合王国中的多数者为他们决定的命运了。并且事实确实如此。

从而有关北爱尔兰的前景的冲突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在民主讨论中被大大忽略了的问题：若有必要，通过多数人投票后有权决定特定政策和问题的团体是什么？在对峙的选区中我们如何做决定？或许大多数英国人认为应当由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的居民来决定什么样的国家可以统治他们，但阿根廷人

民主

或西班牙人却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他们的错误不太明显。假设多数人投票决定将约克郡和康沃尔从英国分离出去，并选出它们自己的政府，那么其他英国人能完全承认这两个郡的人有民主权利去进行实际的自决吗？这个很令人怀疑。以下问题的提出在更宽泛的社会中与异教徒少数派是密切相关的：在整体社会中多数派们有民主权利去决定用哪些事务来对这样的少数派实行特殊的和特定的影响吗？但问题的提出同样涉及到当地利益或团体与国家政府间的冲突。考虑一下下面的意见交换，它发生在核废料倾倒的反对者和已被授权进行倾倒的公司的代表之间：

“已经有 90 000 人在贝芙郡签署了一项反对倾倒的请愿书，难道这还不够吗？”麦克艾温尼先生声称，民主就意味着议会决议的全部，而议会已经授权其工程师可以进行这项活动了。^①

目前，先将议会中民主的辨析放在一边，明确的民主问题在于：谁应当决定？是由最直接影响的当地社会的意愿来决定结果，还是由整体国家的通过议会来表达的意愿来决定呢？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或许多数英国人认可高速公路的国家联网的需要，但是几乎没有哪个确定的团体会欢迎在他们家门口进行建设。尽管有核废料处理（Nirex）公司的发言人的声

^① Report in *The Guardian*, (《守卫者》) 29 August 1986.

称，以民主的观点来看由多数人原则支持的中央政府的决议仍然是不能自明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受最直接影响的人的意见和利益，应当比我们这些只受到边际影响的即使是全部人的意见要来得重要。我们该好好思考一下，当地的多数派而不是国家的多数派才应当是最有价值的。

举例而言，在苏格兰人和魁北克人的多数派的愿望以及全体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的多数派的愿望之间，我们应当如何衡量呢？若依据宪法则通常是较大的分组，或说其选定的代表有合法权利来决定。但经常出现的完全合法的情况是少数派加以反对，这个并不少见，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地域、区域或地方他们就是多数派。对于不平、自尊和甚至是某些方面对少数派自治的敏感是形形色色的多数派的基本特征，这些多数派希望将任何类型的复杂社会都能联合到一起。因此，西班牙设法通过承认加泰罗尼亚的鲜明特色，制度和语言的合法性，维持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忠诚（不然的话就是巴斯克人的忠诚）。而在英国，把有限权利下放给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自治政府，就是认识到了这两个地方的投票选举的多数派的热望，这样做同样是为了防止联合王国可能出现的分裂。

我们有可靠的理由来拒斥任何将民主和绝对的多数人统治的原则相等同的粗劣的做法。“人民”是不能只用他们中的多数来代替的，而且“民享政府”也不等同于多数人的政府，更不用说多数人的代表了。少数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并且在政策制定和决策执行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的考虑他们的利益、观点和信念。当然这也不总是可能的。采取折衷通常是不可行

民 主

的：在两相直接对立的政策中必须作出选择。但是在某些团体、其他民族的、宗教主义的或政治性的永远处于少数派的情况下，他们的民主及其反对派很有可能就不稳定且丧失其合法性。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少数派且尤其是国家中的少数派，在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后可能简单地决定分离出去，并创立一个在其中他们能成为多数派的社会或国家。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在魁北克和苏格兰发生。多数主义的危险之一就是多数派总是倾向于忘记在其他环境中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少数派。另外一个危险就是，简单的假定在实际的民主政策中在各个“现有”的国家多数派应当有权利去决定所有的事物。而哪一个才是相应的应该作决定的多数派，这是一个永远需要追问的问题。

第七章 平等和公共利益

前述的讨论是关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其中暗含了一个主要问题现在必须明确提出了：民主在什么程度上需要一个所有公民都共享的价值基础呢？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提问，公共利益的概念或是公意的概念能在民主思想中占据一席之地吗？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一致认为不能，它优先强调了现代社会“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本质，其结果就是需要在社会的各个相互竞争的利益或团体中取得一致性的意见或说是妥协。作为粗劣的多数主义的对立面，这显然颇有价值。这有益于提醒我们，在许多情况和许多方面，社会并不是简单地被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两个部分，事实上是少数派的集合体，这些少数派中没有一个可以以民主的名义占据支配地位，从而他们必须学会同其他少数派共处。

我们曾常说英国是两党制政治体制，其含义是这两个主要政党不仅在选举体系中拥有特权，而且，较少异议的是这二者几乎垄断了投票过程。但是尽管这样，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不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没有赢得投票的绝对多数，而现在更清楚

民主

的是，在英国政治体制中，不存在单一的多数党。同样地，当我们审视特定问题中的意见表达时，通常的情况是多数人不会支持单一的立场或政策指令：意见分布在选择系列的范围中，虽然也有对意见的调查，但由于对过于简单的问题的是或否的回答的偏好，使得意见被隐藏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下，某些想要取得一致的妥协或尝试往往会在成为最民主的同时，也成为最谨慎的过程。

但正如我们所见，在许多情形中妥协是不可能的，并且也不渴望妥协。如同罗伯特·保罗·沃尔夫针对常规的多元主义展开的尖锐的批评，当冲突关乎利益而并非原则时，促成妥协较为容易也更合理。^① 设若罗马天主教徒相信流产总是错误的，它违背了上帝的旨意，那么他们将无法提供或接受妥协，因为妥协不能确保他们的原则。或以死刑为例，也许你们保留了死刑或废除了死刑。这个问题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来解决（美国的一些州保留了死刑而其他州则没有），但是正如没有半途而废的房子一样，没有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差不多能接受的妥协。即便关乎利益，也不能随意假定所有的利益都自动的合法，或假定可能且应当达成妥协来协调这些利益。亚里士多德所持的看法是，社会中总是有富人和穷人，他们的利益自然地对立，而政府的任务就在于劝引二者共存，并满足他们的合法需要。但现在不是人人都准备好接受这个不能变更的划分了，并且，

^① Robert Paul Wolff, *The Poverty of Liberalism*, (《自由主义的贫困》)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 137.

若有人坚持这个并非不合理的信条，即财富的存在是贫穷的原因的话，那么很明显我们将面临一个更艰难的选择：究竟是容忍财富和贫穷的共存还是将目标瞄准消除贫穷呢？在后者中除了攻击财富我们别无选择。假如选择容忍二者的存在并尝试创造更多的经济上的平等，那么虽不会立即奏效但确实前者是更为民主的选择。当然，目前我的观点是民主同社会和经济的平等之间确有联系。将合法性加诸于所有的利益之上，甚至是冲突的利益之上，就是在冒险将民主政治与政策的静态瘫痪相等同，或与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自我取消的懒惰主义”相等同。（《宪章运动》，1839）^①

也不能假定某些类型的游说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代表了社会适当的和重大的关注，且不能假定他们中间完全平衡地和妥协地包含了这些关注。事实上这样说可能是真实的，作为一个粗略的概括，关注的范围越广，包含或影响的人越多，精确地描述出这个关注或说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少，或在一个利益集团体系之内根本不可能。举例而言，核毁灭的威胁让我们都置身其中。每个人都被转移这个威胁的政策所影响，几乎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紧张和关注。但他们的关注是如何表达的呢？不一定是由支持核裁军运动或其他一些“和平”组织的方式来表达，因为关注与支持裁军的特定政策不是一回事。但是当只是提出一些少数意见时，政府应当抵制解散和平运动的诱惑，因

^① Thomas Carlyle, *Selected Writings*, (《选集》) ed. Alan Shels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1, p. 198.

民主

为有关这个问题的连贯运动的基础几乎很难再组织或形成，人们在本质上对此有广泛的但是模糊的焦虑。

如果我们将对卫生和教育的关注也引入考虑之中，情况将会更清楚点。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所在社会的卫生和教育供应品的种类和质量的影响。也许可以说，在此公共利益处于危急关头。然而，在这些领域内，良好组织的和最有影响的游说集团和压力集团特征性代表了专业化团体的利益，比如医生、护士、教师，也许还有长期病人、残疾人等等。这些团体的利益也许能也许不能和这些服务的普通使用者相提并论。而在我们所有人而言，我们有一天也可能成为卫生服务的病人，或者成为正在上学或念大学的孩子的父母，那么我们的利益又是如何有效体现的呢？这样的全面关注并不属于也不适合压力集团的游说和组织的紧窄体系中。

但这样的全面关注和利益却是真实可靠的，它们不是卢梭主义者的虚构。而且它们是主流的而非边际的。卫生服务是为病人而存在的，不是为医生的；学校和大专院校是为学生而存在的，而不是为教师和管理者的。因此我相信，卢梭是正确的，他理解了社会被分裂成利益集团的结合，并且看到了在这样的环境中特别容易忽视社会整体的善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既非各个特定集团的利益的联合和妥协，也不是如我们在讨论全体一致时所提及的，可以以功利主义的方式与作为个人来行动的各个个体选择的叠加。由于认识到社会整体的善，人们很有必要按照公民，按照社会整体的成员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而不是简单的作为自利的个体或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来思考和

行动。而除了处于战争或激烈的外部威胁时期，这在现代民主社会很少发生。在现代环境下复兴公民身份的古典共和主义精神还有迹可寻吗？

这里我相信卢梭的观点仍然与之相关。他认为一个社会中过大程度的不公平会阻止公意或公共利益的发展，这肯定是正确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且确实在两千年后也有些看法，也许认为财富与贫穷，甚至是自由与奴役的极端可能作为单一社会的一部分而共存，然而在卢梭的时代一切都全然两样了。对利益冲突的意识，特别是关乎富人和有产者的利益，已然十分强烈了。今天这个情况甚至更清晰。不论是否是选定的政府，他们在试图大规模改善穷人和被剥削者的状况时，将轻率地走向同富人和特权阶级难以缓和的对立面。有时候，比如1973年在智利，这导致了选举民主自身的毁灭。也许有人说，这件事部分是由于选定政府的总统萨尔多瓦·阿兰德没能为其激进的计划赢得足够的支持。在我看来，这种想法不足为信。即使一个掌握了牢靠的多数者的政府也可能会面临同样的情形。在知道自己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时，富人为保卫自己的利益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拘谨。

可以得出两个可能的结论。悲观的结论是，只有不卷入主要的社会不公和不疏远社会的强大的利益集团，选定的民主才能幸存，而这样一来，从长远来看，穷人将不再认为民主是值得支持的了。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情况已经在英国，甚至在美国发生了。政治家对安抚富人的热心，还有财富和政府的密切联系让许多社会底层的人确信不值得投票了：“政治不

民主

能带给我们任何东西”。另外一个结论则是如果民主不是静止的话，它必须建立在地位坚实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也很难说是一个乐观的结论，因为仍有问题遗留，即如果不通过选定政府自身的话，如何创造这样的平等呢？不过，抛开公共利益的认识不谈，民主自身明显处于危险之中，不管这种危险是来自有特权的少数者决心阻碍致力于帮助贫穷的多数人的政策，还是来自像在北爱尔兰发生的那种状况，即那些不承认国家合法性，并被有系统的排除在权力和势力之外的少数派在国内成立的暴力组织。

民主并不意味着社会中的无限的多样性。它需要一个不但共享价值而且共享体验的基础，因此人们认为自己属于其政治体制，从而可以信任该体制的程序及其结果。这即是说，不仅这些程序要看起来且感觉上是公平的，而且同样必要的是没有重要的少数派会认为他们永远被排斥在权力或势力之外。这些团体和个人感到他们在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果上是大致平等的，并且那些结果包括了人们认为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东西，而不是仅指各个特定的和有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益间的联合和平衡。

因此这点将我引向了为什么民主与经济和社会平等的尺度相联系的第二个原因。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中，如果它们是总体的和过量的，那就不仅威胁到了社会的一致性而且有可能否定民主所表明的政治平等的原则。换言之，在政治平等与经济和社会平等之间没有截然和明确的界限。政治平等通过确立普选权而获得的信条，建立在我们早先已提及的假设的基础

上，即政府真正地凌驾于社会之上，且最终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一个民众选定的政府执行其授权。这种社会学上的幼稚的观点由来已久，早就该抛弃了。现在没有人再认定政治过程以选举作为开始和结束了，也不再认为选定的政府对政治权力有垄断权。所以民主的问题就是在选举权，政治权力，影响政府政策的力量和优先权之外，民主是否均匀的，平等的分布在社会之中。如同我们所见，一些早期的和比较热衷的多元性的辩护者，比如达尔和普拉门纳兹，提出不仅强制力和各个利益集团要涵盖差不多整个社会，并且这些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要建立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之上。第一个主张在前面已批驳过了，第二个则是肯定不合理的，现在已经基本上被舍弃了。举例来讲，根据民主原则，在支持一项特定运动或要求的人的数量与该项运动的影响和有效性应当达到的一定程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关联。在各种必定的有影响的甚至是有利的集会和游行中动员公众支持的能力也与此无关。相反的是，一些压力集团及其运动的成功很明显是因为他们是现存经济势力的代表，因为他们有充裕的经费，和受到了一些“重要”人物而不是普通民众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将商业化的电视业引入英国的成功运动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① 由广告提供的经费引进一个电视频道的决定，是必须由政府作出的。因此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它是一个政治决定，但它的出现不是针对任何类型的民众压力

^① H. H. Wilson, *Pressure Group*, (《压力集团》)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1, provides a revealing account of this particular campaign.

民主

作出的反应，而是对有限的却是极具影响的压力集团的运动的反应，这项运动中那些争取赢得最大利益的人，比如电视制造商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而后经证实的商业化的电视业的流行却远离了初衷。决定以何种方式执行或者该过程将被导向何处，这中间是没有民主可言的。

换句话讲，财富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政治不平等的一种形式，这与被表述为“人人皆有投票权”口号的政治平等的原则是相矛盾的。例如，报纸、电视台和广播频道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从某种角度来说完全是经济力量的一种形式，它们通过购买这类商品来获取，与其他任意一种私人所有权的取得一样。但是明白无误的是，媒体的所有权也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形式，并为其所有者作为政治权力所使用。单个的个人所有的投票权与这些拥有此类影响乃至决定政治结果的权力的人比较起来，在参与政治的形式中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和毫不相关。

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如社会的、种族的、性别的不平等也同样是与政治平等的原则相背离的。凡有过政治集会或基层民众政治运动及组织的经历的人都不会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形，这些集团和集会被白种的、中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男性主宰是那么容易和自然。与阶级、种族和性别相联系的利益和特权让这种情况看起来是如此的“自然”就好像它本来就该如此一样。甚至已经假定这是有效的：阶级利益通常由中产阶级来引导和支配，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无论有关的各个党派的作用如何，这也远非民主的观点。并且，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压力集团及其运动也不必然的就比促进劳动阶级利益的尝

试要更具有政治效用的多。通常情况下妇女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政治及选举集会中的最小限度的参与也是不确定的。在这样的集会中，其他种族的少数派也常常没有根据其人口数量占据相应比例。

如此的差异不能被视作是偶然的和完全是自我选择的。它们是潜在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这些不平等主要被归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同时也必定是政治的。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将政治利益给予某些集团并相应的将不利条件给予了其他人，同时，政治平等的民主原则作为一种原则应当意味着不仅是在投票站的平等，而且意味着在进入政治决策制定层的平等，以及在影响整个社会制定的政策和方针中的平等机会，因此，前者和后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事实证明，在多数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在投票站是我们都拥有平等权力的地点和时刻——人人皆有投票权。而其他形式权力的分配却很不均匀，很不平等。

但我们可以走的更远一些。在经典政治思想中，“民主”不仅是政府的形式，还是整个社会的形式，而且它总是习惯性地被其敌对者和批评者还有赞成者与社会平等的原则联系起来。托克维尔的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实质上是对美国社会的研究，有评论家甚至建议书名是《论美国的平等》要好一些^①。如果我们希望复苏这个传统，或如果我们有心想要

^① Hugh Brogan,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 London, Collins Fontana, 1973, p. 30.

民 主

创造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那么毋庸置疑的是远远超出狭隘政治意义的和形式上的平等必须作为我们的目标之一。

第八章 代议制和“直接”民主

然而，我们现在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折回我们的步伐。我们早先的关于全体一致和多数人统治的讨论，至少部分地建立在每个公民都制定决策的直接的个人参与的假设之上。虽然从现有的宣称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可以援引出许多例子，但是，迄今我们仍不认为代表的原则，或说任何可能导致间接民主的程序和过程，与人民统治的原初理想更接近了。

事实上，今天在各处，民主都被作为代议制体系的某种类型来看待。从“直接”一词加诸其上，直至 150 年前这个词到处都是完全指代“民主”。今天这个不合格的词已被充其量是间接的民主形式所替代了。如同我们已提过的，民主党人比如潘恩首先提出代表制是作为一种手段用来使民主原则适应于各个社会，就像在美国，面积过大而不能让全体公民都有个人参与。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权宜之计，几乎是凑合算数，并且包含了明显的危机。人们认为采取防范政府滥用权力的措施是值得欲求的，它们可以防止各个代表冒称自己是完全属于人民的权力和权威机关。

民 主

但是作为代表集会的一种类型，议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现代民主理念复兴之前的许多个世纪，而这些集会带来的是他们自己的迥异的关于代表的观念。这在埃德蒙·伯克于 1774 年 11 月 3 日所作的“对布里斯托尔的选民们的演讲”中有过经典清晰的阐述。伯克明白无误的拒斥任何来自他的选民们的“授权”和“指令”的想法，这些想法涉及到他应当如何投票或是在任一特定问题上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而此时“事情在这个国家的法律而言是完全未知的”，这反映了对“我们宪法的全部秩序和要领”的误解。他认为，“你们的代表亏欠了你们，不仅在他的工作中，而且体现在他的判断力上；并且他要是为你们的意见作牺牲的话，他就会背叛你们而不是为你们服务。”他宣称，议会“不是由不同的和对立的利益的使者组成的‘大会’…而是…一个只有‘单一’利益的‘协商’的集会，在这个整体之中，当地的目的和当地的成见都不应当担任引导，仅有作为整体的普遍理性的结果的普遍善”；^① 这个论点包含的不只是对卢梭的回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而卢梭却坚定的认为国家不应当以伯克指示的路径来表述。

由于自主是区分一个代表同纯粹的指派人的核心，拥有权利，甚至是义务去实践一个自主判断的代议制思想长久的幸免于伯克对此所作的陈述。英国议会议员在他们的意见分歧为各个选举的党派时，总是贯彻这一思想辨明自己的立场。工党在

^① Edmund Burke on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埃德蒙·伯克论政府、政治与社会》) ed. B. W. Hill, Glasgow, Fontana, 1975, pp. 157 – 8.

第八章 代议制和“直接”民主

每次大选之前，对现任议会议员的必做的重新当选的推荐行为，是其分离出导致 1981 年社会民主党成立的团体的导火索之一。在社会民主党人而言，该行为干涉了人民选定的代表的传统的自主权。

无论赞成集会成员或议会议员的自主权的论据是怎样的，仍然很难看到能被普遍理解的同代表有关的东西。一个代表必须确实的代表或站在某些人或某些意见团体的立场，而不是她或他自身。特定选区的人民选出的代表一般应当为该选区发表观点和看法。在使用的普遍意义上，代表是与指派人相对立的，不是指被委派以特定的方式来表明意见和投票，但是对于理解代表在什么样的方式上才可以说是代表或者发表了那些选出他或她的人的意见，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难题。

对该问题一个可能的回答是，认为选出的人不单单是一个代表，而且这个代表是作为那些选出她或他的人中之一员。这一点被安奈林·贝文阐述的很清楚：

代表者在特定情形之中的行动表现与其所代表的人在相同情形下的表现方式几乎一样。简言之，他必定属于那一类人……选举只是代表制的一部分。只有在选定者用同那些选出他的人的真正的口音说话时，代表制才将成为完全的。他应当分享他们的价值观，

民主

即是说，联系他们的现实。^①

这可以被认为是给出了代表的概念的实质，与之不同的是这个概念在伯克的阐述中却遗留了非常含糊不清的和不严格的东西。尽管如此，伯克的思想却在西方民主政治中受到欢迎，比潘恩的激进民主主义的观点和宪章派的观点还要盛行。这样的结果是，在选举过程之外，被代表的人民对他们的代表实际在他们的名义下的所作所为几乎惊人的缺乏控制力。从中得出的难以抗拒的结论是，尽管已经真的提够了，但是代表和指派人之间所作的区分是在错误的条件下提出的。先将贝文关于“真正”代表的概念放在一边，在何种意义上一个伯克式的代表是全部人的代表尚未明确。一个真正的代表肯定是被授权去发表和执行她或他所代表人的利益的，也是被其所代表的人进行了这样的授权的。换言之，一个真正的代表就是一个执行授权并在指令之下行动的指派者。

当然，授权的原则仍在诉求中，但是在与政党的关系上而不是在与个人代表的关系上。统治党倾向于宣称自己有授权去做某事，这些事是他们在竞选声明中说他们会做的，或只是在他们当选之前的一段时间说他们会做而已。这最多意味着选举该政党的人民确知的只是该党派计划做某些事，从而假定这些选民同意那些计划。这个假设是非常不合理的。事实上选民

^① Thomas Carlyle, *Selected Writings*, (《选集》)ed. Alan Shels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1, p. 198.

第八章 代议制和“直接”民主

极有可能不了解那些计划。但是即便认为这种无知该受责备，也不能假定选民确实了解了为他们所赞成的计划和目的。不但可能而且很有可能的是，多数选民在投票选举某政党时不顾及该党的某些特殊计划和目的，并且民意测验也显示，尽管多数选民反对某政党或内阁的一项或多项特定政策，他们仍会给予其支持。投票是针对候选人和政党而进行的。一个政党并不是在以上谈过的“授权”的通常意义上被授权以执行特定政策的。所以尽管我们在思考当前代议制的实践时涉及到了个人代表，还有政党及其选民，仍然清楚的是在这一实践中，普遍控制及责任非常的微弱。这并非偶然，比如英国的官方学说就认为集权存于议会，而不是在人民手中。因此即使英国举行了公民投票，议会仍会努力使之明确的是，它只是一个“咨询的”办法。议会不一定会采取公众的意见，尽管如此公众意见可能得到清楚的表达。

虽然从前的代议制的实践要比今天的更彻底的民主些，而且每项防范措施都被采取以针对沃尔特·惠特曼影响深刻的定义过的“选定者的永无休止的胆大妄为”，至今仍有些问题，以民主的观点看来，这是代议制的真正原则所固有的。假定每个个体都有独特性，假定即使在特定问题上获得了广泛同意的意见是有等级和遮蔽的，即使是一个人代表另一个人的代议制，更不用说单个人代表一个团体的代议制，肯定总处于接近的和未完成的状态。正如 D. H. 劳伦斯愤怒的发问：“谁能

民主

代表我？”。^①我猜想，这个在一篇题为“民主”的雄辩的文章中提出的基本的抗议，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即使这些回应比劳伦斯的论述少了些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

在付诸实行时，如果实际上只代表一个团体中的多数派，甚至是最大的单个少数派的话，问题将被大大激化。我们早已发现了即使是出于直接参与民主的多数派的决策制定也有问题，即那些反对多数派立场并投票加以反对的人如何能被说成是在自我治理的。建议就是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他们的参与加上对于该过程的公开和公平原则的小心坚持，也许可以说服他们接受自己并不同意的决定和政策。但是在一个代议制体系中，代表只为被代表团体的多数派的利益而发表意见或投票，该团体的少数派在全部决策过程中完全没有被代表。极端的看来，若每个团体或选区中的少数派的某个主张都委任了一个代表的话，那么这些代表的集合将在支持其他主张时体现出全体一致，而少数派的主张完全没有被代表，即使原则上它已经赢得了参与委任进程人的支持。若承认间接民主的代表充其量只是个人参与的不充分的替代品，而且应尽一切可能之事来确保在该体制中人民的看法和愿望尽可能精确的被代表，那必须肯定的是，代表应当与社会自身的意见的重要性成比例。相称的代议制的普遍原则，必然比倾向于以未被代表的少数派为代价来换取过多代表了的多数派的任何体制都要更民主——如果少

^① D.H. Lawrence, ‘Democracy’ , in *Selected Essays*, (《散文选》)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0, p.78.

数派有幸被全部代表了的话。

具有合理正确性的公众意见的提出有多条途径。一条是认为代表不要作为个人来投票，而是出于每一个立场或主张来投票，要考虑到她或他所代表的人中赞成该立场或主张的数量。

另一条就是每个团体和选区有多出一个的代表，代表的委任尽可能密切的与该选区或团体中的意见分布成比例。在议会选举中，多个议员的选区部分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置的。此处不应进入不同选举体制及其优缺点的详细讨论，而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反对相称的代议制的普遍原则的人却更经常强调对强大而稳固的政府的需要。这可以被好好考虑为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同其他赞成限制越过政治体制和集会的公共影响或控制的论点一样，它也不是一个民主的论点。并且它通常是明确的反民主的。

因而，对某些人而言，代议制民主的优点正好是约束和限制了普遍权力，甚而在英国，意味着统治权的保留是在代议制制度中而不是在人民自身，抛开这些不谈，为代议制民主而辩护的主要论点本来就是注重实效的：在那些公民太多太分散而不能集中到一个地方的大的社会中，实行它就是最佳的。现在是时候来检验这个论点的有效性了。直接民主是如何不可行的？

首先，我们该问问普遍参与是否需要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集中到一起。难道不可以让同样的辩论，或是关于同样问题的辩论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和许多不同的地点进行吗？现代的通讯手段，尤其是电视，可以在任何想要的时候，轻而易

民主

举的超越任何特殊的本地集会的隔绝。“定基调”的演讲或对辩论的重要捐献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轻松转播。人们甚至可能在家中通过电视收看政治的或议会的辩论，然后在其结束后通过按键或免费电话登记自己的投票或意见。当然，现场观看和收看转播的辩论对参与其间来说不是一回事，但是，应坚持的是，此种类型或水平上的参与并不需要充足的个体公民。这里我的观点很简单：现代技术已经让人民在政治辩论和决策制定的直接参与有完全可以实行的可能性了。^① 至于是否相信需要它是另外一个问题。

公民投票或曰平民制定法是一种在某些地方遭受质疑的策略，主要是因为，它们经常被用来批准或认可已经作了的决定，或是已经开始着手了的政策，就像英国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这个事例一样，或者是因为，它们的举行和问题的提出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运行，即产生了发起它们的政府所想要的结果。换言之，它们是指导普遍磋商的表示，而不是更实质性的政府在其中通常总是拒绝接受其衍生结果的制度。从而普通投票可能贬值，也可能被滥用。但我们不应从中推论出它们因此本来就是该反对的和不能实行的。相反的是：再次出现的困境是看清对于允许人民自己决定主要原则的规则来讲，妨碍“民主”的是什么。英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举行了关于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关于创立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有限自治政府的普通投票，这两个问题是以上阐述的好例证。直到 1998 年举行了进

^① See Wolff, *In Defense of Anarchism*, pp. 34–7.

第八章 代议制和“直接”民主

一步的普通投票以确定该变革的公众支持程度，治理权的某些部分移交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进程才前进了，这是意义重大的。惊人的是，普通投票确实促进和拓展了需要决定的事务的讨论。

如果我们从国家层面上转移到较小的当地社会，或特殊机构比如工厂、机关、学院和学校，那么相当清楚的是，根据直接参与民主的原则，这里既没有规模上的也没有交流上的阻碍对它们实行管理。也许正好有——也总是有——抵制执行这样一个原则的基础：它会浪费时间，它会很费钱，它的运作不会良好等等。但这个思想的确不是不可行的。事实上，在这种层面上包括的人数通常小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公民人口的规模。英国的一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直接民主的机构是学生会，它们部分地由大会来实行管理，所有的学生都有权参加大会。当然，通常只有少数比例的学生能确实出席。尽管如此，所有的学生都能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原则制定出来了，而且这个原则不是不能实现的，也不会产生出明显荒谬的结果。如果有人对拓展民主原则在我们社会中的应用真的很有兴趣的话，若没有存在于许多其他机构中的严重实际困难，那么这当然可以作为被采用的和适合的模型。

在这个简短的间隔中，我关注的是归纳出本章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即便我们推断出代议制民主是最好的并且在现代环境中是能实现的，包含在现存政治序列中的代表原则的思想仍是远非全面和有效的。第二，直接民主可以比其现在的实际情况还要广泛的实践，并且一些现代化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它的

民 主

执行比一个世纪以前要更容易些了。尽管如此，在多数当代社会中直接民主非常少，其中的原因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应用性的和技术性的：那些占据了权力和权威位置的人当然不想要直接民主，而且积极地抵制任何将其引入现状的尝试。民主的反对派并不是像引导我们去推测的公众传闻所宣称的那样濒临灭亡。

第九章 同意，自由和争论

正如民主有时被松散地等同于多数原则那样，在另一些时候它又等同于民意政府（government by consent）。就像较早时所提到的，有很多好的理由不把民主简单视为一种政府体制；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更多地看紧同意这概念。因为一个替代性的表述方式可能是：民主政府（这不是民主的全部）的特点是由同意产生的政府，这与那些由任意或专断原则所构成的政府形式相对照，在任意或专断原则下人民的意愿被忽视以及他们的同意或支持不被认为是必要的。

与这个争论范畴相关的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人民所同意的不一定是民主政府或民主主张。对我们前章已点到的公民投票或平民投票的怀疑部分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即投票已成为一种装置，被独裁者或暴君用来作为他们的统治至少具有普遍民意基础的虚假外表。这方面的先锋是 19 世纪 50 年代的拿破仑三世。但不管那些特定事例中操纵性有多大，给予一个独裁政体或威权政体以真正普遍性同意和积极支持在原则上是确实可能的，比如德国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所给予希特勒的支持。

民主

持，或者说德国人对那些倾向于限制甚或破坏民主的特殊措施的支持。可以想像人民能够同意取消民主。如果同意是民主的本质，我们将不得不接受取消民主的行为算是一个民主举动。

把民主等同为同意导致我们陷入僵局。否认一种独裁政体能够以大众支持为基，或者是否认在一定形势下人民的多数能够被说服支持和赞同非自由和反民主的政策，这是毫无意义的。总之，民众独裁主义现象不是惊恐万状的资产阶级自由分子的发明。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忆起民主的替代性概念即把民主视为人民权力或人民主权，那么清楚的是，人民通过投票放弃自己的权力和权利不可能是一个民主行为，更不用说由于弃权是一个自愿举动，因而我如果自愿放弃我的自由还能保持自主性。要使民主存续，权力必须属于人民。如果他们自由放弃权力，他们所同意之事可以说拥有普遍性支持，但这不是一个民主行为。这个说法可类同于（虽然说不是等同于）卢梭的这种观点，即主权属于人民并且人民不能把它转交给任何其他实体或个人。今天去谈论“不可分割的主权”似乎带有某种古老的形而上的气息。但不管怎么说，潘恩在《人权》中阐发了和卢梭同样的观点：

每一代人必须像所有前辈一样在所有事情上自由
自主地行动……人没有权利占有别人；任何一代人也
没有权利占有所有后代人。^①

^① Paine Rights of Man 《人权》，pp. 41-2.

如果每一代人有权利自主决定如何被统治，那么一代人没有权利代表他的后继者来干预后代人。一代人可以放弃民主、或者同意独裁统治，但下一代人有绝对权利来废除那些决定。因此，实际上，如果人民主权意指完全实在之物，那么人民主权必定不能分割。

与同意概念相关的另一问题是这概念具有脆弱性，甚至具有消极含义。甚至是威权政体，如果它们要维持下去的话，必须能够依赖于某种程度的同意，虽然不必非要大多数人的同意。暴力（畜生力量），尽管恐吓人民极其有效，但仅凭自身无法维持长久。暴力情景下的同意不一定非得是正式登记的方式：实际上，威权政体能够获得人民当中关键性部分的支持或合作就已足够。任何政体都渴望宣称，它的存续证明它获得了同意和支持。这种宣称可说是建立在“默认”之上。默认是洛克为了逃避困境而在他的政府论第二篇中所使用的策略，困境产生于他的基本原则——“社会中，人的自由权（the Liberty of Man）除了接受在共同体内经过同意而建立的权力约束之外不受任何其他立法权力的管辖”（22, 301页）——与希望政府体制稳定和持久就不应受人民经常性再次认同这两者间的冲突。凭借人民成年时他们还存留在他们所出生的国家，就可以认为他们是同意所在国家的统治。积极反对的缺失被解释为同意。除非你从这个社会撤出，否则你被认为已与该社会签订了契约（见 119, 366 页）。

沉默意味着同意。实践中以及在决定必须作出的很多层面上，这种假设始终在形成。或许这是必须的。但不管怎么说，

民主

这是一个错误的等式，有时是一个严重误导人的等式。未能积极予以反对或否决可能导致下述所有反应之一：面对权力害怕或谨慎、冷漠、意志瘫痪、阴沉的顺从、完全的无助、无知的感觉或者奉承的习惯。任何一种或所有上述反应都可能潜藏在沉默的表面下。它们明显不能等同于同意。但是这种沉默与同意相等的轻易等式经常导致掌权者形成夸大他们获得支持或默许程度的观念。当沉默遮掩下的不满甚至绝望在愤怒和暴力反抗中爆发时，他们是无法接受地惊呆了。再也没有比 1989 年之际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的垮台更富戏剧性了。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消极、沉默、默许和之前几年的饥饿必然诱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相信，即便准确说他们的统治不具人民性，至少他们的统治是被接受的，并且在上述意义上是被同意的。他们肯定被 1989 年秋的暴乱所惊骇；共产主义古老政体（*anciens régimes*）崩溃的迅速性证实了他们最终的空洞性，和对他们真实而又积极的支持的缺失。在 1968 年布拉格之春的溃乱到 1989 年的普遍暴动之间 20 年里，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沉默”所象征的不是任何一种同意，而是屈服、无助和绝望，所有这些都被该体制对那些异议人士的无情迫害而激发的恐惧所强化。

但是甚至当同意有了更多的积极内涵，以及不仅得到了“不”的缺席而且得到了明确的“是”时，同意仍然是个无法否认的消极概念。同意本质上是对别人所提出主张的回应。主张的提出一直是政府、政党、政治领袖的责任。但是人民的角色就应该被如此限定？A. D. 林赛（A. D. Lindsay）在 70 多

年前就提出了相关一个问题：

民主是一种导使人民同意政府建议之事的手段，抑或是促使政府应该做人民所希望之事的方式？这两种情况相当不一样，然而如果我们的全部希望是产生同意，那么它能通过两种任一方式得到满足。^①

因此同意的概念过于消极和局限以至无法对民主社会中人民的正当角色给予一个充分的解释。但是人民如何更积极的发挥作用？期望人民自己提出主张，这现实吗？对于这点是可能的，不过一些条件（到目前没有谈及）必须得到满足。

首先，必须有一个自由的氛围，在这范围中各种观点能够无所畏惧或不受限制地自由表达和讨论。至少是从托克维尔和青年时期的密尔以来，这已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之一，使之用来解决民主与自由之间有可能（甚至极可能）存在的断裂性，使之用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民主权原则（通俗的规则普选权）不必然包含着个人自由，以及使之用来唤起“多数专制”的景象。的确真实的是，从最简单词义上考虑，人民主权在逻辑上不包含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可能存在者像人民专制，或人民授权的专制这样一种事。并且明显会有这些情

^① A. D. Lindsay, *The Essentials of Democracy*, (《民主的基本要素》)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p. 31. . Further page references in brackets are to this edition.

民主

势，在其中一个多数的集合意见甚或一个占优势的少数意见向持有异议或怪诞的少数人或个人施加一种无法接受的、有时是无法容忍的压迫。

反对这种自由主义正统观念有必要提出两点。第一是几乎没有理由把一个统治性或主要的流行观点或信仰所产生的强制性压迫与民主挂钩。以有着高度一致性的信仰和习惯为特征的封闭社会在整个历史中到处可见。它们经常（可能甚至典型）的特征是政府的威权形式而不是民主形式。除非集体性压力被看做是民主的定义，否则把它与民主特别挂钩的惟一理由是民主可以给集体性压力以一个特殊的合法性。但我们只有把民主等同于一个简单而无限的多数主义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如此，可是，众所周知，存在很多好的民主性理由反对这种等式。

第二，非常瞩目的现象是，这种自由与民主之间的自由主义式断裂极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基本自由权的斗争在历史中是经常一回事。英国激进分子，包括在19世纪早期为争取民主普选权而运动的宪章派，也为出版自由而运动，凭借出版自由他们想要一个不受政府审查和课税的新闻社会。这绝不是偶然的。在享有投票权而又没有机会参与对政治原则和政治前景公开讨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如何能够有效运用这种政治权利？或者，更广泛点说，在没有经受某种政治教育情况下公民们如何在民主中履行他们的职责？以及在没有自由沟通和自由争论情形下那种政治教育又如何可能？

关于民主和自由之间有着必然联系的假设确实是正确的，即便我们对民主作以更狭窄的定义。比方说，即便民主的本质

第九章 同意，自由和争论

被看做是在为统治而竞争的精英之间甄别的过程，甄别的恰当事务难以把它限定在仅是访问投票点。各党派（或精英们）必须允诺公布他们的计划并且把他们的竞选主张落到工作中去；选举人必须能够向他们提问，以及向他或她表达疑问或支持。一旦在选举过程中允许公开辩论，在其他时间禁止它就变得困难。选择，尽管范围有限，包含着争论，以及争论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自由，即便是在可争论之事上有所限制。

如果我们采用在本书已通篇运用的这种更宽泛的民主概念，那么事情就变得更加强有力。作为人民权力的民主（正如本文所建议的）应该被看做是政府与社会之间一种持续互动的过程，与这互动过程相伴的是人民在各种层次上最大程度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当下述事实发生时，即在关键性决议实际上早已作出和政策早已制定时，决议制定者仍故意展示他们正在向那些将受他们决议影响的人进行咨询，那么对互动过程的一种拙劣模仿（一种虚假民主）发生了。正如林赛（Lindsay）敏锐观察到，这些正是“同意能够被操纵”（43页）的境况。如果，不管怎么说，正在寻求的是真正的、令人确信的、自愿的同意，那么自由和开放的辩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要是想创造克服人民的疑问和敌视的可能性，真正的同意所需要的是人民应该感到能非常自由地表达他们的疑问和抗议。以及如果我们寻求人民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比如自由表达他们的要求和希望、他们的害怕和悲伤，还有引进观念和提出政策，那么明显地，这只能发生在自由和开放的可能性为最大的氛围中，这种氛围免除了这些自由表达后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像恐惧性焦

民 主

虑或忧惧的缠绕。

个人和团体应能感受到自由和不受恐吓是一个自由讨论、自由作出决议和自由同意的必要条件；但这不是一个充分条件。甚至当人民实际是被操纵时也有可能感觉是自由和独立的。个人好像能够作出一个自由和自发的回应，这从“外面”来看实际可以被看做或是社会和意识形态条件或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塑造公共意见而展开一致性运动的产物。这些情况能够产生一种每一个体感到和相信这确实是他或她独自的回应。正如德国人汉斯·马格纳斯·安森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在论“思维的工业化”的一篇著名的散文中观察到：

不管我们是如何地犹豫不决，我们都习惯认为在
我们自己意识中我们具有最高统治地位，认为不论我
们的头脑接受或拒绝什么，我们都是主人……再没有
什么幻觉比思维的最高自主性更顽固地保留在我们头
脑中了。

然而，至少从黑格尔和马克思时代以来，我们逐渐意识到，如同和安森伯格对马克思的解释一样，“在我们头脑中正运行着的东西始终是，也将永远是社会的产物”。^① 现实存在一个关于系列观念的历史，它既是一个人类如何形塑系列观念

^①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Mind’, in *Raids and Reconstructions*, (《摧毁与重建》) London, Pluto Press, 1976, p. 7.

的历史也是一个系列观念如何形塑人类的历史。认为个体的思维能够保持完整独立性、不受它的社会和知识环境的影响的观念肯定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神话。另一方面，只要他们很大程度上不知道正在施加于他们身上的那些影响，只要那些影响本质上不具分散性和竞争性而是普遍联合起来在单一的维度挤压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态度和感觉，我们就不能说人们是在自我形成他们的思维。

自由讨论、自由选择和真正同意要求人们在社会理解等方面有一定的教育水平（不一定是正式教育），例如人们知道他们是说服和宣传的对象并因此能够抵制这些压力。但是这也要求对用于宣传和说服的资源进行一定分配，这种分配确保影响我们思维的权力大致能按照社会内部意见的分散程度而分布。如果人们是处在对任一主要问题都有着源于正常渠道的各种看法下，被粗鲁的观念制造者所控制的可能性就极大地减小了。与某些意识形态想使我们相信的相反，这种多样性不是市场运作的自发产物。在公共部门性质的广播之外，看看出版、电视和广播的目前所有权形式就很清楚。至少，在不列颠，通讯业是由一些拥有百万的所有者和一些大型联合公司所保持。结果没有一家国家性的日报或周末报始终支持比“新”工党还更左的任何政治立场，大多数新闻报纸提供的是系列典型的右翼态度，这些态度远远超出了纯粹政党政治的相对狭窄的界线。

当然，关于这点没有什么好惊诧的。百万富翁们不可能是社会或政治的激进分子。但只要百万富翁们，或他们的合作伙伴们，是惟一能轻松拥有新闻报纸或电视公司的人，那将确定

民主

的是，媒体将不会准确反映所有的社会内部意见、观念和信仰或者使它们保持整体平衡，因而导致社会内部关于政治问题的争论不可能是一种正当平衡和公开的辩论。

一个普遍参与的民主是这样一种体系，决议和政策是作为一个最广泛自由和公开讨论的结果而被作出和制定的。正如林赛（Lindsay）所说：

在一个健康的民主里，代表会议的各种讨论宛如代替着整个国家各种各样的非正式讨论，以及民主成功运作的尺度是看普通男女的投票行为多大程度上被广泛分散的公共讨论所影响。（页 42）

政府不仅仅应该咨询人们什么事需要去做。民主的健康要求政府应该不只是愿意而且有义务倾听人们（在他们的所有多样性意义上）不得不说的事。领导人和政府必须接近人们；考虑到在如此众多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和政府之间存在鸿沟，这很可能意味着政府必须深入群众而不是期望人们来接近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某些拉美领导人和政体看起来在理解人民的需要方面比更规范甚至牢固的西方民主国家做得还好。因此萨勒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 1986 年访问尼加拉瓜时，说到总统丹尼尔·奥特加（Daniel Ortega）：

和人民谈话是他行政工作的首要任务。他有序地在各种大众论坛上带领他的全体内阁成员与人民会

面，以一种主要西方批评家不可能有的方式使自己负有责任。我曾试图想像罗纳德·里根或玛格丽特·撒切尔同意让他们自己每个月接受公众的拷问，结果失败了。^①

葛兰姆·格林在早些年前的巴拿马曾注意到一种类似风格，奥马尔·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将军和他的政府向公众征求意见和亲近民众（Accessibility），由此认为这个国家已“卷入一种非常不同的民主形式”，和不列颠形式不同，但它是一种具有自身正当性的民主形式。^②

就格林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观察。在 1963 年，通过访问革命后的早期古巴，格林提到：“今天的哈瓦那城市有点古雅典的味道；对人民来说，共和国如此之小以至于可以在市场上聚会。”在那时，菲德尔·卡斯特罗，看起来像奥马尔·托里霍斯一样，与那些想见他的古巴人有着超常的接触——“比麦克米兰先生更容易接触”，格林写道。^③

确实，“亲民”和“愿意倾听”与权力和政府的一种威权结构不是不相容的。更不用说，当本质上是在寻求一种对已作

① Salman Rushdie, *The Jaguar Smile*, (《美洲虎的微笑》) London, Pan Books, 1987, p. 36.

② Graham Greene, *Getting to Know the General*, (《逐渐了解将军》)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5, pp. 34–5, and also pp. 56–8.

③ Graham Greene, ‘Return to Cuba’, in *Reflections*, (《反思文集》)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91, pp. 217–18.

民 主

出的决议加以合法化，而不是展示一种征求意见和民众参与的情况了。这是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民主表象。民主的实质是人民有权力使政府以及使他们的代表们同意接受公众意志和公众要求。民主包括争辩和讨论，但如果它们在决定实际政策方面仍然是非决定性和不具有效性，那么这些是不够的。这就是“深思熟虑的民主”这概念变得重要之所在。民主不仅仅意味着是谁在作出决定，而且也是一个程序，通过这个程序哪个决定和政策被作出。这个程序是参与性的，而且政策不仅仅是被建议和争论，并且随着讨论以及通过尽可能考虑各种卷入争论中的那些人所表达的利益和观点而演变。这种讨论的结果应该是公众性的决定和普遍性的要求；也因为民主中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或议会拥有主权，故而政府的工作就是接受和贯彻公众意志。

第十章 结论：创造民主

如果本书所申辩的民主解释是正确的，或至少被读者看来是有说服力的话，那么很明显，其主要的实践涵义是，按照现代政治（不仅仅指那些好像被“官方”承认的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的议程民主一直是“未完成的事业”。甚至当普选权已实现或当公众选举成为政治体系的核心部分时，民主还远没有实现。这两个非常实质性和重要的成就不妨可以合理视为只是通向创建完全民主社会之路的第一步。举个例子，现今俄罗斯选举他们总统的事实很难说已使得后共产主义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社会。考虑到总统的权力、议会的虚弱以及政府对出版和广播的控制程度，把俄罗斯描述成是受一个“选举式独裁体制”的统治，这或许更准确。

在西方我们从冷战继承了一种懒惰的假设，即如果一国政府不是共产主义性质或者不是受一个可辨认的独裁者统治，那么它必定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本书的一个目的，是一直主张一种比这些偶然的假设更严格和更高要求的民主概念。临时的或多或少自由的选举，自身是不足以通过民主性“测试”的。

民主

虽然，这不是暗示普遍性选举是可以忽视的或是不重要的。现在，或许是过去，有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粗劣和低俗的变种，该变种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的差别视为基本上是虚假的和不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被视为一种面具，在面具背后资产阶级继续统治和主导资产阶级社会。结果这面具是保留着还是撕去以揭示背后现实已变得不重要了。的确，后者行为或许更值得做，因为这将使阶级敌人清楚暴露在公众之前。这曾是某些共产主义者为了回应法西斯主义在 1933 年的出现而采取的手段。现在看来，曾经被作为“仅仅”政治“形式”看待的东西比一种对经济和社会权力专心关注所可能表达的东西有着远为更大的潜在和实际重要性。

因此，对“资产阶级”民主所提供的美德、好处和机会加以贬低的任何倾向都应予以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民主是一项应该继续添砖加瓦而不是加以鄙视和无视的成就。那些直到最近才开始改变而之前从来不知道它的国家比如南非或波兰，或者是难以恢复它的国家比如智利和捷克共和国，可能是最能深刻欣赏它的。但不管怎样，多个角度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是一个欺骗性的黎明，实现地只是众多为之努力奋斗的人所希望的一个部分。比如，在不列颠，1832 年第一改革法案之前经过了数十年的断断续续的普遍抗争，抗争中像威廉·柯贝特（William Cobbett）这样的领导人物不断反对起义的设想而主张引导大众激进主义趋向更大选举权的严格宪政性目标。毫无疑问，那次长期运动的结果，即法案本身，对工人阶级激进分子来说是极为令人失望的。如柯贝特后来所说，人们本想法案

“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能使我们的处境变好……而不是为了满足任何抽象或形而上的奇想”。^① 至于宪章派分子情况也是如此。他们曾把统一或成年人选举权与其说是视为目的本身不如说是将打开社会和经济激进甚或革命性变化的大门钥匙。他们的阶级敌人分享了同样的预期，并且害怕和反对基于这个原因而扩展选举权。资产阶级对“民主的来临”的结果性调适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害怕（或希望）没有实现，或最多只是部分实现。对于不列颠在 20 世纪上半期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发生的尖锐斗争也可以做类似的评论。像柯贝特一样，许多妇女参政论者或许会说，当时他们寻求的与其说是投票权本身不如说是他们相信作为妇女选举权实现的结果，妇女会在地位和生活条件方面得到改善。认为妇女获得投票权是没有有益后果的这种建议是愚蠢的。另一方面，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妇女运动的复兴证实了妇女选举权运动本身没能达到性别之间实质性平等，或甚至是没能取消一些铭刻在非常传统的法律和实践内的歧视妇女的更耀眼的形式。

今天在东欧和前苏联出现了一些象征着类似觉醒的迹象。这不是说在自由已获实现的地方，人们不重视那些他们艰苦赢得的、长期被否认的自由。也不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渴望那种威权主义和以党代政的“美好旧时代”。但是，正如在 19 世纪的不列颠或革命时期的法兰西所发生的那样，多数人民期望

① Quoted in Asa Briggs, *The Age Of Improvement*, (《改善的时代》) London, Longman, 1959, p. 245.

民主

和希望民主“给我们带来某些好处”；而且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目前联合并没有比威权共产主义带来更好的物质条件。的确，“自由市场”原则的强加已创造了许多悲惨和困苦。在 1990 年当选为莫斯科市长的加夫里尔·波波夫（Gavriil Popov），以不同寻常的坦率写到了民众渴望和他与其他政治领导人认为是经济的必然转型两者间的冲突：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有着不同形式的所有权的社会，包括私有财产；这将是一个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不过] 大众渴望公平和经济平等。而且经济转型的进程越深入，那些民众渴望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差距将更加尖锐和耀眼。^①

波波夫和其他东欧“改革者”，还有许多他们最热心的西方支持者们，都无疑愤慨地拒绝这种看法，即民主和偶尔接受无限制经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之间可能存在某些内在的和不可消除的张力甚或矛盾。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自己的陈述可以被解读的一种方式。

因此我们从中至少必然推出，普通老百姓所期望的政治民主或投票的目标仍然还没有以任何方式得以完全实现。但是这里早已探讨过的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承认政治民主自身

^① Gavriil Popov, ‘Dangers of Democrac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纽约书评》) Vol. XXXVII, No. 13, 16 August 1990.

仅凭给予每个成年人一个普通投票权和地方选举权并不能得以实现。政治权力平等的原则，这体现在每一公民拥有一张选票上，与政治权力分配在几乎其他各个方面的显耀不平等形成十分明显的对比。这不单单是与官方决策实体相关的权力和影响的分布，或者甚至是影响人民自身思维和感觉的权力分布，尽管这两种情况中权力分布是明显和荒诞地不均匀。这也是一个理解权力自身、理解权力是如何运作、理解权力存在何处的问题。为了讲明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个例子。R. H. S. 克罗斯曼（R. H. S. Crossman）在他的有价值的和揭露性的著作《一个内阁首相的日记》当中透露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工党内阁的一个决策，决策内容是否允许一个石油公司在艾塞克斯的肯维（Canvey）岛上建立一炼油厂，那时他是内阁成员。一点不奇怪，该提议遭到了当地多数居民的强烈反对，为此作为房建（Housing）大臣的克罗斯曼有点同情他们。但当议题摆在内阁面前时，它以有利于石油公司的方式通过了：“外交事务办公室、国民福利办公室、电力部门、经济事务部门和财政大臣都坚持认为，我们不能让外国石油公司感到不安”。^① 使公司不悦所牵涉到的危险被认为太大了。相反，地方居民的抗议所带来的危险就很小。

这里有个例子，是 30 多年前由一个民选政府在最高级别上作出的一个政治决议。然而在涉及一个大型跨国公司时，该

^① R. H. S. Crossman, *Diaries of a Cabinet Minister*, (《内阁大臣的日记》) Vol. I, London, Hamish Hamilton and Cape, 1975, p. 366, and see also p. 414.

民主

政府感到自身多多少少是没有力量的。这清楚说明公司的权力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但公司不像地方社区，社区必须得组织起来，为了请愿而征集签名，为了能使他们的看法被听到和被注意而示威和游说；公司需要办（do）非常少的事。确实公司不需要求助公共的支持。倘若内阁知道当时公司的真实能力，公司几乎不需要为了它的事务而进行运动或游说。公司仅凭手中的能量就已足够威慑内阁并使之接受公司的“请求”。因此不仅仅可见的、积极运行的权力需要加以均匀化，而且那种本身不能重新分配的权力掌控至少必须在民主框架内是负责任的。对政治和经济权力加以区分在一定环境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尽管是有用的，但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区分。经济权力就是政治权力，并且这是毫无意义的，即当只是在投票领域贯彻平等原则而其他形式的政治权力却按照资本市场的总体不平等来分配，即便在资本因素处于强势上升的后共产主义世界里这种政治权力按资本市场分配的模式已压倒了一切。

因而，我将申辩，民主原则内部有一个趋向社会主义的逻辑。民选政府发现向大型私有公司的愿望弯腰是必需的，极大形塑公共意见的媒体能够被百万富翁们买来卖去，被他们看做只不过是一些私有财产（当然情况也确实如此），这个事实证实了一个积极和有效的民主和垄断性资本主义共存是多么地困难。

对人民负责、追求与促进共同善的民选政府和完全只对它们的股东们（尽管那样经常只是名义上如此）负责的私有和私人控制的企业巨头两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

一年比一年尖锐。在 21 世纪可能将会对民主的力量和活力提出最重要的考验：

人民和企业之间的斗争将被定义 21 世纪的战争。

如果企业赢了，自由主义民主将终结。捍卫弱者反抗强者的伟大社会民主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政府，民主责任制以及议会主权——将被倾覆。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影响公共生活的企图被击退的话，那么作为征服的结果，民主重新成为更强者。^①

乔治·蒙贝尔特（George Monbiot）的预言可以认为是相当具有启示性的，但这不只是为了相关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关键之点是民选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故而民主的合法性问题。一个被视为没有效率或者没有力量的政府体系会失去公众的尊重和信心，也将为它的颠覆或崩溃做好了准备。民主可能是逐渐而不是突然被某种威权主义取代的，威权主义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看起来积极有效。（可以想像，它使火车准点运行）。

这就是为什么选举参与率下降成为一种令人着急的现象的原因。选举参与率下降在美国最显著，但在不列颠也值得注意。在不列颠，自从 1928 年引进成年普选权以来，在 2001 年大选中投票率首次低于 60%。政治家倾向于把这现象归因于

^① George Monbiot, *Captive State*, (《被俘的国家》) London, Pan Books, 2001, p. 17.

民主

“投票者冷漠”，为此他们自然难过。但这不妨可以说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即“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以及政府的变化是不重要的，因为真实权力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确实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不投票不是想像那样是明显的非理性，好像它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产物。因而，这将要花费更多的劝告来扭转这种趋势。

正如我们所看到，甚至在 20 世纪 60 年代，政府和私有企业与公司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就已明显，在过去 30 年里这种不平衡越来越严重，至少不是由于政府本身鼓励和助长了它。作为一种经济战略对私有化的支持和反对明显属于讨论层面的事。但难以否认，如此多的原来属于公共性质的并因此政府对此具有最后责任的功能和属性的私有化表现了权力从政府到私有领域的实质性转移。这个进程可以说是由 20 世纪 80 年代保守政府所启动的，是由不列颠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所领导的。但这个进程现在被代表各种政治立场的不同政府所广泛继续，包括 1997 年后的不列颠工党政府。

这些发展有时被政治家和他们的支持者所捍卫，他们宣称“大政府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把权力向下移交给“市民社会”的时候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民主化过程，如果是这样，它明显会受欢迎。在不列颠，把权力移交给威尔士集会和苏格兰议会的确是一个促使政府更接近它打算为之服务和代表的人民的举动。但接受权力移交的政府是在常规之内的例外。那些中央政府多多少少是自愿被剥夺的权力很少被转移到民选的和负责的公共权威手中。在不列颠，地方民选政府的权力和

责任已逐渐受限制和削减而不是扩张。“市民社会”是一个诱人的词语，但它经常是作为一把吸引人的伞而出现，在伞的下面潜藏着不负责任的权力垄断和集中，这种权力和社会其余部分的关系是一种主导关系而不是协作关系。

政府的另一个反应目前应是谈“伙伴性关系”的话语。比如，如果私有企业被允许拥有和经营学校、监狱或者医院（不管怎么说这些仍然是主要的公共机构），这就是所谓的一种“公共—私人的伙伴关系”。其含义是这是平等者之间的关系，但当然这是一个令人质疑的问题。通过控制这些机构所给公司带来的更窄商业利益折扣或牺牲公共利益或公共善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到目前的记录不是特别令人安心。举个例子，当公司开始向学校供应“书包”时，他们自然会抓住机会增加他们出售的产品，以及不考虑那些对他们产品和使用程序的批评和反对意见——比如可能涉及到的环境危害。这是惟一能期待的。一位市场经理说，“我们所接触的孩子是正受训练的消费者。”类似态度推翻了教育的独立性和诚实性。我们也知道私有化的融资经营（PFI）（在该模式下，许多新医院正在不列颠建立）意味着医院的落脚点不是决定于它对病人的便利性而是决定于地点的可赢利性；以及意味着对相关私人企业的费用和债务的偿付优先于对公共卫生用品的实际开销。^①

^① See *ibid*, pp. 331 – 7, and Chapter 2 “医院的例子——公司接管了国家健康中心”。

民主

对政治家来说，这种权力和责任向私人企业的移交或转移有一个明显的吸引力。他们能否否认以后所发之事带来的任何相关责任。比如当代政府否认有干预工人和雇主之间劳动或工资纠纷的任何意图。这两个“私性”组织或实体必须自我解决纠纷。但像控制学校、医院和监狱的“私有”公司的行为所产生的很多纠纷，通常有着许多的公共回响。虽然政治家一直忙着试图教育公众们要比过去半个多世纪他们对政府和国家所习惯的期待更少点。他们实际上没有特别的成功。公众坚持希望他们所选举的政府要对公共问题和危机“有所作为”。像 19 世纪要求议会改革的运动一样，他们盼望民选政府“给我们带来某些好处”。不作为、抄着手和耸耸肩不能给公众带来太多好印象。

如果真实权力存在于普通老百姓手上和存在于他们所建立的组织和所发动的运动里，那么对政府的普遍预期可能会不同，并且会更低。促使自助的激励因素将会更大，而且如果该自助能产生实质性结果的话，政治家将能更为有效地劝导人们实施自助。但是正如肯维岛（Canvey Island）和英格兰南部的贝德福德郡（见第六章）的居民，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所发现的，当与经济强大的公司和企业的利益和影响相比时，公共意见的重要性几乎不值一提。而且，正在写作本书的时候（2002 年），目前的英国（工党）政府正在建议设计程序以更适应大公司的便利，以更少向有影响的地方公众抗议开放。

不存在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确保向一个更完满更有效的民主缓慢而稳步地前进。已普及全球的民主

程度仍然是有限的，甚至在民主似乎已稳固建立的地方，从许多方面看，民主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在类似需要戒备“恐怖主义”的口号下，个人权利，包括示威和抗议的权利，逐渐被威权主义倾向的政府蚕食。同时民选政府的权力和回复责任正随着大型跨国公司权力的持续高涨而相应缩减，一些跨国公司现在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总量比许多小而相对贫穷的民族国家的总和还大。现在这些公司像孩子梦魇中的巨兽一样威胁性地压在民选政府头上。但是这不是梦魇，而是日常中的现实。

最扰人心的是民选的负责任政府在范围和责任方面的收缩并没有被大多数民主政府自己所抵制。相反，他们似乎不再为了捍卫公共善以反对财阀权力的狭隘特定利益而进行古老的斗争；一些政府甚至提出公共善与那些特殊利益是一致的。在许多西方政府的经常性支持下，大公司的出现频率和影响力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一直在增长。有时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一些形式（赞助者身份的、理念上的）看起来很无害的。但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些形式展示了包括民选地方政府在内的相对无权者对那些富有、自足的公司和企业的权力和慷慨逐渐增加了依赖性。这些不是民主性发展；它们是反民主的发展。它们显示了1990年左右产生于东欧共产主义倒塌之后以及梳理其他独裁形式所表现的自负甚至胜利者的姿态实质是一种恶劣的取代。我们不必然逐渐走向更大的民主、更公共性和民众性地控制权力；我们可能离它越来越远。影响公共生活的具有不负责任性的企业权力的增长导致对民主自身的普遍缺乏信心，惟有使越来越多的权力归于公共的和负责的部门才能纠正这种状况。我

民主

说的公共部门主要不是指国家；我指的是一种民众控制体系，在该体系下生产者和使用者（或者消费者）将恰当共享政策和决议的制定权。因为“实际运行着的民主制”（按照鲁道夫·巴罗的一个有用的词汇）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民主原则局限于在非常少的公共机构和许多自愿性组织之中，而大量中枢性质的重要机构继续由很大程度上不负责的非选寡头和个体独裁者所运行。如果我们旨在创造一个民主社会，显然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如果以为只有西方民主国家有着这方面的相关经验，这将会很愚蠢。在前几章，我们参考了一些更激进的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领导人和民众之间的对话模式。也令人注目的是，在苏联最后几年，它的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特别注意在工作和生产领域引进民主原则：

在生产领域，民主的发展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经济是个关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领域。每天有数千万人在从事生产。因此在深化和扩大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生产领域的民主发展是个最为重要的趋势。^①

后来报道说，苏联电视台报道了代表们对一个工厂领导人

^① 戈尔巴乔夫的演讲在1987年2月2日的《守卫者》（The Guardian）里得以详细报道。

的选举，这些代表们代表了 13 000 个工人。^① 这种模式推进得有多远，候选人的选举有多公开？现在是很难发现。但它与现在的探讨相关的是，这是民主的一个方面。在公认民主的西方国家，这方面到目前很少被实践甚或很少被讨论。而且近来企业私有化的俄罗斯和东欧在这方面肯定不突出了。可是，如雷蒙德·威廉斯所写的，“在如此集权的又作为我们生活一部分的工厂里，如果我们大多数人对随时影响我们的决议没有参与权，那么很难感到我们是在真正统治我们自己。”^② 工业民主，或者更宽泛地说，工作场地的民主是一个至今经常被讨论的理念，不过有些例外（某种程度上包括前南斯拉夫）。该理念要在大多数社会作为一种认真的实践加以执行仍然很难。即便我们采取一种更狭窄的视角来看待宣称是民主国家的一些特殊政治机构，显然要使民主原则在这些机构得以完全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个公开声称民主的环境里，不列颠还保留这么多前民主性的原则和机构，这在民主国家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不列颠，国会的一个民选议院与一个完全非选举产生的议院并存。在写本书时，后者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世袭封建贵族的后代，另一主要部分是各位首相的恩惠的受益人。接下去几年贵族议院（House of Lords）将进行改革，改革结果是否明确比目前的半吊子议院更民主，这点还不清楚。在不列

① 见 1987 年 3 月 8 日的观察者和 1987 年 3 月 15 日观察者中 Ian Mikardo MP 的来信。

② See Raymond Williams, *Towards 2000*, (《奔向 2000》) London, Chatto/Hogarth, 1983, p. 36.

民 主

颠，人民主权原则从来没有被接受过：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主权被议会和一个世袭君主所分享。定期选举的原则也从来没有确立：替代的是，普选日期的选择权作为恩惠的和掌控的广泛权力之一仍旧被保留并操纵在责任首相手中。支持第一和第二大党的选举制度自身逐渐产生一种众议院议席的分配格局，这种格局明显随投票的实际类型而变动。

这些只是英国政治体系内最明显不民主的不当之处。近些年来，这些反常和时代错误遭受了大量批评，这是一个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发展。不列颠在宣称自己是一个完全自由民主国家——也就是不再有任何激进式变革之前，还有多少工作需要做？在这方面，宪章 88（Charter88）和其他团体已做了很多以表示关注。但除了这些特殊改革外还存在一个更受普遍困扰的问题。像另外其他机构一样，英国议会自身实际是一个前民主、前现代的机构，这明显可以从它不合时宜的结构、习俗、语言和整个精神看出。问题是这些神圣的古董是否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如果是表面现象的话，议会的一个适当现代化就能够将它消除。或者说问题是，它们是否暗示代议机构的传统模式无法应付现代民主政府的相关问题。这不是一种新的焦虑。它潜藏在林赛著的早在 1929 年出版的《民主基本要素》里，并且一些年后被哈罗德·拉斯基以略微不同的角度提起。那时，他问“政治民主造成的这种局面是否还没有，也就是说，太晚

到以至于不能控制它所面临的整个进程？”^①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写作中，他正在思考银行和商业寡头的巨大发展似乎超越了国会理解或控制的范围，而且银行和商业寡头在接下的 70 年中得到了明显增进。这当然使下述情况不明显，即以现在的模式，政治民主的各关键机构已被很好地设计用来在一个民主政体和社会里发挥它们的核心作用。

因此根据各种诊断，在一个允许和宣称正实践民主原则的政治机构和传统里，明显需要采取或多或少激进的改革和转变措施。但是，如密尔曾写的：

一个不被各种具体的民主机构所支撑而局限于中央政府的民主宪政不但不是政治自由，反而经常创造一个幽灵，准确的说，一个相反物，即在社会中导致政治统治的欲望和雄心下降到最低级。^②

在正式政府领域外，在实际运行选举制和责任制的自愿组织和商会（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里，几乎每件所做之事都不但在创建民主而且在确立这样的原则即民主是个应予以执行的原则。当然，可能在有些情形和组织中实行民主并不恰当。这是一个通过特殊例子可以辩驳的事情。但是确定的是，在现代

^① Harold J. Laski, *Democracy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NCLC Publishing Society, n. d. (but c. 1934), p. 17.

^②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原理》) Books ivandv, ed. Donald Win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0, p. 314.

民主

社会中，民主原则——人们应该尽可能地在最密切和最严重影响他们的事务上作出决定或参与决议——能够比目前状况更为广泛地有效应用。并且如果那些社会认真致力于民主化，那么也必将会达成这样的结果。

在国际层面上，存在其他类型的发展，这些发展也向民主提出了一种挑战，甚至可能使我们远离民主。在发达的和一般说是民主的世界里，跨国机构出现了，这些机构拥有巨大权力，并且被政府认为合法，但实际上是一些非选举性的和极为不负责的实体。

可能一些无诚意的经济学家会暗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个纯粹经济机构，其宗旨是严格按照经济和商业标准把钱借给贫穷的政府。但再一次暴露了认为经济和政治机构之间存在区别的虚伪性。这些非选举产生的实体向民主政府提供帮助所依据的条款不仅具有经济性同样具有政治性，而且经常有着最具宿命性的政治和人类后果。那么这些机构的具有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政治权力在国家层次上如何与民主的运作相处融洽呢？

至少来说，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重要的多国和超国家组织的责任性是最低的。相对于欧洲委员会和它的众多下属组织，欧洲议会的虚弱性是臭名昭彰的。看起来清楚的是，目前很少花心思去考虑或花精力去致力于促进超国家层面的机构民主性、负责性和选举性，现在许多最重要的影响深远的政治决议越来越多地在超国家层面（包括公共和私人领域）作出。我们需要全球性和超国家性民主，和我们所需要的国家

和亚国家层面的民主一样多，如果不是比之更多的话。

因此，从民主的外观来看，与近年来通常所说的那种美好和有益是相差很远的。并且这个问题由于最近好战的伊斯兰主义复兴而变得更加复杂。在某些方面，当代伊斯兰简单循从了所有有神论宗教的传统模式——它们一致宣称上帝的意志优先于任何和每一个人间的倾向、决定和政策。上帝的法则是至高无上的，并且应该体现在和反映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上。没有人的决议或法律，不管是由单一统治者还是由一个民众性投票作出的，都不允许侵犯神圣法令。如果它被侵犯了，那么它将不具合法性或者不必被遵从。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和严格而热忱的穆斯林信徒都持这种观点。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视堕胎为谋杀并认为法律应该据此禁止该行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准备谋杀那些执行堕胎的医生和护士们。

信奉正统派穆斯林的人同样相信世俗政府应该尊敬和实践阿拉的意志。那些没有这么做的政府，不管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将丧失合法性。这种对待政府的方式向民主明显提出了一种挑战，特别在伊朗，我们能看到发生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主趋向之间的深远斗争。这个形势由于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愤怒而进一步恶化，而美国的全球霸权早已如此有力地燃起了伊斯兰的复兴。民主是西方的产物，这在同等程度上引发了对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猜疑。无法成功地把政府的议会制输出到非洲大部分地区，只不过展示了西方式民主对发展一种在非西方文化中所可能采取和接受的民主模式和风格是如何地反

民主

应迟钝。

因此，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存在着几股对民主逼人地威胁和挑战，如果民主的原则得到发展和繁荣，那么这些威胁和挑战将不得不面对。难以确信这些挑战将能成功被应对，考虑到那些反对民主的力量是如此强势和活跃。

半个世纪以前，伟大历史学家和对当代事件的明智评论者，E. H. 卡尔（E. H. Carr），发表了一系列所谓《新社会》（曾经洛阳纸贵）的广播谈话。在谈话中他声称，与 19 世纪的古老自由式民主相反，“大众民主”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但目前仍没有被创造出来。对我来说，他的言词仍旧对自满和自我欣赏提供了一个实在太恰当的警告。民主仍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程而不是一项安全已然达成的成就：

今天我们谈论捍卫民主，这将是一种自我欺骗和虚假，好像我们正在保卫某些我们已了解和已拥有了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的东西一样……不是在传统机构的幸存中寻找标准而是在如下问题中寻找：权力存在何处和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从这个角度看，民主是一个程度的东西。今天，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具有更多的民主。但是，如果任一高的民主标准被采用的话，那么可能没有一个国家是非常民主的。大众民主是一个困难的领地并且目前很大程度上未被勾画；如果我们谈及的需要不是捍卫民主而是创造民主，那么我们应该更一步接近这个目标，并且应该有一个更为令人

信服的口号。①

随着非对民负责的“私有”财团的活动急速增加，以及所带来的日益威胁，创造和扩展民主仍旧是严肃的民主人士的中心任务。

① E. H. Carr, *The New Society*, (《新社会》) London, Macmillan, 1951, p. 76.

参考书目

对一个 2 500 年来一直连续被热情讨论的主题，要列出一个短小书目是一件惹人不满的事。我已经编了一份我认为有用的书单。一些书目被遗漏是经过考虑的，但我毫无疑问我也疏忽了许多我熟悉的优秀书籍，如果可能的话，我应该把它们包括进去。我也没有把在本书中提及的古典文本列入，比如像柏拉图的《普洛泰格拉》、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潘恩的《人权》等等。下列有些书籍可能会显示出适合多种分类的特征。

一般性论著

Bobbio, N. (1990)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Verso.

Carr, E. H. (1951) *The New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Duncan, G (ed.) (1983) *Democr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nley, M. I. (1973)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Chatto&Windus.

参考书目

Forster, E. M. (1951)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London: Edward Arnold.

Graham, K. (1986) *The Battle of Democracy*, Brighton: WheatsheafBooks.

Held ,D.(1987) *Models of Democracy*, Oxford: Polity Press.

Hobson, J. A. (1934) *Democracy*,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awrence, D. H. (1950) *Democracy*, in *Selected Essay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indsay, A. D. (1929) *Essentials of Democracy*, London: Oxford Uniersity Press.

Lindsay, A. D. (1934) *The Modern Democratic Sta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vely, J. (1975) *Democra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ucas, J. R. (1976)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Books.

Macpherson, C. B. (1966)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Press.

Macpherson, C. B. (1973) *Democracy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cpherson, C. B. (1977)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teman, C.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民主

Singer, P. (1973) *Democracy and Disobedi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hompson, D. (1970) *The Democratic Citiz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 (1983) *Towards 2000*, London: Chatto & Windus/Hogarth Press.

Wolff, Robert Paul (1970) *In Defense of Anarch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古希腊民主

Davies, J. K. (1978)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London: Fontana.

Finley, M. I. (1972) *Aspects of Antiqu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Forrest, W. G. (1966) *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Green, P. (1972) *The shadow of the Parthenon*, London: Maurice Temple Smith.

Jones, A. H. M. (1957)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Rodewald, C. (ed.) (1975) *Democracy, Ideas and Realities*, London: J. M. Dent.

民主的近代历史

Arblaster, A. (1984)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Liber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Briggs, A. (1954) *Victorian People*, London: Odhams.

Burnell, P. and Calert, P. (eds) (1999) *The Resilience of Democracy*, London: Frank Cass.

Dickinson, H. T. (1977) *Liberty and Property*, London: Methuen

Douglass, E. P. (1955) *Rebels and Democrat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Foner, E. (1977)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och, G. P. (1927) *Englis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ll, C. (1974)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 - Century Engla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obsbawm, E. J. (1962) *The Age of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obsbawm, E. J. (1975) *The Age of Capital*,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ofstadter, R. (1962)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London: Cape. *Ideas and Beliefs of the Victorians* (1949) London: Sylvan Press.

Kenyon, J. P. (1977) *Revolution Princip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vely, J. and Lively, A. (eds) (1994) *Democracy in Britain*: A

民主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Lynd, s. (1969)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American Radicalism*, London: Faber.

Moore, B. (1967)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Allen Lane.

Morton, A. L. (ed.) (1975) *Freedom in Arm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etegorsky, D. W. (1940) *Left-wing Democracy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 London: Victor Gollancz.

Williams, R. (1959)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London: Chatto & Windus.

Woodhouse, A. S. P. (ed.) (1938) *Puritanism and Liberty*, London: J. M. Dent.

当代对民主的争论

Aron, R. (1968) *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Bachrach, P. (1969)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Elitism*,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Barry, B. (1970) *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 London: Collier – Macmillan.

Beetham, D. and Boyle, K. (1994) *Introducing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nn, T. (1981) *Arguments for Democracy*, London: Cape.

参考书目

Bottomore, T. B. (1964) *Elites and Society*, London: C . A. Watts.

Crick, B. (1962) *In Defence of Politic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Dahl, R. (1956)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hl, R. (1982)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Kornhauser, W. (1960)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ppmann, W. (1956) *The Public Philosophy*, New York: Mentor Books. Lipset, S. M. (1960) *Political Man*. London: Heinemann.

McCoy, C. A. and Playford, J. (eds) (1967) *Apolitical Politic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Mernissi, F. (1993) *Islam and Democracy*, London: Virago.

Miliband, R. (1982) *Capitalist Democracy*, i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nbiot, G. (2000) *Captive State,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Schumpeter, J. (1943)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Spitz, D. (1965) *Patterns of Anti - democratic Thought*, New

民主

York: Free Press.

Talmon, J. L. (1952)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Secker & Warburg.

Williams, R. (1982) *Democracy and Parliament*, London: The
Socialist Society.

Wolff, R. P. (1968) *The Poverty of Liberalism*, Boston: Beacon
Press.

译者后记

阿伯拉斯特以史拓论的治学方式，并在耙梳历史和典籍过程中阐幽发微，这些让译者们着实受益匪浅。

但由于译者学识所限，呈给读者的这个译著可能并不成熟，误差之处，恳请方家批评。

全书翻译由孙荣飞和段保良、文雅三人合作完成。具体分工如下：段保良翻译第三章、第四章；文雅翻译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孙荣飞翻译余下章节。最后由孙荣飞校对、统稿。

译者

2005年3月19日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